

ISSN 2414-7443

# 東海大學圖書館叢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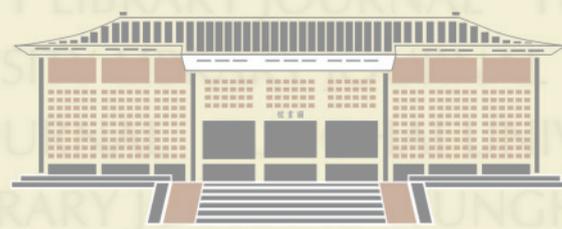
*Tunghai University Library Journal*

2021年3月15日

【第五十六期】

東海大學圖書館叢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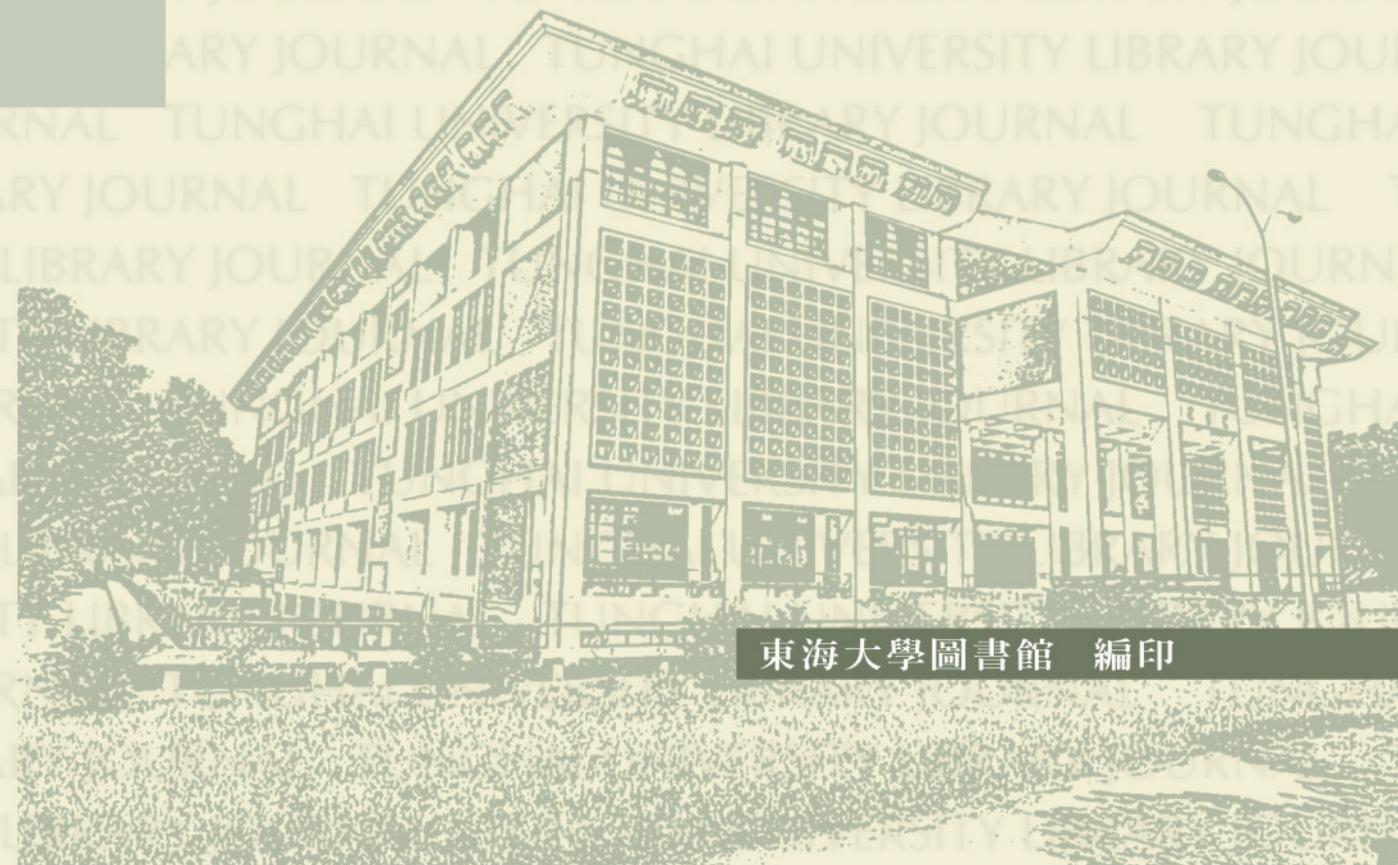
【第五十六期】



雙月刊

2016年1月15日創刊

東海大學圖書館 編印



東海大學圖書館 編印

#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

## 第 56 期目次

### 【論文】

- 1 周志仁 穿月噴雲一氣通—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漢詩的縱貫鐵道書寫(下)
- 21 蔡慧崑 《詩經》諷諭精神之傳承—朝鮮詩人丁若鏞「三吏」對杜甫「三吏」的接受與轉化
- 40 任允松 敦煌蒙書《古賢集》的史觀意識析探

### 【書評】

- 60 陳惠美 謝鶯興 《中國古籍裝幀形制考據與實踐》讀後

### 【手稿整理】

- 73 謝備殷 謝鶯興 徐復觀教授《中國藝術精神》手稿整理系列(六):中國藝術精神主體之呈現—莊子的再發現

### 【東海特藏整理】

- 94 王雅萍 台灣雜誌創刊號《深耕雜誌》
- 103 陳惠美 謝鶯興 館藏普通本線裝書總目·史部編年類(一)

### 【大事記】

- 122 編輯室 圖書館大事記(2021.01.01~2021.02.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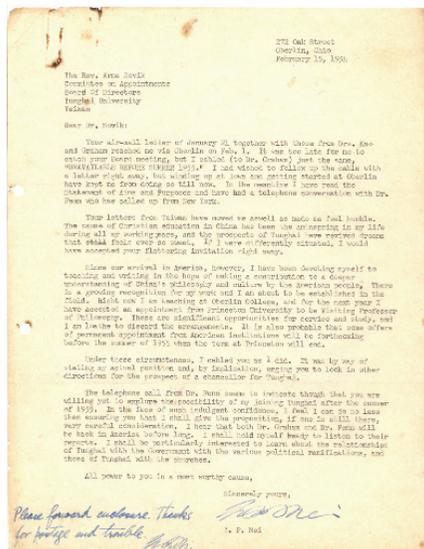
### 【館藏文物選粹】

- 0 陳 曦 館藏文物選粹(五十六):梅貽寶博士辭謝赴東海大學校長之邀

## 館藏文物選粹(五十六)：梅貽寶博士辭謝赴東海大學校長之邀

讀者服務組 陳 曦

「梅貽寶博士辭謝赴東海大學校長之邀」為東海大學圖書館典藏之學校早期文件之一。此文件為英文書信，全信共一頁。收件人為牧師魏德光（Arne Sovik），時任提名委員會主席。寄信時間為 1954 年 2 月 15 日。收件地址為臺灣東海大學（The Rev. Arne Sovik / Committee on Appointments / Board of Directors / Tunghai University / Taiwan）。寄件人為梅貽寶博士（Y. P. Mei），寄件地址為奧柏林（272 Oak Street / Oberlin, Ohio），信末有親筆簽名。



全信旨在婉謝赴東海大學任校長一職之邀，針對先前回覆之“UNAVAILABLE BEFORE SUMMER 1955”再次表示與之前相同的意願，即不便出任東海大學校長。梅貽寶教授於信中說明自抵美之後，即投身到教學和寫作，期許自身的貢獻能使美國人民能更深入地了解中國哲學思想與文化，這項工作目前已累積初步成果，在此領域立下根基。梅貽寶教授時任教於奧柏林學院，並已獲普林斯頓大學邀請，來年（1955 年）將以哲學領域訪問學者身分前往普林斯頓大學。梅貽寶博士表示目前的計畫皆是難能可貴的機會，無意做出改變，且在訪問普林斯頓大學之後，亦可能得到某些美國機構長期任用的機會。

梅貽寶博士藉由闡述己身現況，力勸東海大學校長一職需另覓人選。芳衛廉博士似乎有意探詢 1955 年夏天之後的可能性，然而自己只能保證會再次審慎考慮此提議。

信末有手寫留言“Please forward . Thanks for postage and trouble.”留言的簽名與信末簽名相似，應出自梅貽寶教授之筆。

## 論文

## 穿月噴雲一氣通—

## 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漢詩的縱貫鐵道書寫(下)

周志仁\*

※ ※ ※

## 五、海線鐵道修築及沿途城鎮發展

清廷統治時期，百弊叢生，鐵道運輸入不敷出，仰賴官方奧援。及至日治時期，臺灣鐵道捨棄中國科層式的人治模式，而改循日本科學化的企業管理，大正 6（1917）年鐵路營運經常性年歲入高達 570 萬圓，歲出為 350 萬圓，<sup>86</sup>此時還因運輸不及發生「滯貨事件」，<sup>87</sup>爲了疏運費，總督府特別撥款 1,500 萬修築海線鐵道。

海線鐵道建設花費縱貫鐵道 7 年的淨利盈餘，並且不易修築，<sup>88</sup>但更大的阻力是山線地區各界人士擔心被邊緣化而群起反對，直到明石元二郎總督採強硬手段，才平息異議。大正 11（1922）年，海線鐵通車滯貨解除，<sup>89</sup>海線的交通大幅改善，<sup>90</sup>當時高美（清水）區長陳基六，即常藉火車往返各地，例如寫成於大正 13（1924）年的〈員林道中〉，即述及交通方便：

騷壇待鬥新旗鼓，驛路相隨舊劍琴。

\* 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現任臺中市文化局葫蘆墩文化中心展演股股長。

<sup>86</sup> 戴寶村、蔡承豪，《縱貫環島臺灣鐵道》（臺北：臺灣博物館，2009 年 11 月初版），頁 12。

<sup>87</sup> 隨著歐戰勃發的景氣刺激，還有 1916 年台灣勸業共進會的舉行，整個島上的產業快速發達，到 1917 年下半年度，待運的鐵道貨物激增，但從貫鐵路三義至泰安大坡度的瓶頸，造成了全線的滯貨現象，鐵道部增購車輛並日夜兼行加以運輸，仍無法解除。詳見洪致文，《珍藏世紀台灣鐵道—幹線鐵路篇》（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公司，2000 年 12 月 31 日初版），頁 34。

<sup>88</sup> 海線地帶風沙大，海埔地土質鬆軟，河川出海口處河面廣闊等因素交織下，需有更高的鐵道架設技術。

<sup>89</sup> 旅行人誌編輯室，《臺灣鐵道祕境慢旅》（臺北：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公司城邦分公司，2016 年 3 月初版），頁 21。

<sup>90</sup> 高成鳳，《植民地の鐵道》（東京都：株式会社日本經濟評論社，2006 年 1 月 18 日），頁 27。

汽笛一聲天欲暝，菊花香裡下員林。<sup>91</sup>

海線鐵道的通車，陳基六無須跋山涉水至臺中或彰化，才能搭火車，節省下的時間令其更悠閒，身心更舒暢。

除了海線居民得以便利出遊，外地的居民也更能夠來往該地，斗六吟社詞宗黃紹謨〈留別梧津楊子江詞友〉，即道出海線火車直達的喜悅：

桃源此日幸知津，詩酒論交分外親。

回首同車沙轆驛，春風一路送行人。<sup>92</sup>

透過海線的鐵道，黃紹謨可以搭車至沙鹿，再轉手押臺車至梧棲訪文友，火車的便利可以免去舟車勞頓，留下更美好的回憶。

海線鐵路解決滯貨的問題，至此海線成爲縱貫鐵路正線，山線反而成爲臺中支線。但海線鐵道的興建，並未使臺中市區沒落，反而因爲山海線的完成，使得南北人群與貨物分流（爾後貨物列車多經海線，長途客運快車多走山線）更加暢通，帶動臺中地區的發展，也進而帶動全臺各地區資源的開發。

滯貨解除後，許多工廠在驛站旁紛紛成立，楊爾材甫自嘉義東石遷至打貓，經營釀酒業，留有〈打貓竹枝詞〉，即如詩中所言：

鐵道驛前造酒場，香醪<sup>93</sup>名號是瓊漿<sup>94</sup>。

東西鼎峙雙舂米<sup>95</sup>，汽笛聲吹亂夕陽。<sup>96</sup>

民雄舊名「打貓」，後因名稱不雅而改名。民雄位居嘉義北部，是雲林與嘉義間的交通輻輳地，許多農產品在此聚集，在詩中可以看到日治時代造酒業的興盛。時至今日，民雄酒廠仍以「玉山高粱」，聞名全臺。

嘉義的繁榮，更勝民雄，首位辯護士賴雨若〈嘉義市制施行五週年<sup>97</sup>紀念詩〉，見證因鐵道運輸帶來城市的繁華：

東西南北交通便，貨物行人集驛頭。

<sup>91</sup> 此詩收於林資修，《櫟社第一集·鰲峰詩鈔》，又載陳漢光，《臺灣詩錄》。

<sup>92</sup> 此詩收於《臺南新報》，「詩壇」欄，1922年3月24日，第6版。

<sup>93</sup> 香醪，混含渣滓的濁酒。

<sup>94</sup> 瓊漿，比喻美酒。《楚辭·宋玉·招魂》：「華酌既陳，有瓊漿些。」

<sup>95</sup> 雙舂米，搗米去糠，使成潔淨的白米，以便製酒。

<sup>96</sup> 此詩收於楊爾材《近樗吟草》，又載《臺灣文藝叢誌》第1年第5號，「詞苑」欄，1919年5月1日。

<sup>97</sup> 1930年，嘉義街改制爲嘉義市。

軌道中心誇島內，登山鐵道報全球。<sup>98</sup>

由於縱貫鐵路的開通，以及阿里山林業的開發，使嘉義成爲貨物集散地，火車站總是熙來攘往的人潮，十分地熱鬧。嘉義的崛起得利於縱貫鐵道、北港糖鐵、阿里山林鐵，三條鐵道在此交會，成爲嘉南平原的大城市。

## 六、日治詩社擊鉢的「火車」意象

康熙 36（1697）年，郁永河因福州火藥庫爆炸，奉命渡臺採硫磺，自臺南府城經過近一個月的長途跋涉，方能到達北投，<sup>99</sup>待縱貫線全線通車，朝發夕至的臺北、高雄一日生活圈已達成。新的交通型態改變臺灣人的生活方式，這些改變，被當時文人以漢詩體裁描繪出，也成爲文學與科技結合的新形式。

日本佔領臺灣後，將日本鐵道制度移植臺灣，<sup>100</sup>除客車分等，<sup>101</sup>更發行夜車。有臺灣現代文學之父美譽的賴和，曾以漢詩作〈十一月九日寄與烈兄稿〉，即寫自臺北搭夜車回彰化的情景：

無須問消息，不日搭車回。殘月疏星裡，寒風汽笛催<sup>102</sup>。

夜車深夜由臺北開出，至彰化即是清晨時分，冬季曉光未開之時，冷冽難當，但賴醫師反而有踽踽獨行的颯爽。同時期有搭乘夜車經驗的，還有高雄的鄭坤五，他的〈爲開畫會夜車北上值五月十三賽會車中人滿苦無立錐之地〉寫道：

<sup>98</sup> 此詩收於《壺仙詩集·壺仙賴雨若先生遺稿二集》。

<sup>99</sup> 許俊雅，《裨海紀遊校釋》（臺北市：國立編譯館，2009年6月初版），頁240-243。

<sup>100</sup> 1872年，日本第一條鐵道—新橋橫濱線誕生，讓原本10小時的旅程，縮短爲53分鐘，但因爲票價過高，僅有外國人與官員搭乘，一般人無法企及。爲了鼓勵民眾踴躍搭乘，特別將車廂分爲三等，差別費率的訂定，甚至捨棄按里程單價乘以距離的收費制度，改依遠距離遞減法計算，讓票價更親民，從而帶動搭乘火車的人口。

<sup>101</sup> 據林衡道口述：當年的火車車廂是木造，車身顏色是黑色的，一等車則塗有一條白色橫帶，二等車是藍色帶，三等車是紅色帶，顏色鮮艷奪目。不但車廂是木造，三等車的椅子也是木造。一等車，車內有幾個小房間，每一房間坐四人，座位是皮沙發。二等車沒有隔成小房間，座位是藍色的絲絨沙發。三等是木椅，四個人面對面而坐，木椅的顏色是金黃色的，相當雅致。詳見林衡道，《戀戀臺灣風情—走過日治時典的這些人那些事》（臺北市：紅螞蟻圖書公司，2014年7月1日2版），頁90。

<sup>102</sup> 此詩收於《賴和手稿集·漢詩卷上》（彰化：賴和文教基金會）。

旅客座盈人汲汲，寢臺車隱夜悠悠。

世間何處愁拘束，肯費黃金便自由。<sup>103</sup>

後來的夜車加掛臥舖車廂，讓行旅更方便，<sup>104</sup>然而若為節省經費，想搭普通夜車，或在大節日時，可能也會有苦無立錐之地的窘境。

大正 3（1914）年，又開始南北對發直通「急行」列車，根據記載，開通的縱貫線北高急行，早上 8 時 50 分由基隆發車，9 點半至臺北，於 13 時 2 分至臺中，最後在 17 時 5 分抵高雄，臺北至高雄旅程僅花費 7 小時 35 分。<sup>105</sup>當時列車編成由南向北依序為行李車、頭、二、三等木造客車，自大正元（1912）年起也掛食堂車，提供西餐或快餐。在當時快捷的火車，不僅是人人消費得起的交通工具，更是出外最好的選擇。瀛社詩人歐陽朝煌〈汽車〉，即寫出當時的景象：

朝發南瀛夜北津，行成千里幾時辰。

青黃<sup>106</sup>兩岸未明辨，已歷山巔過水濱。<sup>107</sup>

火車的便捷迅速，從臺南至臺北朝發夕至，還未看清新秧或熟穀，已經穿山過水，到達目的地。

清領末期，只有基隆、新竹間有火車運行，明治 41（1908）年後火車已延長至打狗，火車成為臺灣人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此時南北詩社的擊鉢吟，亦常以「火車」為題，屢見不鮮，如嘉義海東擊鉢吟社詩題即以火車為題，賴雨若〈火車〉擬題如下：

煤煙瀟漫水煙蒸，笛響輪迴勢莫凌。

軋軋聲中山野走，行舟陸地未為能。<sup>108</sup>

詩社擊鉢最常以熟悉的事物為題，以考驗詩人的才思與涵養，全詩將當

---

<sup>103</sup> 此詩收於《九曲堂詩集》〈鸚鵡篇〉，又載《臺灣日日新報》，「詩壇」欄，1925 年 7 月 12 日，第四版、《臺灣時報》，「詞苑」欄，1925 年 8 月 15 日。

<sup>104</sup> 當時的寢臺列車，頭等臥舖加 7 圓，二等下舖外加 4 圓，上舖 3 圓，普通車廂沒有睡舖，如路途中肚子餓了，那時還有鐵路便當，用小木匣裝，附湯，一份也只要五毛錢。

<sup>105</sup> 洪致文，《珍藏世紀台灣鐵道——幹線鐵路篇》（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公司，2000 年 12 月 31 日初版），頁 118。

<sup>106</sup> 青黃，指綠色的新秧與黃熟的舊穀。宋·范成大〈晚步東郊〉：「水墨依林寺，青黃負郭田。」

<sup>107</sup> 此詩收於《臺灣日日新報》，「瀛社詩壇」欄，1913 年 9 月 7 日，第 6 版。

<sup>108</sup> 此詩收於《壺仙詩集·壺仙賴雨若先生遺稿初集》。

時火車行進間的情景描摹得有聲有色，大正 5（1916）年，潭子秀才傅錫祺也在霧峰萊園的櫟社小集擊鉢吟，以〈汽車〉為題，小試成韻：

天下軌皆同，轉轉疾似風。五行炎上火<sup>109</sup>，百足不僵蟲<sup>110</sup>。

寒澆<sup>111</sup>行舟力，張騫鑿空功。往還五日日，得便感神工<sup>112</sup>。

鐵軌運行快速如風以火驅動，列車長長就如蜈蚣般，就如寒澆能陸上行舟，也能像張遷行至千里之外，往還迅速，真令人讚嘆西方科技的功勞。本首詩將中國五行、神話與歷史故事，與西方科技相結合，臺灣人海島民族的性格造成對西方事物不排斥，反而有更多包容性。土城詩人王少濤在昭和 39（1906）年詠霓吟社課題〈火車〉，所感所發亦有相同的況味：

似箭驅馳疾汽車，往來載客賦歸歟。

何誰奪得天公巧，共說西洋製造初。<sup>113</sup>

臺灣人具備島國民族的特質，對於新事物接收度特別快，尤其在乙未之時見到日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以新器物攻城略地，治理臺灣期間，又不斷地引進科技事物，如自來水、電話、汽車……等，臺灣人屬於島民性格，對於有益民生的新事物，不僅不排斥，甚至享受其帶來的舒適與便利性。

## 七、車站送往迎來的場景

臺灣的火車站的名稱，從日治初期的「停車場」，到了大正 9（1920）年起，陸續改稱「駅」。<sup>114</sup>日本人對於車站建築，絕不僅著重清廷票房的

<sup>109</sup>炎上火，火之性炎盛而上升，故稱火為「炎上」。《書經·洪範》：「水曰潤下，火曰炎上。」

<sup>110</sup>不僵蟲，指蜈蚣，或馬陸。

<sup>111</sup>寒澆，一作稟，妘姓，寒氏，名澆，因曾被封於過，又稱「過澆」。夏朝東夷伯明氏人，父寒泥。寒澆為人力大，頗善水性，強於水戰，甚至能陸地行舟。被後世尊為水仙尊王之一。

<sup>112</sup>此詩收於傅錫祺《鶴亭詩集》。

<sup>113</sup>此詩收於《詠霓吟社詩集》。

<sup>114</sup>日文中的「駅」一詞，是由江戶時代的宿駅制度發展而來。明治時代後，「駅」的稱呼，讓人聯想到過去的舊時代，因此，「ステーション」(station)站和「停車場」的稱呼，成為象徵新時代文明的名稱。1914年東京停車場改建完成，並正式命名為「東京駅」，隨後全國進行更名，至今日文仍以「駅」代表車站。詳見富田昭次著；廖怡靜譯，《觀光時代：近代日本的旅行生活》（臺北市：蔚藍文化出版公司，2015年9月初版），頁195-197。

功能。在日治時代縱貫線起始站—基隆，採用文藝復興樣式，原是清朝終點的新竹站，更從簡陋的木屋，搖身成為華麗的巴洛克式建築<sup>115</sup>，許多未遭戰火或都市化拆除的火車站<sup>116</sup>，皆能見證日治時期公共建築的用心，也皆成為臺灣當世知名古蹟。



日治時期興建的新竹車站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臺北車站是日治時期最大車站，也設計成如同東京車站的辰野式<sup>117</sup>具中央車站功能的建築，自總督府引進標準時間制後，火車行進有賴時間的準確性，大門前懸有大時鐘，<sup>118</sup>鐘錶未發達的時代，各車站的高懸的大時鐘，成為各地方民眾對時的依據，也培養民眾守時的觀念。日治時期火車準點率極高，漢詩述寫因遲到而搭不上火車作品也甚多，如楊爾材〈歸自羅山赴汽車不及〉：

曉到羅山暮欲歸，驛亭車去疾如飛。

茫茫客思憑誰訴，獨自徘徊對夕暉。<sup>119</sup>

此時楊爾材從民雄至嘉義洽公，因趕不上火車，只能獨自對著夕照，空有望塵莫及的慨嘆。但火車偶爾也會因故而誤點，臺中的王竹修即有一次在員林遇上了火車大誤點，在焦躁枯等時，作〈次說劍員林驛待車不至口占韻〉：

<sup>115</sup>大正 2 年 (1913)，日人斥資 22,500 銀元興建新站房，由松崎萬長設計，完工後，一棟磚造，充滿巴洛克風格的新竹驛出現。這種流行於大正年間的建築式樣，除了當作城市的玄關，也有誇耀帝國統治的意味。擁有中央盃甲式鐘塔，四急斜式瓦頂的新竹驛，入口處上方有一個三角形的山頭，左右側各有一個牛眼窗，下方則設計成拱門，拱門兩側各有一根墊高的圓柱，超凡的氣勢，成為台灣車站建築的代表作。詳見戴震宇，《台灣鐵道完全揭祕》(新北市：遠足文化事業公司，2010 年 7 月 1 版)，頁 45。

<sup>116</sup>如新竹火車站、臺中火車站、臺南火車站、高雄火車站……等。

<sup>117</sup>辰野金吾，日本建築師，畢業於工部大學校 (今東京大學工學院)，後留學英國，為日本第一代建築師，最著名作品為東京車站。

<sup>118</sup>莊永明，《城內舊事：臺北建城 130 年》(臺北市：臺北市文獻委員會，2014 年 8 月初版)，頁 238。

<sup>119</sup>此詩收於楊爾材《近樗吟草》。

萬家煙火晚燈銷，驛路停鞭太寂寥。

聞說飛車能守信，豈知不及廣陵潮<sup>120</sup>。

臺灣的火車一向準時，卻在今晚誤點。晚上萬家燈火，令員林火車站更顯寂寥，當時也無即時顯示的跑馬燈或是像現代 app 其他公告方式，唯一能做的事—就是等待。

日治時期許多人利用火車至遠地洽公、行旅、通勤，再加上夜車的通行，車站終日送往迎來，人聲鼎沸，最常見就是親友之間的送行與離別，就如同瀛社社長謝汝銓〈驛頭所見〉一詩所述及情人的送別：

驛頭潛送遠游人，癡立庭中淚濕巾。

強把檀郎<sup>121</sup>輕載去，無情聲動火車輪。<sup>122</sup>

火車載人到遠方，郎情妹意也將思念帶向遠方，離人心中秋，無情的火車聲化為離人淚，新港區街長林維朝〈寄懷〉，亦有異曲同工的妙境：

臨歧<sup>123</sup>話別不勝情，相對無言暗淚傾。

偏是驛頭風笛急，聲聲吹作斷腸聲。<sup>124</sup>

火車所行之處山高水長，自此一別，有百里之遙，然而送行的心境南北皆同，為到愁人耳皆為斷腸聲，車站角落旁互道思念、訴盡衷情、添飯加衣……臨別絮語，是車站日日上演的場景。由火車、驛頭、汽笛所構築送別的畫面，在今天流行歌詞字裡行間亦常見<sup>125</sup>，「車站送別」也成為日治時代漢詩盛行題材之一。

除了送別的離愁，也有迎接來賓前來的喜悅，如嘉義第一位西醫林玉書〈重來臺島王亞南氏道出嘉義偕鴉社同人歡迎於驛前車次〉，即是迎接闊違多時的大書法家王亞南：

一別動經歲，相逢喜欲顛。春風猶料峭，明月正團圓。

<sup>120</sup>此詩收於《臺灣新聞》，「臺灣漢詩壇」欄，1940年2月22日，第6版。

<sup>121</sup>晉潘岳小字檀奴，因其容貌美好，風度瀟灑，為當時眾多婦女心儀的對象，後世遂以「檀郎」做為婦女對夫婿或所喜歡的人的美稱。

<sup>122</sup>此詩收於《奎府樓詩草》。

<sup>123</sup>相送至歧路而分別。唐·賈島〈送陝府王建司馬〉：「杜陵惆悵臨歧餞，未寢月前多展蹤。」

<sup>124</sup>此詩收於陳素雲，《林維朝詩文集·初囀集》。

<sup>125</sup>如張秀卿〈車站〉、姜育恆〈驛動的心〉、林強〈向前行〉等所描寫者。

好把花燈鬧，來迎彩筆妍。願教倍矍鑠，詩酒共流連。<sup>126</sup>

江蘇文士王亞南，任職於中國大陸各大學校的圖畫科，兼擅六體，是當時有名的書畫家，曾擔任板橋林家西席，大正 14(1925)年以 75 歲高齡，二度渡海來臺遊歷，所到之處備受各地文人禮遇，更為臺灣畫壇刮起一陣旋風，車站成為眾文友為其接風洗塵處。

除了私人情誼，日本治臺官員亦利用火車視察各地建設，時任臺中區長的櫟社詩人林耀亭，即必須前往接待，〈豐原驛歡迎平塚總務長官<sup>127</sup>遇雨〉，即是抒寫雨中接車的心情：

輶軒<sup>128</sup>問俗聽民聲，一視同仁答聖明。

天意亦知公素抱，<sup>129</sup>沛然霖雨慰蒼生。<sup>130</sup>

此時正邁入殖民的中後期，開始同化政策，總督府民政長官平塚廣義至全島各地巡查，豐原居臺中門戶，為交通輻輳地，常為總督府官員視察臺中的首站，每逢南下蒞訪，總是將車站擠得水泄不通，擔任臺中區長的林耀亭，也不免北上豐原，為長官接風洗塵。民政長官來地方本屬難得，透過面對面的接觸，也能將民情上達，所以被視為「及時雨」。



左圖：日治時期興建的臺中車站

右圖：日治時期興建的高雄車站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 八、鐵道促進詩友互訪

<sup>126</sup>此詩收於《臺南新報》，「詩壇」欄，1930年2月18日，第6版。

<sup>127</sup>平塚廣義(1875年9月2日—1948年1月26日)，日本山形縣人，於1932年1月接任臺灣總督府總務長官，積極於臺灣實施同化政策。

<sup>128</sup>輶軒，古代天子之使臣所乘的輕便車子。

<sup>129</sup>素抱，平素的志趣、抱負。

<sup>130</sup>此詩收於林耀亭《松月書室吟草》。

隨著縱貫鐵道的開通，交通往來更加便捷，全臺文友交流亦更加活絡，除了所屬詩社的集會，也陸續開辦了全臺詩人大會。如大正元年（1912）年 11 月 23 日，瀛社詩人亦是基隆商業鉅子的顏雲年，在新居「環鏡樓」落成，舉辦了全臺詩人大會，同為社友的《臺灣日日新報》漢文部記者林馨蘭，作了一首〈遊淡北偶成〉，即寫搭火車前往的喜悅：

故人書再至，邀我宴基隆<sup>131</sup>。有約三詞客，<sup>132</sup>快乘萬里風。<sup>133</sup>

當時林馨蘭與其他三位友人乘火車赴邀，為見闊別多時的好友。大正 10（1921）年，瀛社亦假臺北大稻埕春風得意樓開辦全臺聯吟詩會，昭和 5（1930）年，也於臺中公會堂興辦聯吟，至昭和 9（1934）年，全臺詩人亦匯集在嘉義公園，一起吟詠阿里山之美，一次又一次的聚會，加深了彼此間的感情，也促成詩人之間的互訪，最能代表者莫過於王少濤。

王少濤個性日曠達不羈，喜愛交友，火車成為他往來四方的最佳工具，王少濤自署「詩癡」，熱衷於漢詩創作與活動，用詩寫日記。他的文集中就有不少搭火車至訪友詩，如〈訪黃純青詞兄〉：

為愛新晴尋舊雨，樹林小驛暫停車。

老來合敘林泉樂，醉月哦詩或灌花。<sup>134</sup>

黃純青與王少濤，二人年歲相當，生長的背景與環境亦相同，結識一生，在黃純青未搬離樹林至臺北市中山北路的晴園定居時，亦常登訪，一起飲酒賦詩，或共享林泉之樂。王少濤磊落不羈，喜性吟遊，又因為交友滿天下，所以行縱亦常飄乎不定，〈夜宿筱雲樓寄懷基六<sup>135</sup>詞宗純甫<sup>136</sup>社兄〉一詩最能看出：

北投遊罷作南遊，琴劍西風憶舊儔。

<sup>131</sup> 作者註：「社友顏雲年君廣廈落成，宏開詩會，東邀數次。」

<sup>132</sup> 作者註：「三詞客謂允白先生，及雲石、籟軒兩社友。」

<sup>133</sup> 此詩收於《臺灣日日新報》，「詞林」欄，1912年12月17日，第3版。

<sup>134</sup> 此詩收於《臺灣日日新報》，「詩壇」欄，1937年2月25日，第8版。

<sup>135</sup> 陳錫金（1867～1935），字基六，號式金，又號蟄村，晚號蟄翁，臺中牛罵頭（今臺中清水）人。晚清生員。日治時期嘗任高美區（今清水）區長及《臺灣新聞報》記者。

<sup>136</sup> 張純甫，名漢，以字行，號筑客，又署老鈍，寄民。光緒 14 年（1888）出生於新竹北門。自幼即喜好歷史、詩文。記憶力復特強，於同門中，即以長於詩作，嫻於歷史而出名。

日午葫蘆墩下驛，今宵暫宿筱雲樓。<sup>137</sup>

王少濤方才遊罷北投，並未急著歸家，反而想到家住神岡的舊友呂厚菴，一早就搭乘火車出發，晌午便到了葫蘆墩（豐原），下車後轉往筱雲山莊。呂家以書香傳家，王少濤在此與好友相聚，盛意拳拳應是一夜無眠，也把這種喜悅寄予清水的陳錫金與新竹的張純甫一同分享。另一位瀛社艋舺詩人王毓卿，也有〈板橋別墅即事〉，描寫文友相聚：

不羨榮華不羨錢，能消清福即神仙。  
滄桑劫後名園在，雞黍筵中雅句聯。  
徑曲恰通湘竹浦，橋彎時繫採蓮船。  
聲聲汽笛催歸急，仰見當頭月半弦。<sup>138</sup>

板橋別墅，即是今日板橋林家花園，位於板橋南方，曲徑通幽，佔地甚廣，中有花園、假山、亭臺、樓閣，主人好客，亦常在園中設宴辦文會，是當時文人駐足之處，其詩中湘竹曲徑、彎橋蓮船等景致，在百年後依然可見。

在意猶未盡之時，月已掛梢頭，汽笛聲聲催促離別，除了專程拜訪，也有在火車上懷想友人，如鹿港施梅樵〈過斗六寄呈丕承<sup>139</sup>先生〉，即是在車上憶友：

驅車南山下，遊子念行役。<sup>140</sup>長途生悲風，行行我心惻。<sup>141</sup>  
忽忽日昏暮，<sup>142</sup>停車斗六驛。憑檻望君家，相去但咫尺。<sup>143</sup>

施梅樵因為公務驅車南下，8月的天氣，內心卻生起寒風，令自己心中悲痛，火車疾行不久，已是日暮時分，車子停在斗六站，遠望即是好友黃紹謨的住處，猶憶十年前受邀至黃家作客，座中豪飲放歌，歷歷在目。此時卻因公務煩憂而不能下車訪友，徒添傷感。

日治時代搭火車為保護乘客安全，避免落軌意外，火車若未到站，

<sup>137</sup> 此詩收於《臺灣日日新報》，「南瀛詞壇」欄，1918年12月12日，第3版。

<sup>138</sup> 此詩收於《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瀛社詩壇」欄，1909年10月13日，第4版。

<sup>139</sup> 黃紹謨（1868-1934），字丕承，號臥雲，晚號雲林逸叟，活躍於斗六西螺一帶詩社，詩集有《東遊百詠》。

<sup>140</sup> 行役，指因公務等事而出行。

<sup>141</sup> 惻，悲痛。

<sup>142</sup> 忽忽，匆匆。《楚辭·屈原·離騷》：「欲少留此靈瑣兮，日忽忽其將暮。」

<sup>143</sup> 此詩收於《臺灣日日新報》，「南瀛詞壇」欄，1915年8月5日，第3版。

嚴格禁止旅客在月臺上逗留，因此搭車前必須在候車室等待。列車分爲三等，候車室亦分爲頭、二、三等，當時車站空間並不大，因此十分容易遇到友人。新竹詩人劉克明即在臺北車站與曾任新竹知事櫻井勉相逢，留下〈臺北驛喜晤櫻井兒山<sup>144</sup>先生〉一詩：

三月春江百尺瀾，雲間仙客扁舟安。  
童顏鶴髮欣公健，玉振金聲愧我難。<sup>145</sup>

此時在異地，偶遇故人特別興奮。櫻井勉並不熱衷功名，在臺僅一年餘，不久即返回日本悠遊林下，十餘年後再見櫻井，已年逾古稀，依然聲若洪鐘，身體健朗，如仙客般卓立翩然。無獨有偶的，還有澎湖楊爾才，在嘉義遇到同鄉歐清石，留下〈羅山驛路喜晤歐清石<sup>146</sup>先生次韻敬呈〉：

貫耳如雷仰盛名，欣從客路挹韓荊<sup>147</sup>。  
情深桑梓<sup>148</sup>知多少，難禁歡呼一笑傾。<sup>149</sup>

他鄉遇故知，是人生三大樂事。出生澎湖的歐清石，夙有遠志，爲鄉里所重。在嘉義火車站遇到熟悉的故舊，豈有不欣然歡樂？隨著火車的便利，這種驛頭相逢滿濃濃喜悅漢詩，也就越常見諸於世了。

## 九、火車旅遊促成臺灣漢詩創作高峰

臺灣自引進火車後，縮短了路程，搭乘火車速度雖快，但最不方便即是行李問題，上南往北，拖著行李在車站候車，又要越過鐵軌，拖著大包小包上月臺，令旅途頗感不便，當時無天橋、地下道，亦無手扶梯及電梯等先進設施，由朱自清〈背影〉一文中，可見當時穿越月臺的艱辛。

<sup>144</sup> 櫻井勉（1843-1931），號兒山，日籍詩人。明治三十年（1897），日治時期第一任新竹縣知事。雅好詩文，與新竹文士遊歷古蹟名勝，皆有唱和。

<sup>145</sup> 此詩收於《臺灣日日新報》，「詞林」欄，1914年5月13日，第3版。

<sup>146</sup> 歐清石，字寓浪，澎湖馬公人。1917年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乙科師範部畢業後，任職澎湖公學校訓導及澎湖郡役所，1928年辭卸工作後，負笈日本留學。1930年3月日本畢業於早稻田大學專門部法律科，後又通過高等行政科及司法科考試，於臺南市開業擔任辯護士，有民族思想，不與日本人合作。

<sup>147</sup> 李白〈與韓荊州書〉云：「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乃李白上書向刺史韓朝宗自薦之意，藉以表示對方聲望極高。

<sup>148</sup> 桑梓，語本《詩經·小雅·小弁》：「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後借指故鄉家園。

<sup>149</sup> 此詩收於《臺灣日日新報》，「詩壇」欄，1919年6月27日，第6版。

日本統治臺灣後，臺灣鐵道設有行李託運制度，民眾只要到站領取即可，無須提著大包小包乘車，十分便民。明治 29（1896）年日本鐵道，首次引進負責搬運行李的紅帽子（red cap）<sup>150</sup>，至明治 36（1903）年也引進至基隆港，最後全臺各大車站均可見其的身影。霧峰林幼春〈行李〉一詩，即道盡此便捷制度：

驛頭車馬日連連，寶囊珠箱捆載便。

我亦崩緜<sup>151</sup>藏一劍，出門從此便飛仙。<sup>152</sup>

雖然車站前車水馬龍，但只要能夠將行李捆載方便，便可以輕鬆自在出遊。大正 10（1921）年英國北婆羅洲政廳理民官魯特（Edward Owen Rutter）在任期屆滿返回英國途中，於 4 月 3 日至 11 日，在臺灣進行由南到北的旅行，即十分讚許臺灣的行李制度<sup>153</sup>，認為有條不紊的管理制度優於雜亂無章的英國。昭和 9（1934）年，身兼加拿大中國學院及美國國會圖書館顧問的學者江亢虎，應邀來臺訪問，也曾對臺灣鐵道設備的便利性，給予「可與歐美列強抗顏」<sup>154</sup>的讚美。

---

<sup>150</sup>1896 年（明治 29）負責搬運行李的「紅帽子」（赤帽）登場，是從私鐵之雄——山陽鐵道在主要車站設的行李搬運伏發展而來。「紅帽」是取自美國同種職稱「red cap」東京車站於 1914 年（大正 3）開業之時，其人數眾多，甚至可以數出高達 78 位。富裕階級的乘客，都會雇請紅帽子協助。詳見富田昭次著；廖怡靜譯，《觀光時代：近代日本的旅行生活》（臺北市：蔚藍文化出版公司，2015 年 9 月初版），頁 194。

<sup>151</sup>蒯緜，用草繩纏結劍柄。《史記·孟嘗君列傳》：「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耳，又蒯緜。」裴駟集解：「言其劍把無物可裝，以小繩纏之也。」

<sup>152</sup>此詩收於曾笑雲《東寧擊鉢吟前集》。

<sup>153</sup>一如在日本，在福爾摩沙鐵道上使用的是高效能的美式個人行李託運系統，旅行的困擾因而減到最低。英國從來不採用這套做法，在守衛車廂四周你推我擠地搶行李的種種亂相象都將一掃而空，也能排除乘客隨行李掉出車外的險象。當你到達目的地時，你即將投宿的旅館已派出腳伕在月臺上等候，他會收下號碼單，為你召來人力車或汽車，幾乎就在你抵達旅館，準備入房之際，你的行李也進房間了。既不必揪心地懷疑行李有沒有送上火車，也不必在到站時你推我擠地領取行李，更不必租一輛公共汽車把行李從火車站送到旅館。參見歐文·魯特，《1921 穿越福爾摩沙：一位英國作家的臺灣旅行》（臺北市：遠足文化事業公司，2017 年 11 月初版），頁 136-137。

<sup>154</sup>江亢虎說於《臺遊追紀》一書曾記錄此行的各項見聞：每站皆有揭示牌，標明附近名勝及其路徑，及本站與上下兩站間的里程，及當地海拔高度尺數。大站皆設飲食店、雜貨店。其腳夫、汽車夫、人力車夫，均依官定價格，絕無需索爭論之事。車站售票處、待車處、行李過磅處，雖極鬧忙，亮不擁擠，亦無遺失。秩序如此，可與歐美列強抗顏矣。詳見魚夫，《臺北城·城內篇：你不知道的古老建築、古早味 60 選》（臺北市：遠見天下文化出版公司，2016 年 11 月 15 日初版），頁 25。

隨著縱貫鐵道通車，臺北火車站已成為全島交通中樞，<sup>155</sup>為彰顯日本政府對臺灣統治的成績，<sup>156</sup>特別邀請留德建築家松崎萬長男爵前來設計鐵道大飯店，此飯店為紅磚建造的英國後期文藝復興式樣的花園洋房，金壁輝煌，非常美觀，<sup>157</sup>食器與餐點十分講究，不遜日本大城市的豪華飯店。鐵道大飯店第一批顧客，即是來臺灣主持臺灣縱貫鐵道全通通車大典的閑院宮載仁親王，以及海內外觀禮的貴賓，<sup>158</sup>住宿期間也舉辦夜宴，邀請各方名流參與。陳洛為當時臺北鹽務總管主任，也受邀參與盛會，並留有〈鐵道旅館全通式夜宴恭賦〉，見證盛宴：

一陽來復小春暄，鯤島維新又紀元。

葡酒華筵擎菊盞，<sup>159</sup>松枝綽楔<sup>160</sup>漾苔痕。<sup>161</sup>

此詩描寫縱貫鐵道的開通，令臺灣邁向歷史的新頁，華宴上瀰漫著慶祝的喜悅。然而其富麗堂皇的背後，隱藏著極高的代價<sup>162</sup>，當時一宿的價格，

<sup>155</sup> 大阪商船辦事處位於日治時代臺北火車站旁，在此出售船票服務旅客。由於此地是鐵公路與航運的匯集，所以這裡是來往臺灣、日本各地的交通要津。大阪商船株式會社自 1896 年起開闢定期航線，航行臺灣基隆與日本神戶間，中途停靠門司港（北九州）；1914 年 9 月起，有 6 艘船行駛，每月往返 12 次。詳見施淑宜，《開臺尋跡》（臺北市：立虹出版社，1997 年 3 月初版），頁 256。

<sup>156</sup> 1908 年於臺北站前的鐵道飯店，遠早於 1914 年的東京車站內附設鐵道飯店，無論是日本國內或殖民地都是一項創舉，除了招待內外賓客外，更重要的是透過此建築，讓內外賓客都可以明顯看到臺灣總督府在臺灣經營的成績。詳見黃士娟，《建築技術官僚與殖民地經營業（1895-1922）》（臺北市：國立臺北藝術大學，2012 年 10 月 16 日初版），頁 66。

<sup>157</sup> 據林衡道所述：鐵路大飯店的客店只有 28 間，小巧玲瓏，所有配件都是英國製的舶來品，精美奪目的電燈裝飾固然不必說，餐廳桌子上的刀叉是英國製，連廁所的磁製馬桶也是英國製。吃西餐，水果端出來時，還附有洗手的小碗，一切仿英國維多利亞王朝的派頭，因為明治末年的日本，其國民所羨慕的國家，就是維多利亞王朝的英國。這座飯店建造於明治時代，就是大正時代，在日本本國除了東京以外，也沒有這麼好的大飯店。當年，就是神戶、橫濱、京東、大阪的大飯店都望塵莫及。詳見林衡道，《戀戀臺灣風情——走過日治時典的這些人那些事》（臺北市：紅螞蟻圖書公司，2014 年 7 月 1 日 2 版），頁 88。

<sup>158</sup> 莊永明，《城內舊事：臺北建城 130 年》（臺北市：臺北市文獻委員會，2014 年 8 月初版），頁 241。

<sup>159</sup> 菊盞，菊花酒。

<sup>160</sup> 綽楔，日本人在在家門口擺上「門松」，以示慶祝。

<sup>161</sup> 此詩收於《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8 年 10 月 30 日，第 4 版。

<sup>162</sup> 房價從 3-27 圓不等；餐費方面，早餐 1 圓 50 錢、午餐 2 圓 50 錢、晝餐 3 圓、茶菓 40 錢，是當時來臺訪問的日本皇族、政商名流的首選。詳見鄧志忠，《行進！鐵支路：

等同於一個專科畢業生的月薪。但因飯店其交通便利，後來經常成為日治時期工商發表會辦理的地點，如蓬萊米培育成功發表會，<sup>163</sup>即是在此舉辦。

昭和 11（1936）年，鐵道大飯店又在臺南車站二樓，設立分店。<sup>164</sup>由於臺灣人民生活日漸富裕，到日治時代中後期，在鐵道飯店擺宴，被視為身份地位的象徵。又因食事券（餐券）的發行，<sup>165</sup>自用送禮兩相宜，更使飯店增加收益。



臺北駅前鐵道飯店  
(資料來源:臺灣記憶)

另外，鐵道部除了提供行李、餐飲、旅宿……等新形式的服務外，也透過與各旅館合作票務，旅客只要透過旅館，即可訂購火車票。<sup>166</sup>有了便利的交通設施、完善的行李制度與親民的票價，也增長民眾出遊的意願。日治時期流行的童謠〈坐交通工具〉，即寫出各項交通工具的優點，如「坐火車，看風景」<sup>167</sup>童謠一句，也可以看出當時的火車已經不是單純

---

日治臺灣鐵道寫真》(臺北市：蒼壁出版有限公司，2018年11月初版)，頁29。

<sup>163</sup>1926年4月，一向在日本舉辦的本米穀會移師台灣，在台北市鐵道大飯店召開第九屆大會，在此重大的會議上，伊澤總督正式以蓬萊米為新品種命名。詳見司馬嘯青，《台灣日本總督》(臺北市：玉山社出版事業公司，2014年2月初版)，頁260。

<sup>164</sup>李欽賢、洪致文，《臺灣古老火車站》(臺北市：玉山社出版事業公司，1996年11月初版)，頁71。

<sup>165</sup>陳柔縉，《台灣幸福百事——你想不到的第一次》(臺北市：究竟出版社公司，2011年初版)，頁59。

<sup>166</sup>在福爾摩沙和日本搭火車，倘若你沒預先買好車票，可於出發前一天透過下榻的旅館購買，也可預訂快車的座位。車票會交給旅館的腳伕，他會先帶著你的行李到火車站，貼上標籤並秤重，在你抵達時再將車票及號碼單（每件行李都用一張標記了號碼的標籤表示）交給你；他也會幫你在火車上找到預訂的座位，接著才笑著收下小費、鞠躬退下。參見歐文·魯特，《1921 穿越福爾摩沙：一位英國作家的臺灣旅行》(臺北市：遠足文化事業公司，2017年11月初版)，頁137。

<sup>167</sup>莊永明認為城市童謠大抵是較晚的創作，但原作者也是較難查考，因為流傳快速，而且不限地域性，也很容易成了共同記憶：如〈坐交通工具〉：「坐飛行機，看天頂。坐大船，看海湧。坐火車，看風景。坐公車，錢卡省。坐牛車，順續挽龍眼。坐腳踏車，數街路燈。用行路，玻璃櫥看上明。家己的腳，做車用，免用半仙銀。」莊永明，《臺灣歌謠：我聽我唱我寫》(臺北市：臺北市文獻委員會，2011年12月)，頁188。

的運輸工具，更是臺灣人出外參觀遊賞運輸的最佳選擇。

鐵道部看出觀光旅遊商機，特別於昭和 2（1927）年，與《臺灣日日新報》合作，透過民眾投票的方式，選出臺灣「八景十二勝」。<sup>168</sup>日治時代的臺灣人就像現代人一樣，臺北人到臺南逛古蹟，臺南人來臺北泡溫泉，因此日治時代風景詩，即如雨後春筍，大量出現於刊物中。

除了在臺灣本地宣傳旅遊，<sup>169</sup>鐵道部的員工也飄洋過海，至日本大城市宣傳<sup>170</sup>。昭和 10（1935）年在臺北辦理的「始政四十周年記念臺灣博覽會」，鐵道部使盡全力，<sup>171</sup>將臺灣旅遊推上高峰，曾創下一天 9 萬多人進出的紀錄，成為僅次於東京<sup>172</sup>的車站，<sup>173</sup>足可見鐵道部宣傳的用心。

不同以往的風景詩作，必須實際踏查方能成詩的囿限，有時甚至在侷促的車廂內觀看窗外，文思泉湧即成一詩，如時任新港區長的林維朝，即有〈火車觀月〉：

<sup>168</sup>票選出的八景有：基隆旭岡、淡水、八仙山、日月潭、阿里山、壽山、鵝鑾鼻、太魯閣峽谷，另有一說為烏來、淡水、八仙山、日月潭、阿里山、八卦山、臺南安平、墾丁。十二勝則為：草山、新店、大溪、角板山、五指山、獅頭山、八卦山、霧社、虎頭埤、旗山、大里簡、太平山。

<sup>169</sup>昭和 9 年在台北菊元商行內設置台北驛派出鐵道案內所，除辦理觀光旅行解說外，並委託販賣乘車券，接著在台南林百貨、高雄市內吉井百貨、花蓮市區也分別設置鐵道案內所，建構完整的旅行業務網路。詳見吳淑華，《戀戀煙塵：台灣鐵道之旅特展專刊》（高雄市：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2002 年 12 月初版），頁 23。

<sup>170</sup>當日本舉辦博覽會時，必定會設「臺灣館」，讓對臺灣不熟悉的日本人有機會認識。鐵道部每年修訂發行的《臺灣鐵道旅行案內》，1920 年臺灣已成為日本教育、文化與休閒上極受歡迎的旅遊地。詳見戴寶村、蔡承豪，《縱貫環島臺灣鐵道》（台北市：臺灣博物館，2009 年 11 月初版），頁 78。

<sup>171</sup>1930 年代臺灣鐵路運輸已經非常力，成為臺博會極佳的宣傳展示途徑。當年 6 月中旬開始，在鐵道沿線架起多面宣傳看板，內容分別為：新竹州楊梅站附近的「來台灣博」、台中州南王田車站附近的「秋天來去看台博」、高雄州半屏山腰的「一起去台灣博」。這些大型看板十分醒目，火車駛過，旅客觸目可見，極具招攬效果。基隆港也架起台博看板，向遠渡重洋踏上寶島的旅客呼喚，就連日本東京市郊的秋葉原車站也從 7 月中旬在附近樓房屋頂掛上台博看板，招覽本國人來台暢遊。因應臺灣博覽會的舉行，總督府決定調整縱貫線火車時刻，島內鐵路交通及島外航運的連結運輸效能，因而大提升。詳見程佳惠，《台灣史上第一大博覽會：1935 年魅力台灣 SHOW》（臺北市：遠流出版事業公司，2004 年 1 月 6 日），頁 44、85。

<sup>172</sup>東京車站最高人次為一天 14 萬人次。

<sup>173</sup>徐逸鴻，《圖說日治台北城》，臺北市：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公司城邦分公司，2013 年 10 月初版，頁 57。

汽車歷碌趁宵征，迅疾如飛載月行。

推卻玻璃窗外望，江山指點十分明。<sup>174</sup>

這一首詩是晚上坐火車所作，列車載奔載馳，如載月飛翔，趁著月光皎潔，打開車窗向外望，車外的風景都能清晰明辨。除了觀月，也有望海聽濤詩，香山崎頂海岸線與縱貫線鐵道距離近且平行，不論山線、海線的旅客，舉目皆能見海岸風光，因此，所留下的香山觀潮望海詩特別多，如王少濤〈香山望海〉即寫香山秋季海岸：

車抵香山驛，憑窗一望遙。秋風來萬里，鼓盪海蕭蕭<sup>175</sup>。

火車抵達香山火車站，在車廂內憑窗遠望，新竹風格外冷冽，東北季風蕭蕭襲來，也鼓盪著海面。嘉義秀才林培張，也有〈香山驛望海〉，但所寫的春景又有一番風味：

憑窗遙望海天空，不見樓臺蜃氣紅。

波際漁舟時隱現，恍如煙雨畫屏風<sup>176</sup>。

同樣是憑窗遠望，由於季節與天候的殊異，也因此產生了不同的氛圍，更添不同的詩意。

隨著縱貫鐵道海線的開通，鐵道部也開始大力宣傳通霄與大安等海水浴場，讓夏天就是要戲浪的印象深入人心，全省各地有海水且宜設處必有海浴場。新竹舉人鄭家珍〈丁卯（1927）八月五日同曾許二生遊山腳海水浴場順途至秋濤家小憩〉，所寫即是夏季的海水浴場景象：

十里芳原望眼奢，雷聲隱隱走輕車。

遊蹤我暫經山腳，<sup>177</sup>勝會人爭說海牙。<sup>178</sup>

山腳海水浴場，即是今天的苗栗縣後龍鎮大山水浴場，日本總督府重視全民運動，更重視游泳，再加上鐵道部宣傳，一到假日，總是吸引許多人前來遊憩、戲浪，鐵道部也曾獨立經營福隆海濱浴場（今新北市貢

---

<sup>174</sup>此詩收於陳素雲《林維朝詩文集·初囀集》。

<sup>175</sup>此詩收於《臺灣詩報》第 10 號，「南雅詩壇」欄，1924 年 11 月 16 日。

<sup>176</sup>此詩收於《寄廬遺稿》。

<sup>177</sup>山腳，苗栗縣通霄鎮的舊名。

<sup>178</sup>此詩收於鄭家珍《雪蕉山館詩集》，又載《臺灣日日新報》，「詩壇」欄，1927 年 9 月 28 日，第四版、《詩報》第 60 號，「百納詩話」欄，1933 年 6 月 1 日。

寮區)，此地可遠眺東北角海岸，為北部民眾海泳、休閒的場域。

另外，鐵道部也配合臺灣神社、霞海城隍、打貓大士爺、北港媽祖……等民間熱鬧的節慶活動，開出加班車，並以優惠折扣出售來回票。這些策略十分成功，<sup>179</sup>楊爾材〈打貓竹枝詞〉，即對打貓大士爺祭的描述：

剪紙糊成大士爺<sup>180</sup>，增加鐵道臨時車。

且看七月廿三日，賓客喧囂塞滿家。<sup>181</sup>

在詩中呈現出民雄大士爺誕辰熱鬧的氛圍，為了因應眾多人潮也加開班車因應，讓更多民眾更願意參與，甚至參與過後，隨即籌劃下次的行程。臺北霞海城隍季更是全臺年度盛典，大龍峒詩人黃水沛〈汗漫吟〉，將鐵道部配合活動辦理措施，寫入詩作：

五月十三日，盛矣城隍祭。利在汽車多，降價從勉勵。

善信集全臺，人看人連袂。南士誇黑齒，粵女愛高髻。<sup>182</sup>

在全文中，可以看到對於汽車利用火車增班、降價等利多銷售因素，吸引全臺人士參加。由於策略成功，吸引多方人士爭睹，可以看到嗜食檳榔的南部郎，亦可見著高髻藍衫的客家女。當時臺北俗諺「五月十三人看人」，即是描寫祭典中萬頭鑽動的景象。據當時鐵道部統計，外來遊客可達近 40 萬人次，相關的活動規劃、協辦成功，也令鐵道部收益增加，更帶動國民旅遊新風潮。

當時除了官營的縱貫鐵道，私營的輕便鐵道（糖鐵、鹽鐵、林鐵、手押車）及乘合自動車（客運公車）亦遍佈全臺各鄉鎮，也有飛機、船

<sup>179</sup>以臺北迎城隍活動來看，據 1912 年統計，自農曆 5 月 8 日至霞海城隍延辰（農曆 5 月 13 日）止，外來香客前來膜拜和吃拜拜的人人約近 20 萬，再加臺北及近郊擁至的數字，當有 30 萬之眾。詳見莊永明，《台北老街》（臺北市：時報出版企業公司，1996 年 11 月 25 日 2 版），頁 90。

<sup>180</sup>民雄車站附近的「大士爺廟」，是當地的信仰中心。農曆 7 月 21 至 23 日舉辦普渡祭典。民間傳說清乾隆年間，打貓庄因漳泉械鬥而造成亡魂流離，觀世音菩薩化作大士爺，前來鎮壓並普渡孤魂野鬼。因大士爺無形體，在祭典期間會紙糊一尊神像，讓各地信徒參拜。到祭典末，神像會連同銀紙一同火化，象徵災厄遠離。詳見吳芳銘，《嘉義縣輕鬆遊》（嘉義縣：嘉義縣文化觀光局，2015 年 2 月初版），頁 136。

<sup>181</sup>此詩收於楊爾材《近樽吟草》，又載《臺灣文藝叢誌》，第 1 年第 5 號，「詞苑」欄，1919 年 5 月 1 日。

<sup>182</sup>此詩收於《詩報》第 2 號，「詞林」欄，1930 年 11 月 27 日。

舶與島外連繫，鐵道部也主動與飛機、輪船、巴士、糖鐵、手押臺車……等民間企業合作，利用交通工具結合辦理聯營業務。二次大戰之前，日本領土廣袤，也完成日本本土、南滿、朝鮮……等地的聯運，讓臺灣鐵路票券成爲東亞地區的「悠遊卡」、「一卡通」，使交通運輸行程的安排上更爲便捷，亦可顯見當時鐵道事業蓬勃發展。



左圖：日治時期臺灣鐵道地圖(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右圖：日治時期蛛網般的鐵道(資料來源:臺灣記憶)

## 十、結論

日治時期的全島交通，隨著縱貫鐵道的全線通車，更爲便利，文人遊訪各地，將臺灣美景寫入作品中。日治時期是臺灣漢詩蓬勃發展期，不論是擊鉢聯吟，集詩聯句，抑或各抒胸臆一澆塊壘，在詩作字裡行間，處處可見鐵道或火車的蹤跡，火車已深入當時人心。

清代鐵道漢詩的作者，集中於中北部地區，此現象多與火車線路僅限北部地區有關，因爲對自強新政有印象，所以也會將劉銘傳的自強新政與對其景仰融入詩句中。日治時期，隨著鐵道交通的拓展，南部詩人亦能搭乘火車參與詩人大會，南北詩社聯誼交流，因此訪友詩作亦特別多，訪友的機會多，觸景傷情的詩作也會隨之而來，也產生更多送往迎來機會，創造出許多令人耳目一新的多元創作。

臺灣縱貫就如臺灣交通的任督二脈，火車搬有運無，也無形中成爲臺灣人民生活的一部分，臺灣史家屢屢談及縱貫鐵路，最常提及殖民政府對臺灣資源的掠奪或強效的統治。然而，從詩文的互動中，也可以看

到由於南北方便的交通增加互動，也消弭清代因各族群械鬥而產生緊張的對立關係，對於臺灣意識的形塑，有正面助益。

自明治 41 (1908) 年縱貫鐵道開通後，火車即主導著臺灣交通命脈，直至民國 67 (1978) 年，方由中山高速公路所奪去，火車稱霸臺灣陸上交通達 70 年，同時期世界各地皆有鐵道修築與列車行駛，盱衡同時期的各個地區，卻鮮少有如臺灣，能夠有如此優質多量的傳統漢詩作品產出。這些作品融鑄科技與情感，兼具理性與感性，開拓臺灣傳統漢詩的創作題材，更是臺灣「鐵道文學」中質精量純，歷久彌新的寶貴文化資產。

### 參考書目

- 李欽賢、洪致文，《臺灣古老火車站》(臺北：玉山社出版事業公司，1996 年 11 月，初版)。
- 莊永明，《台北老街》(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6 年 11 月 25 日，二版)。
- 洪致文，《珍藏世紀台灣鐵道—幹線鐵路篇》(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2000 年 12 月 31 日，初版)。
- 賴德湘，《筆路開基—基隆鐵道之創建與發展》(基隆：基隆市立文化中心，2001 年 12 月，一版)。
- 吳淑華，《戀戀煙塵：台灣鐵道之旅特展專刊》(高雄：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2002 年 12 月，初版)。
- 羅吉甫，《日本帝國在臺灣》(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04 年 10 月 16 日，二版)。
- 戴寶村、蔡承豪，《縱貫環島臺灣鐵道》(臺北：臺灣博物館，2009 年 11 月，初版)。
- 莊永明，《臺灣歌謠：我聽我唱我寫》(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2011 年 12 月，初版)。
- 徐逸鴻，《圖說日治台北城》(臺北：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公司城邦分公司，2013 年 10 月，初版)。
- 司馬嘯青，《台灣日本總督》(臺北：玉山社出版事業公司，2014 年 2 月，初版)。

- 林衡道，《戀戀臺灣風情——走過日治時典的這些人那些事》（臺北：紅螞蟻圖書公司，2014 年 7 月 1 日，二版）。
- 莊永明，《城內舊事：臺北建城 130 年》（臺北市文獻委員會，2014 年 8 月，初版）。
- 蘇昭旭，《台灣鐵道經典之旅——環島鐵路篇》（新北：人人出版公司，2014 年 9 月，一版）。
- 陸傳傑，《被誤解的台灣老地名》（新北：遠足文化事業公司，2015 年 1 月，二版）。
- 黃沼元，《台灣老街歷史漫步》（新北：遠足文化事業公司，2015 年 3 月，一版）。
- 富田昭次著、廖怡靜譯，《觀光時代：近代日本的旅行生活》（臺北：蔚藍文化出版公司，2015 年 9 月，初版）。
- 旅行人誌編輯室，《臺灣鐵道祕境慢旅》（臺北：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公司城邦分公司，2016 年 3 月，初版）。
- 林美容，《白話圖說臺風雜記》（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17 年 9 月，二版）。
- 歐文·魯特，《1921 穿越福爾摩沙：一位英國作家的臺灣旅行》（臺北：遠足文化事業公司，2017 年 11 月，初版）。
- 蘇昭旭，《台灣蒸汽十火車百科》（新北：人人出版公司，2018 年 2 月，一版）。
- 陸傳傑，《太陽帝國的最後一塊拼圖》（新北：遠足文化事業公司，2018 年 5 月，二版）。
- 戴震宇，《台灣鐵道完全揭祕》（新北：遠足文化事業公司，2010 年 7 月，一版）。
- 鄧志忠，《行進！鐵支路：日治臺灣鐵道寫真》（臺北：蒼璧出版有限公司，2018 年 11 月，初版）。

## 《詩經》諷諭精神之傳承—

## 朝鮮詩人丁若鏞「三吏」對杜甫「三吏」的接受與轉化

蔡慧崑\*

## 摘要

朝鮮實學派詩人丁若鏞嫻習《詩經》，酷愛杜詩，尊崇杜甫，曾寫下許多仿杜或次韻杜詩的作品。丁若鏞的「三吏」(〈龍山吏〉、〈波池吏〉、〈海南吏〉)，便是仿效杜甫的「三吏」(〈石壕吏〉、〈新安吏〉、〈潼關吏〉)而作，可謂《詩經》諷諭精神之傳承。

從詩作的體制與主題思想，可以看出丁若鏞「三吏」對杜甫「三吏」的接受：體制方面，丁若鏞「三吏」和杜甫「三吏」都是以敘事為主體的五言古詩，而且〈龍山吏〉對應〈石壕吏〉、〈波池吏〉對應〈新安吏〉、〈海南吏〉對應〈潼關吏〉，丁詩近乎全面地次韻杜詩、借用杜詩的韻腳，語詞也不乏化用杜詩之處。主題思想方面，丁若鏞「三吏」寫照李朝大荒之年，杜甫「三吏」記敘唐代安史之亂，兩者寫作的年代、背景固然不同，卻都深刻地描寫社會現實，反映民生疾苦，實踐《詩經》傷時憤俗、美刺勸懲、以風刺上的諷諭精神，試圖匡正君心，流露憂國憂民、悲天憫人的情感基調。

不同於杜甫「三吏」多採用第一人稱視角、詩人自己介入敘事之中抒發所見所聞的主觀感受和見解；丁若鏞「三吏」多採用第三人稱視角，以旁觀者的立場理性、客觀地敘事、寫人或議論，可以視為對杜甫「三吏」的轉化。

**關鍵詞：**丁若鏞、杜甫、三吏、詩經、接受

**An Exchange of the Ironic Spirit of "The Book of Songs" :**

**Korean Poet Ding Ruoyong's "Sanli" on the Recep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Du Fu's "Sanli"**

**Abstract**

Ding Ruoyong, a Korean poet of practical learning, studied "The Book of Songs", loved Du Fu's poems and treated Du Fu with respect. He had written many poems by imitations of Du Fu's poems. Ding Ruoyong's "Sanli" just

---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imitated Du Fu's "Sanli". It was an exchange of the ironic spirit of "*The Book of Songs*"

From the system and theme of poetry, we can see that Ding Ruoyong's "Sanli" on the reception of Du Fu's "Sanli": In terms of system, Ding Ruoyong's "Sanli" and Du Fu's "Sanli" are all five-words ancient poetry of narrative. Moreover, "Longshan Official" corresponded to "Shihao Official", "Bochi Official" corresponded to "Xin'an Official", "Hainan Official" corresponded to "Tongguan Official", Ding Ruoyong's poems had learned Du Fu's poems comprehensively, included rhymes and words. In terms of the theme, Ding Ruoyong's "Sanli" portrayed a great famine during the Li Dynasty, and Du Fu's "Sanli" were described the Anshi Rebellion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The two groups of poetic times and backgrounds were different, but they all described the social reality profoundly, reflected the suffering of the people's livelihood, practiced the ironic spirit of "*The Book of Songs*", rectified a king, and displayed the emotional tone of worrying about the country and the people.

In addition, unlike Du Fu's "Sanli" used the first-person perspective and expressed the poet's own revealed insights in the narrative, Ding Ruoyong's "Sanli" used the third-person perspective, gave objective descriptions or insights by a standpoint of the observer. These distinctions can be regarded as the transformation of Du Fu's "Sanli".

**Keywords:** Ding Ruoyong, Du Fu, Sanli, The Book of Songs, Reception.

## 一、前言

丁若鏞（1762-1836），字美庸、頌甫，號俟庵、茶山、洌水、與猶堂，是李氏朝鮮時期著名的詩人、經學家、實學思想之集大成者，治學強調經世致用、實事求是。他出身兩班貴族家庭，二十二歲中進士，二十八歲文科及第，歷任司憲府持平、司諫院正言、弘文館修撰、京畿暗行御史、奎瀛府校書、谷山府使、刑曹參議等職，為官剛正不阿、清廉自持，深得朝鮮正祖李祘的賞識與重用。正祖在位之二十四年（1800），突然駕崩，年幼的純祖李玘繼位。純祖元年（1801），在大王大妃金氏垂簾聽政

下，朝廷展開鎮壓天主教的行動，史稱「辛酉教獄」，丁若鏞因受牽連而被流配康津，開始長達十八年的流放生活，也使他得以貼近平民百姓，更能體察民生疾苦。純祖十八年（1818），丁若鏞遇赦回歸故里，不復為官，潛心治學、著述和遊歷。

丁若鏞爛習《詩經》，著有《詩經講義》、《詩經講義補遺》，認為《詩經》的特質乃「溫柔激切者」。<sup>1</sup>他敬慕唐代詩人杜甫（712-770），喜讀杜詩，十三歲時，「手抄杜詩，倣而步韻，深得杜意，凡數百首」<sup>2</sup>，其〈寄淵兒〉一文云：「杜詩用事無跡，看來如自作，細察皆有本，所以為聖。」<sup>3</sup>即讚美詩聖杜甫運用典故之渾然天成。文中亦指出：「後世詩律，當以杜工部為孔子。蓋其詩所以冠冕百家者，以得三百篇遺意也。三百篇者，皆忠臣孝子烈婦良友惻怛忠厚之發，不愛君憂國非詩也，不傷時憤俗非詩也，非有美刺勸懲之義非詩也。故志不立，學不醇，不聞大道，不能有致君澤民之心者，不能作詩。」<sup>4</sup>更推崇杜甫為詩中孔子，標榜繼承《詩經》諷諭傳統的杜詩精神：愛君憂國，傷時憤俗，美刺勸懲，致君澤民。

作為杜詩的忠實讀者，丁若鏞曾寫下許多仿杜或次韻杜詩的詩作，丁若鏞「三吏」（〈龍山吏〉、〈波池吏〉、〈海南吏〉）即仿效杜甫「三吏」（〈石壕吏〉、〈新安吏〉、〈潼關吏〉）而作。職是之故，本論文分別析論：杜甫「三吏」與丁若鏞「三吏」的寫作背景及內容大要、丁若鏞「三吏」對杜甫「三吏」的接受、丁若鏞「三吏」對杜甫「三吏」的轉化，俾能瞭解杜甫「三吏」對丁若鏞「三吏」的啟發和影響，意欲以「三吏」為詮釋主軸來釐清杜甫（杜詩作者）與丁若鏞（杜詩讀者）之間的交流情況，<sup>5</sup>從而印證杜甫「三吏」的美學內涵與價值，亦為體現杜詩文學史意

<sup>1</sup> 參見朝鮮·丁若鏞，《與猶堂全書》（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2002年），第1集，卷11，頁242。參見金興圭，《朝鮮後期詩經論與詩意識》（首爾：高麗大學校民族文化研究所，1995年），頁213。

<sup>2</sup> 見丁奎英，《俟菴先生年譜》（首爾：文獻編纂委員會，1961年），頁4。

<sup>3</sup> 見丁若鏞，《與猶堂全書》，第1集，卷21，頁453。

<sup>4</sup> 見丁若鏞，《與猶堂全書》，第1集，卷21，頁453。

<sup>5</sup> 文藝理論家阿布拉姆斯（M. H. Abrams）即認為：「文學是人性的作者與人性的讀者之間進行的一種交往。作家憑藉其語言能力與文學天才，把他對於人類以及人類活動的關懷加以現實化，並且用語言文字把它記錄下來。他以這種方式向讀者敞開他自己，而讀者也具有理解他的作品的相應能力。」見伊麗莎白·弗洛恩德（Elizabeth Freund）著，陳燕谷譯，《讀者反應理論批評》（臺北：駱駝出版社，1994年），頁13。

義的一種途徑。<sup>6</sup>

## 二、杜甫「三吏」與丁若鏞「三吏」的寫作背景及內容大要

唐肅宗乾元元年（758）冬，郭子儀收復長安、洛陽二都不久，與李光弼、王思禮等九節度使乘勝進擊，率數十萬兵力包圍安慶緒的軍隊於相州（即鄴城），情勢大好。不過，唐肅宗對郭子儀、李光弼等將領並不信任，因此指派宦官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監軍，諸軍不設統帥，事權不一，加上糧食不足，士氣低落。乾元元年（759）春，史思明援軍至，情勢為之逆轉，唐軍遂遭相州大敗，安史叛軍進逼，郭子儀只得退保洛陽，其餘各節度使亦逃歸本鎮駐守。如若東都洛陽再次陷落，安史叛軍勢必進攻西都長安，作為關中屏障的潼關終將面臨一場惡戰。相州大敗後，唐朝官軍傷亡離散，兵員不足，朝廷急令徵兵，甚且肆意抽丁抓人來補充兵力。時任華州司功參軍的杜甫正由洛陽省親返回華州，路經新安、石壕、潼關等地，耳聞目睹男女老少被官吏捕捉充當兵士、役夫的情景，感受將士辛苦緊迫的備戰氛圍，悲憫百姓遭逢戰亂、不得不為國效力的困境，於是寫下了「三吏」，即〈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這一組詩。

〈新安吏〉描寫杜甫路過新安，耳聞目睹官吏按戶籍名冊徵兵之事：

客行新安道，喧呼聞點兵。借問新安吏，縣小更無丁？  
府帖昨夜下，次選中男行。中男絕短小，何以守王城。  
肥男有母送，瘦男獨伶俜。白水暮東流，青山猶哭聲。  
莫自使眼枯，收汝淚縱橫。眼枯即見骨，天地終無情。  
我軍取相州，日夕望其平。豈意賊難料，歸軍星散營。  
就糧近故壘，練卒依舊京。掘壕不到水，牧馬役亦輕。  
況乃王師順，撫養甚分明。送行勿泣血，僕射如父兄。<sup>7</sup>

唐軍新敗，從杜甫與新安吏的問答中，可知在兵員不足的情形下官府強

<sup>6</sup> 美學家姚斯（Hans Robert Jauss）指出：「美學的內涵就在於讀者對一部作品的第一次接受，包括由此比較閱讀過的作品，對其美學價值的檢驗。它的明顯歷史內涵是受來自一代又一代人的接受鏈條的限制或擴充的理解；這樣，一部作品的歷史意義得到確定，它的美學價值得到證實。」見羅勃 C·赫魯伯（Robert C. Holub）著，董之林譯，《接受美學理論》（臺北：駱駝出版社，1994 年），頁 62。

<sup>7</sup> 見清·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96 年），卷 217，頁 2283。

徵中男（指未達服役年齡的青少年）入伍以補充兵力。昨夜徵兵，今日啓程，顯見東都洛陽的情勢危急，大戰一觸即發。詩人寬慰從軍的中男及其家人的同時，實亦表露寄望官軍將帥體恤士卒、早日平息叛亂之意。

〈石壕吏〉是杜甫途經石壕村時所作，敘述官吏深夜抓人、老翁越牆逃走、老婦被迫應役等所見所聞：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牆走，老婦出門看。  
 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聽婦前致詞，三男鄴城戍。  
 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  
 室中更無人，惟有乳下孫。有孫母未去，出入無完裙。  
 老嫗力雖衰，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  
 夜久語聲絕，如聞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sup>8</sup>

杜甫清楚記下老婦對官吏說的話，呈現亂世之中家門不幸的控訴：老婦的三個兒子被徵召從軍，其中兩個戰死在相州，活著的一個兒子仍在軍中而前途未卜，家中只剩老弱婦孺，生活貧困。即使如此，官吏仍要抓人充役，老婦只好勉為其難而挺身應役。

〈潼關吏〉乃杜甫經過潼關時看見士兵辛苦修築防禦工事而作：

士卒何草草，築城潼關道。大城鐵不如，小城萬丈餘。  
 借問潼關吏，修關還備胡？要我下馬行，爲我指山隅。  
 連雲列戰格，飛鳥不能踰。胡來但自守，豈復憂西都。  
 丈人視要處，窄狹容單車。艱難奮長戟，萬古用一夫。  
 哀哉桃林戰，百萬化爲魚。請囑防關將，慎勿學哥舒。<sup>9</sup>

杜甫根據自己看見的情景及其與潼關吏的問答，揭示：潼關地勢險要，士卒辛苦依山修築的城關既堅固又高峻、作戰部署亦甚為嚴密，而且士氣高昂，應可有效抵禦安史叛軍西進。不過，個性審慎的詩人還是警惕將士們須堅守城關，記取歷史教訓，不要重蹈當年哥舒翰輕率出關應戰而慘敗的覆轍。

比杜甫的「三吏」晚一千餘年，丁若鏞的「三吏」作於李朝純祖十年（1810），當時朝鮮大旱，丁若鏞在流配地康津親眼目睹百姓饑饉的慘

<sup>8</sup> 見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卷 217，頁 2283。

<sup>9</sup> 見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卷 217，頁 2283。

狀，他在四言詩〈采蒿〉注云：「己巳歲，余在茶山草菴。是歲大旱，爰自冬春，至于立秋，赤地千里，野無青草。六月之初，流民塞路，傷心慘目，如不欲生。」<sup>10</sup>康津一帶的百姓原本在名目繁多的賦稅壓迫下已經苦不堪言，又遭遇大荒之年，生計更加艱難，即便如此，官吏卻不體恤百姓窮困的處境，嚴厲執行國家苛刻的賦稅政策，橫徵暴斂如故，有鑑於此，丁若鏞乃仿效杜甫作「三吏」而作的〈龍山吏〉、〈波池吏〉、〈海南吏〉，揭露苛酷的官吏催繳租稅、掠奪財物的行徑，反映民不聊生的苦痛。

〈龍山吏〉描繪出催稅官吏不顧百姓死活、只圖奉承上意的惡行：

吏打龍山村，搜牛付官人。驅牛遠遠去，家家倚門看。  
勉塞官長怒，誰知細民苦。六月索稻米，毒痛甚征戍。  
德音竟不至，萬命相枕死。窮生儘可哀，死者寧嗇矣。  
婦寡無良人，翁老無兒孫。泫然望牛泣，淚落沾衣裙。  
村色劇疲衰，吏坐胡不歸？瓶甕久已罄，何能有夕炊。  
坐令生理絕，四隣同嗚咽。脯牛歸朱門，才譖以甄別。<sup>11</sup>

到龍山村催稅的官吏怕長官生氣、爲了討好上司而強搶耕牛，被搶走耕牛的，有的是寡婦，有的是孤苦的老翁，面對官吏殘酷的剝削、掠奪，他們毫無反抗之力，只能絕望流淚，眼睜睜地看著耕牛被搶走。百姓家中早已缺糧，又失去作爲謀生依據的耕牛，最後恐怕只能餓死。惡吏不擇手段地搶走耕牛，留下可憐的農民和凋蔽的村家，只爲向長官獻媚、使自己升官，草菅人命亦在所不惜。

〈波池吏〉敘述官吏到村中催繳租稅，非但不體恤災荒之下百姓生計艱難，還理直氣壯地捉捕孤寡、欺凌貧士，恣意妄爲：

吏打波池坊，喧呼如點兵。疫鬼雜餓莩，村墅無農丁。  
催聲縛孤寡，鞭背使前行。驅叱如犬雞，彌亘薄縣城。  
中有一貧士，瘠弱最伶俜。號天訴無辜，哀怨有餘聲。  
未敢叙衷臆，但見涕縱橫。吏怒謂其頑，僂辱怵衆情。  
倒懸高樹枝，髮與樹根平。鯁生豈不畏，敢爾逆上營。  
讀書會知義，王稅輸王京。饒爾到季夏，念爾恩非輕。

<sup>10</sup> 見丁若鏞，《與猶堂全書》，第1集，卷5，頁104。

<sup>11</sup> 見丁若鏞，《與猶堂全書》，第1集，卷5，頁105-106。

我舸滯浦口，爾眼胡不明？立威更何時，指揮有公兄。<sup>12</sup>

官吏來到飽受瘟疫與饑荒摧殘的村莊，喧嚷著要僅存的孤寡人家繳納王稅，百姓卻無力繳稅，官吏大怒，捆綁、鞭打孤寡之人，以抗稅的名義要將他們抓到縣城。有一位貧困的士人大聲控訴、抗議官吏的暴虐，官吏竟將他倒掛在樹上、大加責罵，直言：「朝廷已寬限至季夏，如今運送稅糧的船已等在浦口，讀書人豈能不明白繳納王稅的道理？」意圖懲一儆百，藉以向村民施壓、逼稅。

〈海南吏〉由一位逃避海南官吏催租而遠走他鄉的平民獨白，道出可怕的經歷：

客從海南來，為言避畏途。坐久喘未定，怖怯猶有餘。  
若非值豺狼，定是遭羌胡。催租吏出村，亂打東南隅。  
新官令益嚴，程限不得踰。橋司萬斛船，正月離王都。  
滯船必黜官，鑑戒在前車。嗷嗷百家哭，可以媚權夫。  
吾今避猛虎，誰復恤枯魚。泫然雙淚垂，條然一嘯舒。<sup>13</sup>

客子倉皇避稅離鄉、驚慌未定；催租官吏則催逼孔急，手段好像「豺狼」、「羌胡」一般橫暴，他們為了不讓自己的宦途受影響，嚴厲逼迫百姓在規定的期限內上繳租稅，導致村中呈現「嗷嗷百家哭」的淒慘景象。

### 三、丁若鏞「三吏」對杜甫「三吏」的接受

誠如文學批評家伊麗莎白·弗洛恩德(Elizabeth Freund)所指出：「文學文本是一個獨特的、完整的和自足的語言實體，它那公認的渾然一體的存在就是批評詮釋的對象：一種溝通作者與讀者這兩極的交流方式，作者與讀者分享著同一套語言和文學代碼(code)，因而可以傳送並接受確定的意義。」<sup>14</sup>此說實可以佐證本論文對杜甫(杜詩作者)「三吏」與丁若鏞(杜詩讀者)「三吏」之間交流情況的分析。

丁若鏞「三吏」和杜甫「三吏」在形式上都屬五言古詩。五言古詩不限句數，不講究平仄和對仗，可以換韻，且鄰韻可以通押，亦即表達

<sup>12</sup> 見丁若鏞，《與猶堂全書》，第1集，卷5，頁106。

<sup>13</sup> 見丁若鏞，《與猶堂全書》，第1集，卷5，頁106。

<sup>14</sup> 見伊麗莎白·弗洛恩德(Elizabeth Freund)著，陳燕谷譯，《讀者反應理論批評》，頁13。

上不受格律束縛，可以容納更多語句詞彙，形式靈活，更有利於敘事、抒情或議論，敘寫社會現實，反映民生疾苦，呈顯作者襟懷。

押韻方面，可以明顯看出丁若鏞「三吏」對杜甫「三吏」的接受。丁、杜兩組詩，兩相對應：〈龍山吏〉對應〈石壕吏〉、〈波池吏〉對應〈新安吏〉、〈海南吏〉對應〈潼關吏〉。〈龍山吏〉借用〈石壕吏〉的十八個韻腳：村、人、看、怒、苦、戍、至、死、矣、人、孫、裙、衰、歸、炊、絕、咽、別。〈波池吏〉借用〈新安吏〉的十四個韻腳：兵、丁、行、城、傳、聲、橫、情、平、營、京、輕、明、兄。〈海南吏〉則借用〈潼關吏〉十韻中的八個韻腳：餘、胡、隅、都、車、夫、魚、舒。〈海南吏〉首聯的韻腳為「途」，而〈潼關吏〉首聯的韻腳為「草」、「道」，是乃兩詩用韻不同處。顯而易見，除〈海南吏〉稍微例外，丁若鏞「三吏」幾乎兩相對應地次韻杜甫「三吏」。

丁若鏞「三吏」對杜甫「三吏」的語句詞彙亦不乏化用之處，例如：〈龍山吏〉中「窮生儘可哀，死者寧嗇矣」是對〈石壕吏〉中「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的化用；〈波池吏〉中的「喧呼如點兵」、「村墅無農丁」、「但見涕縱橫」分別化用自〈新安吏〉中的「喧呼聞點兵」、「縣小更無丁」、「收汝淚縱橫」；〈海南吏〉第五聯「不得踰」則是對〈潼關吏〉第五聯「不能踰」的化用。

寫作題材方面，丁若鏞「三吏」對杜甫「三吏」亦有所接受。杜甫〈新安吏〉寫官吏徵中男入伍、〈石壕吏〉寫官吏抓老婦應河陽役、〈潼關吏〉寫將士辛苦築城守潼關，丁若鏞〈龍山吏〉寫官吏搶奪耕牛、〈波池吏〉寫官吏逼稅、〈海南吏〉寫官吏催租，都是透過一個主要事件、情景來呈顯戰亂、荒旱、兵役、勞役、租稅等社會現實及其衍生的民生疾苦。杜甫〈新安吏〉中被迫從軍的中男、〈石壕吏〉中的被抓應役的老婦、〈潼關吏〉中築城守關的士卒，丁若鏞〈龍山吏〉中遭搶奪耕牛的寡婦和老翁、〈波池吏〉中被惡吏催租欺凌的孤寡和貧士、〈海南吏〉中避稅他鄉的客子，都是承受悲苦際遇的弱勢人物。

杜甫「三吏」作於安史之亂、唐軍相州敗戰之際，揭示朝廷亟需徵兵、戍役的社會現實，反映平凡百姓家庭破碎、生離死別的苦痛，記載唐代由盛轉衰的「詩史」。〈新安吏〉中詩人勸慰中男時說：「我軍取相州，日夕望其平。豈意賊難料，歸軍星散營。」即言及唐軍相州敗戰之事。

杜甫與新安吏的問答，更道出相州敗後朝廷徵兵迫切、無丁可徵而不惜波及幼小的窘況。〈潼關吏〉由詩人之眼呈現：「士卒何草草，築城潼關道。大城鐵不如，小城萬丈餘。」凸顯相州敗後士兵強化潼關防禦的辛勞。〈石壕吏〉中老婦對官吏陳辭：「三男鄴城戍。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室中更無人，惟有乳下孫。有孫母未去，出入無完裙。老嫗力雖衰，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亦是相州敗後徵兵孔急、驅盡壯丁甚且連累老婦的社會困境寫真。

丁若鏞「三吏」作於李氏朝鮮大荒之年，以詩歌批判朝廷惡政，客觀寫實地記錄小人物的遭遇，揭示「三政」制度積弊的同時，<sup>15</sup>詩人對李朝後期吏治敗壞、民生凋敝的憂慮，對百姓遭受官吏欺壓、剝削的悲憫，亦躍然紙上，亦不失為李氏朝鮮的歷史實錄。<sup>16</sup>所謂「三政」，乃「田政」、「軍政」和「還政」。「田政」是指官府按土地面積向下層人民徵稅；「軍政」是一種徵收軍布的服兵役形式，逐漸演變成一種附加稅；「還政」是指還穀，原本為具有賑恤性質的借貸，由政府貸給人民糧食或種子，春借秋還，但連本帶利後卻成了高利貸的剝削。換言之，「三政」制度以各種形式向人民攤派賦稅和勞役，變成各級官吏巧立名目、假公濟私、掠奪百姓生計的手段。而且收上來的租稅大多流入權門貴戚和地方胥吏、豪強手中，國庫日益空虛，百姓生活更加困頓。丁若鏞〈龍山吏〉寫道：「瓶甕久已罄，何能有夕炊。」〈波池吏〉寫道：「疫鬼雜餓莩，村墅無農丁。」即是憐憫遭逢饑荒之百姓生活艱難的觀照和表述。〈龍山吏〉指出：「六月索稻米，毒痛甚征戍。」〈波池吏〉藉官吏之口宣告：「讀書會知義，王稅輸王京。饒爾到季夏，念爾恩非輕。峩舸滯浦口，爾眼胡不明？立威更何時，指揮有公兄。」〈海南吏〉藉海南客獨白說：「新官令益嚴，程限不得踰。橋司萬斛船，正月離王都。滯船必黜官，鑑戒在前車。」要皆指陳賦稅制度的嚴苛無情，官吏為自身權位設想，厲行催繳和掠奪，毫不體恤民情。平凡百姓遭遇催租逼稅，卻無力反抗，人禍之患顯然更甚災荒，終究造成〈龍山吏〉中「德音竟不至，萬命相枕死」、

<sup>15</sup> 李曉萍指出：「丁詩中的『三吏』是詩人在李朝統治末期的大背景下對『三政』毒害百姓的事實的記錄和控訴。」見李曉萍，〈朝鮮詩人丁若鏞“三吏”與杜甫“三吏”之比較研究〉，《安康學院學報》第23卷第5期（2011年10月），頁78。

<sup>16</sup> 參見王雪、楊新民、邵希芸，〈杜甫對朝鮮詩人丁若鏞詩歌創作的影響〉，《延邊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5年第3期，頁71。

〈海南吏〉中「嗷嗷百家哭，可以媚權夫」的慘況。

詩歌的體制與主題之外，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杜甫「三吏」和丁若鏞「三吏」對《詩經》諷諭精神的傳承。

《毛詩正義·大序》明言：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sup>17</sup>

詩歌乃詩人情志之抒發，而「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的亂世刑政苛虐、風俗澆薄，致使詩人抒情發憤，以風刺上、主文譎諫，企盼藉由諷諭之詩達到移風易俗、恢復禮義的積極目的。誠然，《詩經》不僅是抒情文學的重要著作，〈國風〉尤其表達了詩人對社會現實的批判與對居上位者的諷諫，反映了當時的國政良窳與民生疾苦，例如〈國風·魏風·碩鼠〉<sup>18</sup>刺重斂、〈國風·唐風·鴛羽〉<sup>19</sup>刺時、〈國風·衛風·氓〉<sup>20</sup>刺時等。

<sup>17</sup> 見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清·阮元校勘，《毛詩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年），卷1，頁12-17。

<sup>18</sup> 參見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清·阮元校勘，《毛詩正義》，卷5，頁211。

<sup>19</sup> 參見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清·阮元校勘，《毛詩正義》，卷6，頁224。

<sup>20</sup> 參見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清·阮元校勘，《毛詩正義》，卷3，頁134。

前引丁若鏞〈寄淵兒〉一文，謂杜詩得三百篇遺意，這是丁若鏞敬慕杜甫的重要原因。觀杜甫〈戲爲六絕句〉其三說：「縱使盧王操翰墨，劣于漢魏近風騷。」<sup>21</sup>其六云：「別裁偽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sup>22</sup>可見他對《詩經》甚爲重視。杜甫〈敬贈鄭諫議十韻〉曰：「諫官非不達，詩義早知名。」<sup>23</sup>〈毒熱寄簡崔評事十六弟〉云：「載聞大易義，諷興詩家流。」<sup>24</sup>已然肯認《詩經》的諷諫之意；又觀陸游〈宋都曹屢寄詩且督和答作此示之〉指出：「古詩三千篇，刪取財十一。……天未喪斯文，杜老乃獨出。」<sup>25</sup>宋濂《杜詩學隅序》曰：「杜子美詩實取法三百篇，有類〈國風〉者，有類〈雅〉、〈頌〉者。」<sup>26</sup>又乾隆皇帝〈杜子美詩序〉云：「子美之詩，所謂道性情而有勸懲之實者也。」<sup>27</sup>則學者關於杜詩繼承《詩經》諷諭精神的認知亦可見一斑。且杜甫〈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寫道：「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sup>28</sup>他繼承《詩經》諷諭精神來寫作詩歌之積極目的，即在於匡正君主、移風易俗，欲使君主成爲堯、舜一般的明君，讓風俗再現淳樸。

與杜甫一樣，丁若鏞對《詩經》極爲重視與熟稔，如其《詩經講義補遺》云：

風有二義，亦有二音，指趣迥別，不能相通。上以風化下者，風教也，風化也，風俗也，其音爲平聲。下以風刺上者，風諫也，風刺也，諷喻也，其音爲去聲。安得以一風字，雙含二義，跨據二音乎？……風也者，諷也。託意微言，陳善閉邪，風之妙也。假如佩玉晏鳴，陳〈關雎〉以風之。征役煩勞，歌〈殷雷〉以風之。帷薄不修，賦〈牆茨〉以風之。琴瑟不諧，誦〈綠衣〉以風之。不舉時政，唯陳古道；不舉時疵，唯述前鑒。此所以感發人之善心，懲創人之逸志

<sup>21</sup> 見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卷 227，頁 2453。

<sup>22</sup> 見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卷 227，頁 2453。

<sup>23</sup> 見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卷 224，頁 2389。

<sup>24</sup> 見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卷 221，頁 2339。

<sup>25</sup> 見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卷 79，頁 4276。

<sup>26</sup> 見明·宋濂：《宋學士文集》（臺北：商務印書館，1967 年），卷 37，頁 9 下。

<sup>27</sup> 見清·愛新覺羅·弘曆，《樂善堂全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冊 331，卷 7，頁 5b- 6b。

<sup>28</sup> 見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卷 216，頁 2252。

也，此國風之所以為風，豈僅為民俗歌謠之之作而已哉？<sup>29</sup>

丁若鏞認為《毛詩正義·大序》將「風」理解為具有「風化」和「風刺」二種涵義的並不正確，他指出「風」是「諷」之義，應讀作去聲，而將「風」詮釋為「諷刺」、「諷諫」和「諷諭」，<sup>30</sup>沈慶昊亦指出：「《毛詩正義》認為『作詩』是對臣下的諷刺，『用詩』是對君主的風化。……但是丁若鏞從『作詩』與『用詩』兩個角度，都將『風』理解為『諷刺』。他認為國風中所有的詩都是以諷刺君主為前提的。既然詩歌的用處在此，那麼創作詩歌的目的也只能理解為是對君主進行諷諫。」<sup>31</sup>《詩經講義補遺》又云：「風、雅二者，體裁雖別，其歸則感發人之善心，懲創人之逸志也。正言曰雅，微喻曰風。」<sup>32</sup>除了〈國風〉之外，丁若鏞認為〈雅〉也是諷諫人主之詩。他的〈自撰墓誌銘〉曾言：「《詩》者，諫林也。……使王者聞其善而感發，聞其惡而懲創。故《詩》之褒貶，嚴於《春秋》，人主畏之。」<sup>33</sup>已然進一步賦予《詩經》諫書的功能。<sup>34</sup>《詩經講義補遺·小序》云：

凡〈國風〉之所美刺，皆是公家之善惡。或居室大族，行有淑慝，係國家之存亡，關世道之汙隆，方有美刺之詞。朱子一歸之於下俚閭巷之音，此恐未允。……故〈國風〉諸詩，亦唯以「一正君」為務。或美之贊之，以感其善心；或刺之箴之，以懲其逸志。君心既正，百官自正；百官既正，天下歸仁。<sup>35</sup>

丁若鏞對朱熹《詩集傳》將〈國風〉界定為民間歌謠的見解提出批判，丁若鏞認為〈國風〉中的詩都是為匡正君心而創作和使用的，金秀炅指

<sup>29</sup> 見丁若鏞，《與猶堂全書》，第 2 集，卷 20，頁 463。

<sup>30</sup> 參見李俸珪，〈韓國學界關於茶山學研究的焦點〉，收入黃俊傑編：《東亞儒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 年），頁 192。

<sup>31</sup> 見沈慶昊著、金梅鷹譯，〈丁若鏞的《詩經》論與清朝學術的關係：以繼承、批判毛奇齡學說為例〉，收入黃俊傑編，《東亞視野中的茶山學與朝鮮儒學》（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6 年），頁 141-142。

<sup>32</sup> 見丁若鏞，《與猶堂全書》，第 2 集，卷 20，頁 463。

<sup>33</sup> 見丁若鏞，《與猶堂全書》，第 1 集，卷 16，頁 345。

<sup>34</sup> 參見沈慶昊著、金梅鷹譯，〈丁若鏞的《詩經》論與清朝學術的關係：以繼承、批判毛奇齡學說為例〉，收入黃俊傑編：《東亞視野中的茶山學與朝鮮儒學》，頁 143。付星星，〈朝鮮時代儒者丁若鏞《詩經講義》譎論〉，《古典文獻研究》2015 年第 2 期（2015 年 6 月），頁 174。

<sup>35</sup> 見丁若鏞，《與猶堂全書》，第 2 集，卷 20，頁 465。

出：「丁若鏞之所以刻意區分教化與風刺之義，就是為了突出《詩》的社會批判功能。」<sup>36</sup>劉麗亦提及：「《詩經》風雅精神的另一層面是『政治道德意識強烈』，丁若鏞作為一名憂國恤民的詩人對詩歌針砭時政的功能十分看重，他在自己的《詩經》觀中也一再強調詩歌要做到『美刺勸懲』，因此，也創作了一批諷刺惡吏貪官、批判不合理政治制度的詩歌，這些批判諷刺弊政的詩歌是其政治道德意識強烈的重要表現。」<sup>37</sup>質言之，丁若鏞不僅與杜甫一樣肯認《詩經》的諷諫之意，在詩歌創作上繼承了《詩經》的諷諭精神，更進一步要經世致用、致君澤民，亦即與杜甫「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憧憬若合符節，希望能夠實踐匡正君心、革除時弊的政治理想。

杜甫在安史之亂前作〈兵車行〉已指陳：「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西。況復秦兵耐苦戰，被驅不異犬與雞。長者雖有問，役夫敢申恨？且如今年冬，未休關西卒。縣官急索租，租稅從何出？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生女猶是嫁比鄰，生男埋沒隨百草。」<sup>38</sup>安史之亂爆發以後作〈悲陳陶〉更描述：「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陳陶澤中水。野曠天清無戰聲，四萬義軍同日死。」<sup>39</sup>戰爭慘烈無情、地方官吏橫徵暴斂所造成的民生疾苦昭然若揭，字裡行間亦流露出詩人對戰禍與人禍的批判，已然繼承了《詩經》的諷諭精神。

丁若鏞〈飢民詩〉：「林林生蒸民，憔悴含瘡痍。槁莖弱不振，道塗逢流離。負戴靡所聘，不知竟何之。骨肉且莫保，迫厄傷天彝。上農為丐子，扣門拙言辭。」<sup>40</sup>〈山翁〉：「大兒槃散手一瓢，小兒薦黃顏色焦。井上一兒特枯瘦，腹如怒蟾臀皮皺。」<sup>41</sup>描寫荒年百姓生活的饑貧困頓，〈耽津村謠二十首·其三〉：「園丁日日培新笋，留作朱門竹瀝膏。」<sup>42</sup>〈長

<sup>36</sup> 見金秀炅，《韓國朝鮮時期詩經學研究》（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頁214。

<sup>37</sup> 見劉麗，《丁若鏞《詩經》接受研究—以詩經觀和漢詩創作為中心》（威海：山東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年），頁38。

<sup>38</sup> 見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卷216，頁2255。

<sup>39</sup> 見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卷216，頁2268。

<sup>40</sup> 見丁若鏞，《與猶堂全書》，第1集，卷2，頁32。

<sup>41</sup> 見丁若鏞，《與猶堂全書》，第1集，卷5，頁103。

<sup>42</sup> 見丁若鏞，《與猶堂全書》，第1集，卷4，頁81。

髻農歌十章·其四):「平生不種西瓜子, 剛怕官奴惹是非。」<sup>43</sup>〈耽津農歌〉:「豈惟蓮子輸官裡, 兼怕官人暇日漁。」<sup>44</sup>批判貪官酷吏的剝削掠奪, 在在都是繼承《詩經》諷諭精神之例證, 亦可以視為丁若鏞學習、效法杜詩的具體表現之一。

杜甫「三吏」(〈石壕吏〉、〈新安吏〉、〈潼關吏〉)凸顯安史之亂下不合理的兵役制度, 丁若鏞「三吏」(〈龍山吏〉、〈波池吏〉、〈海南吏〉)凸顯李朝末年不公義的賦稅制度, 兩組詩皆流露憂國憂民、悲天憫人的情感基調, 而批判「苛政猛於虎」可說是兩組詩一脈相承的主題思想。<sup>45</sup>換言之, 丁若鏞「三吏」寫照李氏朝鮮饑荒之年, 杜甫「三吏」記敘中國唐代安史之亂, 年代、背景固然不同, 卻都繼承與實踐了《詩經》傷時憤俗、美刺勸懲、以風刺上的諷諭精神, 流露憂國憂民、悲天憫人的情懷。<sup>46</sup>

#### 四、丁若鏞「三吏」對杜甫「三吏」的轉化

朝鮮詩人丁若鏞「三吏」與杜甫「三吏」之寫作年代、背景不同, 寫作手法亦有所差異。這樣的情況, 類似葉維廉《比較詩學》一書評論美國詩人史迺德的詩例時所強調:「如果我們仔細的比對這兩個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時代的詩的操作程序, 其匯通處是很顯著的, 但由於文化的不同, 歧異之處亦不難發現。」<sup>47</sup>所謂丁若鏞「三吏」對杜甫「三吏」的轉化, 指的便是兩組詩之間的存在轉變、歧異。

杜甫的〈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具體而微地刻畫出安史之亂所引發的徵兵、戍役等社會現實, 感同身受地反映了戰亂下的民生疾苦。值得注意的是, 杜甫不僅是「三吏」的作者, 也是安史之亂的親身經歷者, 因此, 在敘事寫人的同時, 他往往介入詩作文本, 成為詩中的角色。在〈新安吏〉中, 杜甫是走在新安道上的過客, 因為聽到徵兵的喧呼聲而向新安吏發問:「縣小更無丁?」新安吏回答:「府帖昨夜下,

<sup>43</sup> 見丁若鏞,《與猶堂全書》,第1集,卷4,頁77。

<sup>44</sup> 見丁若鏞,《與猶堂全書》,第1集,卷4,頁82。

<sup>45</sup> 參見李曉萍,〈朝鮮詩人丁若鏞“三吏”與杜甫“三吏”之比較研究〉,頁78。

<sup>46</sup> 丁若鏞透過詩作反映社會現實,亦特別強調「美刺勸懲」的教育作用。參見李岩、徐健順,《朝鮮文學通史》(上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冊下,頁1280。韋旭升,《朝鮮文學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頁405。

<sup>47</sup> 見葉維廉,《比較詩學》(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3年),頁77。

次選中男行。」杜甫提出質疑：「中男絕短小，何以守王城？」接下去新安吏就沒有答話了。然而杜甫透過自己的所見所聞，揭示徵兵現場的殘酷景象，凸顯出官府為補充兵力而肆意徵兵拉夫的苛刻無情。此詩有二十餘句是作者杜甫自己的陳述，敘事當中還包含著杜甫對中男及其家人的勸慰。在〈潼關吏〉中，杜甫目睹「士卒何草草，築城潼關道」的辛勞以及「大城鐵不如，小城萬丈餘」的堅固，而向潼關吏提問：「修關還備胡？」潼關吏則邀請杜甫下馬步行、指著山隅向他介紹：「連雲列戰格，飛鳥不能踰。胡來但自守，豈復憂西都？丈人視要處，窄狹容單車。艱難奮長戟，萬古用一夫。」由作者與官吏的問答之間，不難窺見潼關防禦工事堅如磐石和守關將士鬥志高昂等事實。即便如此，杜甫不忘提醒將士堅守潼關、牢記哥舒翰曾經率出戰而招致慘敗的前車之鑑。〈石壕吏〉描寫杜甫夜宿石壕村後眼見耳聞役吏橫暴捉人時老翁越牆逃走、老婦被迫應役的窘迫情態，作者在這首詩中雖然沒有說話，卻是感同身受的旁觀者，他清楚記錄老婦對役吏的致詞：「三男鄴城戍。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室中更無人，唯有乳下孫。有孫母未去，出入無完裙。老嫗力雖衰，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戰亂造成平凡百姓家庭破碎、生離死別的苦痛由此可見一斑。杜甫介入詩作文本，成為詩中事件情節發展的參與者，作者的介入，使「三吏」中點兵、築城、捉人種種情事歷歷在目，富有臨場感和真實性。杜甫的「三吏」，多以作者的第一人稱視角來敘事寫人，詩中既有杜甫對自己言行、見聞的主觀描述，亦有對場景、事態之客觀敘寫，可以說是一種「主客融合」的寫作手法。<sup>48</sup>

在杜甫「三吏」的客觀敘事當中，時常伴隨著他個人主觀情感和議論的表露。〈新安吏〉寫道：「肥男有母送，瘦男獨伶俜。白水暮東流，青山猶哭聲。」敘述中男從軍的別離景象，杜甫描繪白水在暮色中無語東流，感覺青山好像帶著哭聲，這如真似幻的寫作手法，實蘊含詩人與中男同悲的主觀感受。〈新安吏〉中杜甫寬慰被強徵入伍的中男和他的家人：「莫自使眼枯，收汝淚縱橫。眼枯即見骨，天地終無情。……掘壕不到水，牧馬役亦輕。況乃王師順，撫養甚分明。送行勿泣血，僕射如父

<sup>48</sup> 參見孫玉霞，《丁茶山與杜甫詩歌創作的比較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少數民族語言文學院博士學位論文，2010年），頁132。

兄。」從中可以體會杜甫對人民遭遇不公義的對待懷抱同情和諷諫，虛寫天地無情的體認，實則表達對朝廷急切徵兵的無奈，在批判兵役政策不合理的同時，基於對國家存亡的憂慮，杜甫不得不勸勉中男應徵赴役。換言之，詩人面臨憂國與愛民的價值矛盾，最後選擇勸勉人民捨棄私情、共赴國難。〈潼關吏〉篇末杜甫告誡將士牢記前車之鑑：「哀哉桃林戰，百萬化為魚。請囑防關將，慎勿學哥舒。」則顯示杜甫對即將爆發的潼關保衛戰之關注和審慎，亦體現詩人前事不忘、禦敵從嚴的識見。〈石壕吏〉開端描述役吏蠻橫捉人的情景：「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末尾側寫老婦被迫應役的結局說：「夜久語聲絕，如聞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除了道出杜甫對百姓遭受征役驅迫之苦的感同身受，更流露詩人無言以對、大悲無言的憐憫與無奈，而他對官吏強行徵兵拉夫的批判亦不言可喻。配合著詩人對自身言行及其與詩中人物互動的描寫，杜甫將自己的主觀感受、見解融入「三吏」的客觀敘事中，詩人主觀的愛憎褒貶時常映現在人事、場景的描述當中，容易令讀者感同身受，引發讀者的共鳴。袁行霽即認為杜甫：「記述的是時事，反映的是歷史的真實畫面，而抒發的是一己情懷。」<sup>49</sup>

與杜甫「三吏」不同的是，丁若鏞「三吏」中詩人盡量隱藏自己、淡化自己，作一個相對低調的觀察者與敘事者，不介入詩作文本，不成為事件情節中的角色。諸如〈龍山吏〉寫官吏為了討好上司而到龍山村搶走耕牛，留下村民「坐令生理絕，四隣同嗚咽」的困境，作者在最後提出諷刺意味的論斷：「脯牛歸朱門，才譎以甄別。」當村民賴以維生的耕牛被以稅收的名義搶走後，勢必要被官吏做成牛肉脯奉獻給上司，成為官吏升官進階的憑藉。〈波池吏〉寫官吏到波池村去催繳租稅，「催聲縛孤寡，鞭背使前行」，致使貧士「號天訴無辜，哀怨有餘聲」，詩人藉由官吏責備貧士時的「立威更何時，指揮有公兄」一語，揭發那催促「王稅輸王京」的官吏實仰仗權勢、耀武揚威而不惜欺凌百姓的醜惡本質。〈海南吏〉由逃避租稅而遠走他鄉的海南平民悲苦獨白，揭示官吏在當地蠻橫催繳租稅，由於「新官令益嚴，程限不得踰」，導致「嗷嗷百家哭，可以媚棹夫」的慘狀，詩人藉客子之口道出「吾今避猛虎，誰復憐枯魚」的感慨和同情。凡此，詩人多從旁觀察、敘寫，客觀揭示詩中人物的遭

<sup>49</sup> 見袁行霽主編，《中國文學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2卷，頁235。

遇、事件的發展，組詩中沒有丁若鏞對自己言行的敘述，也不見詩人與詩中人物互動的描寫。

不同於杜甫「三吏」多採用第一人稱視角、詩人介入敘事當中抒發眼見耳聞的主觀感受與見解；丁若鏞「三吏」多採用第三人稱視角，從旁觀者的立場理性、客觀地敘事、寫人或議論，詩人的好惡美刺仍相對內斂地寄寓在詩作中，是一種「主客分離」的寫作手法，<sup>50</sup>可以視為對杜甫「三吏」的轉化。

如果說杜甫「三吏」的寫作手法類似導演、編劇自己介入戲劇或電影中軋一角；丁若鏞「三吏」中場景、事件之描寫有時彷彿戲劇或電影中的「定格」特寫。<sup>51</sup>〈龍山吏〉中，詩人把鏡頭定格在官吏搜牛而去的情景：「吏打龍山村，搜牛付官人。驅牛遠遠去，家家倚門看。」官吏牽著搶奪的耕牛漸行漸遠，龍山村的百姓只能無助地倚在門邊悲傷張望，而官吏不顧百姓死活的心態昭然若揭。〈波池吏〉中，詩人把鏡頭定格官吏折磨、欺侮貧士的情景：「吏怒謂其頑，僂辱怵衆情。倒懸高樹枝，髮與樹根平。」官吏將貧士倒掛在高樹上，對其大加斥責、侮辱，藉以威迫百姓繳稅，而官吏蠻橫催租無所不用其極的行徑表露無遺。〈海南吏〉中詩人將鏡頭定格在海南平民因避稅作客他鄉、心有餘悸情景：「客從海南來，爲言避畏途。坐久喘未定，怖怯猶未餘。若非值豺狼，定是遭羌胡。」海南官吏催租時的殘酷可怕不言可喻。這種類似銀幕上映出的活動影像驟然停止而成爲靜止畫面、用以突出或渲染某一場景、情態或細節的「定格」特寫，有效點出詩的主題，詩人著力於冷肅而客觀地敘寫、議論那荒謬無情卻又無力反轉的社會現實，實有助於強化、深化讀者對現實的認識和省思，時而激越讀者的心弦。

## 五、結語

丁若鏞「三吏」對杜甫「三吏」的接受，主要表現組詩的體制與主題思想兩方面：體制方面，丁若鏞「三吏」與杜甫「三吏」皆是以敘事爲主體的五言古詩，而且〈龍山吏〉對應〈石壕吏〉、〈波池吏〉對應〈新安吏〉、〈海南吏〉對應〈潼關吏〉，除〈海南吏〉中稍有例外，丁若鏞「三

<sup>50</sup> 參見孫玉霞，《丁茶山與杜甫詩歌創作的比較研究》，頁 134。

<sup>51</sup> 參見孫玉霞，《丁茶山與杜甫詩歌創作的比較研究》，頁 135。

吏」幾乎兩相對應地全面次韻杜甫「三吏」、借用杜詩的韻腳，語句詞彙也多有化用之處。主題思想方面，丁若鏞「三吏」作於李氏朝鮮大荒之年，諷刺「三政」制度的積弊，寄寓對李朝後期吏治敗壞、民生凋敝的憂慮，流露對百姓遭受官吏欺壓、剝削的同情；杜甫「三吏」作於安史之亂、唐軍相州敗戰之際，揭示朝廷急迫徵兵、戍役的社會現實，悲憫百姓家庭破碎、生離死別的苦痛。兩組詩寫作年代、背景不同，卻都深刻描繪社會現實，反映民生疾苦，繼承《詩經》傷時憤俗、美刺勸懲、以風刺上的諷諭精神，不僅蘊含匡正君心、革除時弊的經世思想，更呈顯出憂國憂民、悲天憫人的情感基調。

杜甫的「三吏」，多以作者的第一人稱視角來敘事寫人，詩中既蘊含杜甫對自己言行、見聞的主觀描述，詩人的愛憎褒貶時常映現在人事、場景的描述當中，容易令讀者感同身受，引發讀者的共鳴。丁若鏞「三吏」多採用第三人稱視角，作者低調地隱藏自己、淡化自己，冷肅地以旁觀者的立場理性、客觀地敘事、寫人或議論，而詩人的好惡美刺實寓含在字裡行間，時而激越讀者的心弦，可謂對杜甫「三吏」的轉化。

## 參考文獻

### (一)古籍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清〕阮元校勘：《毛詩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年）。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明·宋濂，《宋學士文集》（臺北：商務印書館，1967年）。

清·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

清·愛新覺羅·弘曆，《樂善堂全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朝鮮·丁若鏞，《與猶堂全書》（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2002年）。

### (二)近人專著

丁奎英，《俟菴先生年譜》（首爾：文獻編纂委員會，1961年）。

伊麗莎白·弗洛恩德（Elizabeth Freund）著，陳燕谷譯，《讀者反應理論

- 批評》(臺北：駱駝出版社，1994年)。
- 李岩、徐健順，《朝鮮文學通史》(上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
- 金秀炅，《韓國朝鮮時期詩經學研究》(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
- 金興圭，《朝鮮後期詩經論與詩意識》(首爾：高麗大學校民族文化研究所，1995年)。
- 韋旭升，《朝鮮文學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
- 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
- 黃俊傑編，《東亞視野中的茶山學與朝鮮儒學》(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6年)。
- 黃俊傑編，《東亞儒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年)。
- 葉維廉，《比較詩學》(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3年)。
- 羅勃 C·赫魯伯 (Robert C. Holub) 著，董之林譯，《接受美學理論》(臺北：駱駝出版社，1994年)。

### (三)期刊論文

- 王雪、楊新民、邵希芸，〈杜甫對朝鮮詩人丁若鏞詩歌創作的影響〉，《延邊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5年第3期，1995年3月。
- 付星星，〈朝鮮時代儒者丁若鏞《詩經講義》譏論〉，《古典文獻研究》2015年第2期，2015年6月。
- 李曉萍，〈朝鮮詩人丁若鏞“三吏”與杜甫“三吏”之比較研究〉，《安康學院學報》第23卷第5期，2011年10月。

### (四)學位論文

- 孫玉霞，《丁茶山與杜甫詩歌創作的比較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少數民族語言文學院博士學位論文，2010年)。
- 劉麗，《丁若鏞《詩經》接受研究－以詩經觀和漢詩創作爲中心》(威海：山東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年)。

## 敦煌蒙書《古賢集》的史觀意識析探

任允松\*

### 摘要

教育為立國之本，童蒙教育對個人知識的培育與人格的形成，尤其具有重大影響。唐代童蒙教育的教材在既有基礎上發展，由單純的識字教材，擴展到道德、知識、應用等方面的教育。唐代的敦煌，不僅官學興盛，民間蒙學亦十分普及。今幸賴敦煌石室大批寶貴的唐人寫本重見天日，並透過其中的蒙書寫本——《古賢集》，使我們能在千載之後，得以一窺唐代蒙學教科書的原貌。

本文探討敦煌蒙書《古賢集》的內容、體例、歷史演變，析論這部歷史教科書對於唐代敦煌地區的史料價值，並檢視這部蒙書所蘊含當代人民的史觀意識，分析編撰者撰史的思想意念，進而對當代庶民階層的歷史意識，有更整體而深入的認識。

**關鍵詞：**敦煌、蒙書、古賢集、史觀意識

## A Study on the “*gu-xian-ji*” ’s historical sense in DunHuang Handwritten Books

### Abstract

Education is the cornerstone of a country. And the initiative education has the heavy effect to Personality Molding.

A textbook for ignorant people in the Tang Dynasty have a Remarkable advances have been made. In DunHuang, not only official but also private education are popular. By “*gu-xian-ji*”, we can understand the historic documents of DunHuang Handwritten Books and the mass historical sense systematically and comprehensively .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make sure its historic-material value of this book regarding the Tang Dynasty history through proofreading the content, the styl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istoric test book, to inspect the meaning of the mass historical sense, and to analyze the author’s ideas of compiling

---

\* 玄奘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博士。

historic documents. In other words, I hope to understand the common historical sense in DunHuang thoroughly and deeply.

**Keywords:** DunHuang, a textbook for ignorant people, gu-xian-ji, historical sense.

## 一、前言

敦煌莫高窟藏經洞裡的五萬多卷寫卷，在一千餘年的塵封後；在王圓籙不經意地發現打開與變賣、餽贈於他人後；在史坦因、伯希和與日本、俄國、美國……等相繼掠劫、拐騙、強搜…後，終於重見天日，再現於世人眼前。在這五萬多卷寫卷當中，摒除近九成的佛教及宗教性典籍，學者們的眼光與研究方向，最初放在「俗文學」的研究上，甚至有以「敦煌俗文學」，統稱整個敦煌文學範疇的論點。

然而，在眾多寫卷裡，有一批遭人們忽視、遺忘已久的文獻，有幸在敦煌學者的筆路藍縷下，重新付予其新的生命與歷史定位。這批文獻，學界統稱其為「敦煌蒙書」。

「蒙書」，在一般人的傳統觀念，普遍認為它只是供小孩子讀的識字教材，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村書」。但是敦煌地處西北邊陲，胡漢雜處，在特定的時空背景下，其蒙書自有獨特的地方色彩，並且蘊含有俗文學的成分，以及俗文化的庶民意識。敦煌蒙書對於中下階層的教化功能，有著不同於正統史傳的道德偏執性，這是在其他文學載體上所難窺究竟的。

朱鳳玉〈敦煌文學研究、教學與唐代文化之互證—以《古賢集》與民間歷史教育關係為例〉一文<sup>1</sup>，以文獻學為基礎，從詠史詩的文學體類、蒙書的教育功能、類書的事類來源等幾個方面，探討敦煌蒙書《古賢集》與中晚唐詠史詩盛行的文化動因，可謂開啓以蒙書論述當代文化的研究思維。

本文嘗試以敦煌講史類蒙書《古賢集》為論述主體，透過體裁分析、

---

<sup>1</sup> 朱鳳玉，〈敦煌文學研究、教學與唐代文化之互證—以《古賢集》與民間歷史教育關係為例〉，收入《唐代文化、文學研究及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逢甲大學唐代研究中心、中國文學系，2007年5月。

內容分類、引例及出處的統計，與當代庶民歷史教育的相互關照，論析此書所內蘊的史觀意識。

## 二、敦煌講史類蒙書—《古賢集》

《古賢集》是敦煌蒙書中，極具特色的一種蒙學讀物。它是以七言歌行體的詩歌形式，歌詠歷史人物的孝友、勤學、誠信、忠貞等事蹟，用來教示學童的通俗讀物。歷史掌故、人物事蹟的內容，加上歌行體的形式，在教學上的設計，就是要讓兒童易於誦讀、記憶。在灌輸孩童歷史知識，教導孩童忠孝仁義等人格規範與道德約束的同時，也能豐富學童的寫作題材與表達的技巧。

敦煌寫本《古賢集》蒙書的體裁形式，與唐代通行的《讀史編年詩》<sup>2</sup>類似，同屬「詠史詩」一類。項楚《敦煌詩歌導論》<sup>3</sup>、徐俊《敦煌詩集殘卷輯考》<sup>4</sup>兩書，在校錄《古賢集》時，均視其為「詠史詩」。韓建瓴〈敦煌寫本《古賢集》研究〉<sup>5</sup>認為：「敦煌遺書中有一首唐詩，名曰《古賢集》。」可見《古賢集》具有「蒙書」、「詩歌」雙重成分。

《古賢集》為七言歌行體的長篇詩作，後世不傳，歷代史志目錄也未著錄。據現已公佈的敦煌寫卷，可見到的敦煌本《古賢集》，共計 9 件<sup>6</sup>。根據這些寫本「殘卷」，我們得以目睹這篇失傳千年的民間通俗歷史教育蒙書全貌。

### （一）敦煌蒙書的分類

#### 1. 敦煌蒙書的分類

敦煌蒙書，作為敦煌地區各類學校<sup>7</sup>的教材，多為中原傳入，其所反

---

<sup>2</sup> 《讀史編年詩》為趙嘏之作，與胡曾《詠史詩》、周曇《詠史詩》等，時代、階層、性質相近，同屬中晚唐文人大型詠史組詩。

<sup>3</sup> 項楚，《敦煌詩歌導論》（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3年5月），頁191-194。

<sup>4</sup> 徐俊，《敦煌詩集殘卷輯考》（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6月），頁147-153。

<sup>5</sup> 韓建瓴，《敦煌語言文學研究—〈敦煌本《古賢集》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年7月），頁150-176。

<sup>6</sup> 季羨林主編，《敦煌學大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9年10月），頁780。提到該書目前已有著錄者11個寫本：S.2049、S.6208、P.2678、P.2748、P.3113、P.3174、P.3929、P.3956、P.3960、P.4972；DX2776。

<sup>7</sup> 敦煌地區的學校依不同時期，有縣學、州學、寺學之分，其輕重與規模亦隨統治當局而有所消長。見鄭阿財、朱鳳玉，《敦煌的學校教育》（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

映的不僅是敦煌地區的特殊情況，也適度地呈現中原地區蒙學的普遍情況。蒙書發展流衍至唐代，就內容與形式上已漸趨多樣。對於敦煌蒙書的分類，學者有不同的分類與看法。

蒙書為小學支流餘裔，至後世而萌生多方，遂與原本圖書分類中的「小學類」日漸分歧。《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小學類」序：

古小學所教，不過六書之類。故《漢志》以《弟子職》附《孝經》，而《史籀》等十家四十五篇列入小學。《隋志》增以金石刻文。《唐志》增以書法、書品，已非初旨。自朱子作《小學》以配《大學》，趙希弁《讀書附志》遂以《弟子職》之類併入小學，又以《蒙求》相參並列，而小學亦多岐矣。<sup>8</sup>

而後，余嘉錫《內閣大庫本碎金跋》將古之小學析分為「字書」、「蒙求」、「格言」三類，並對蒙書的性質、源流、類別有明確的論述<sup>9</sup>。張志公《傳統語文教育初探》，將隋、唐時代的蒙書分為「識字教育」、「思想教育」、「知識教育」三大類<sup>10</sup>。汪泛舟〈敦煌的童蒙讀物〉，將敦煌蒙書分為「識字」、「教育」、「運用」三類<sup>11</sup>。梁勵〈古代啟蒙歷史教材芻議〉<sup>12</sup>，將蒙學讀物依內容分為：「識字課本」、「社會歷史知識課本」、「儒家典籍蒙學教材」三類。錢加清〈我國古代蒙學教材特點檢析〉<sup>13</sup>，將古代蒙學教材分為「綜合類」、「倫理類」、「歷史類」、「詩歌類」、「名物類」、「工具類」六類。鄭阿財、朱鳳玉《敦煌蒙書研究》將敦煌蒙書分為「識字類」、「知識類」、「德行類」三類<sup>14</sup>。張永萍〈敦煌古代教育思想芻議〉<sup>15</sup>，依據敦煌蒙書的教育功能，分為「識字」、「知識」、「教化」、「應用」四類。

---

2007年12月)。

<sup>8</sup> 清·永瑤等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台北：藝文印書館，1969年3月)，頁829。

<sup>9</sup> 余嘉錫，《余嘉錫論學雜著》(台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6年3月)，頁605-606。

<sup>10</sup> 張志公，《張志公文集(4)·傳統語文教學研究》(廣東：廣東教育出版社，1991年1月)，頁7。

<sup>11</sup> 汪泛舟，〈敦煌的童蒙讀物〉《文史知識》，1988年8月，頁104-107。

<sup>12</sup> 梁勵，〈古代啟蒙歷史教材芻議〉，《江蘇教育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6：3，江蘇，2000年7月。

<sup>13</sup> 錢加清，〈我國古代蒙學教材特點檢析〉，《語文學刊》，第四期，山東，2001年，頁9。

<sup>14</sup> 鄭阿財、朱鳳玉，《敦煌蒙書研究》(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02年)，頁7-8。

<sup>15</sup> 張永萍，〈敦煌古代教育思想芻議〉，《文化教育》，34：2，甘肅，2005年。

上述諸家分類，實乃從蒙書的「體」、「用」著眼。再觀張永萍所分的「教化類」與鄭阿財所分的「德行類」<sup>16</sup>，書目內容完全一樣，此即說明傳統蒙書的教化內容，是以品德教育為中心思想。這也突顯出敦煌地區童蒙讀物的豐富內容和多樣性題材。除極具地域特色外，更不離中原傳統中國的母體思維。而這個母體思維正是維繫中央集權君主專制政體穩健運作，支持宗族家庭倫常秩序的儒學道統。這股內蘊的教化思想，藉由《古賢集》編纂者其「集合古賢作聚韻，故令千代使人知」的教育目的，自然又順理融入在當時當地的歷史教材之中。

## 2. 敦煌蒙書的編纂形式

敦煌蒙書以不同的體式編纂，具備不同的功能性與教育目的。鄭阿財、朱鳳玉《敦煌蒙書研究》一書，收錄：《千字文》、《新合六字千文》、《開蒙要訓》、《百家姓》、《俗務要名林》、《雜集時用要字》、《碎金》、《白家碎金》、《上大夫》、《雜抄》、《孔子備問書》、《古賢集》、《兔園策府》、《九九乘法歌》、《新集文詞九經抄》、《文詞教林》、《蒙求》、《百行章》、《太公家教》、《武王家教》、《辯才家教》、《新集嚴父教》、《崔氏夫人訓女文》、《夫子勸世詞》、《一卷本王梵志詩》等篇。筆者依其內容，歸納出敦煌蒙書的編纂特色如下：

- (1) **字數不多**：少則 25 字的《上大夫》，至多也不過五千餘字的《碎金》。分量是非常符合兒童的認知發展。
- (2) **形式豐富**：有問答體、韻文體、散文體，多以方便兒童背誦記憶為考量。
- (3) **內容俚俗**：雜糅儒、釋、道三教的民間思想特質，且多有以日常生活的名物事理為主。
- (4) **道德性強**：多以忠孝節義、人格規範，為其精神主軸。
- (5) **地域性突出**：具有西北邊陲胡漢交融的地域文化特質，內容多有以介紹當地名物、生活相關，以字、詞、義為主的「工具書」。

作為當時特殊時空背景下的庶民教育的童蒙讀本，上述的編寫特色，足以解釋敦煌蒙書何以具有如此強韌的生命力，能在唐、五代時期的邊陲地域，如此廣泛流傳。

### （二）《古賢集》寫本校錄及研究

---

<sup>16</sup> 同樣列有《新集文詞九經抄》、《文詞教林》、《百行章》、《太公家教》、《武王家教》、《辯才家教》、《新集嚴父教》、《崔氏夫人訓女文》、《王梵志詩》、《夫子勸世詞》。

有關《古賢集》的整理，1974年陳祚龍〈敦煌學雜記〉<sup>17</sup>，根據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所藏6件《古賢集》寫本，進行校錄。1976年，陳慶浩〈古賢集校註〉<sup>18</sup>在陳祚龍的基礎上，加上英藏的2件《古賢集》寫本，重新進行校註，並提出了一些異議與補正。1984年，林聰明《敦煌俗文學研究》<sup>19</sup>第5章〈敦煌通俗詩考述〉，將《古賢集》列為「史事長篇歌詠」，立專節加以論述。1988年，韓建瓚〈敦煌寫本《古賢集》研究〉，依據陳慶浩一文，參酌其個人研究發現，針對各家說法進行商榷。1993年，王三慶《敦煌類書》<sup>20</sup>，據陳祚龍與陳慶浩之文，收有錄文及註釋。2000年，徐俊《敦煌詩集殘卷輯考》<sup>21</sup>重新校錄《古賢集》。2002年，鄭阿財、朱鳳玉《敦煌蒙書研究》，對《古賢集》作了錄文重校與總結研究。

據鄭阿財、朱鳳玉《1908-1997 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錄》<sup>22</sup>、《1998-2005 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錄》<sup>23</sup>兩書著錄，專以《古賢集》為題的單篇論文，僅有陳慶浩〈古賢集校註〉、韓建瓚〈敦煌寫本《古賢集》研究〉，及朱鳳玉〈敦煌文學研究、教學與唐代文化之互證—以《古賢集》與民間歷史教育關係為例〉3篇，而前2篇則著重於原文校錄。

從體制上來看，《古賢集》全篇以「君不見」3字作為起句的冒頭語，之後則是以七言40韻，80句，563字，集合古代諸聖賢事跡<sup>24</sup>，撰成長篇歌詩。全篇押韻的情形，共用真、魚、麻、支等四韻，皆平聲韻，形式十分整齊。基本上多以一句來歌詠一位賢人，間有用二句歌詠一位賢人，也出現以四句來歌詠姜太公事蹟，其中重複歌詠孔子兩次、漢武帝

<sup>17</sup> 陳祚龍，〈敦煌學雜記〉，《幼獅月刊》，40：5，台北，1974年11月，頁56-61。1979年商務印書館出版岫廬文庫本陳祚龍《敦煌資料考屑》一書，該書收錄的〈敦煌學雜記〉一文中的《古賢集》，錄文已不同於1974年之初版，部分文字做了改正。

<sup>18</sup> 陳慶浩，〈古賢集校註〉，《敦煌學》，香港新亞研究所敦煌學會編，第3輯，1976年12月，頁63-102。

<sup>19</sup> 林聰明，《敦煌俗文學研究》（台北：東吳大學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84年7月）。

<sup>20</sup> 王三慶，《敦煌類書》（高雄：麗文文化事業公司，1993年6月）。

<sup>21</sup> 徐俊，《敦煌詩集殘卷輯考》（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6月），頁147-153。

<sup>22</sup> 鄭阿財、朱鳳玉主編，《1908-1997 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錄》（台北：漢學研究中心，2000年4月）。

<sup>23</sup> 鄭阿財、朱鳳玉主編，《1998-2005 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錄》（台北：樂學書局，2006年8月）。

<sup>24</sup> 書中仍有出現秦皇、王寄、晉文公的反面教材。

兩次，也有僅舉事證確並未專指人物的特殊事例。現將全文引錄如下<sup>25</sup>：

君不見：秦皇無道枉誅人，選士投坑總被墳。范睢折肋人疑死，誰言重得<sup>26</sup>相於秦。相如盜入胡安學，好讀經書人不聞。孔丘雖然有聖德，終歸不免厄於陳。匡衡鑿壁偷光學，專錐刺股有蘇秦。孫敬<sup>27</sup>懸頭猶恐睡，姜肱翫業不憂貧。車胤聚螢而映雪，桓榮得貴費金銀。造賦題篇曹子建，羅含吞鳥日才新。甯戚馳車齊<sup>28</sup>國相，朱買貧窮被棄身。晏子身微懷智計，雙桃方便煞三臣。許由洗耳潁川渠，巢父牽牛澗上驅。夷齊餓首陽山下，遊巖養性樂閑居。荊軻入秦身未達，不解琴吟<sup>29</sup>反自誅。蘇武落蕃思漢帝，身憑鴈足與傳書。燕王被囚烏救難，干將造劍喪其軀。為父報讎眉間尺<sup>30</sup>直諫忠臣伍<sup>31</sup>子胥。結草酬恩魏武子，萬代傳名亦不虛。靈輒一食<sup>32</sup>扶輪報，隨侯賜藥獲神珠。太公少年身不遇，八十屠鉤自釣魚。有幸得逢今帝主，文王當喚召同車。江妃淚染湘川竹，韓朋守死嘆貞夫。蜀地救火有鸞巴，發使騰星檢不賒。東方入海求珍寶，船頭迴面笑官家。董仲書符去百惡，孫賓善卜辟妖邪。張騫奉使尋河路，王母乘龍戴<sup>33</sup>寶花。歎念閻浮漢武帝，費糧奉命度流沙。誰見牽牛別織女，唯聞海客鎮乘槎<sup>34</sup>。延陵留劍掛松枝，墳下亡人詎<sup>35</sup>得知。伯桃併糧身受死，參辰無義競妻兒。庭樹三荊恨分別，恆山四鳥嘆分離。割袖分桃漢武<sup>36</sup>帝，楊朱歧路起愁<sup>37</sup>悲。曾參至孝存終始，一日三省普天

<sup>25</sup> 錄文引自朱鳳玉，〈敦煌文學研究、教學與唐代文化之互證—以《古賢集》與民間歷史教育關係為例〉，頁 96-97。陳慶浩〈古賢集校注〉、韓建瓚〈敦煌本《古賢集》研究〉所錄異文，列於附註，以供參考。

<sup>26</sup> 「誰言重得」，韓建瓚作「隨緣信業」。

<sup>27</sup> 「孫敬」，陳慶浩作「孫景」。

<sup>28</sup> 「齊」，陳慶浩作「秦」。

<sup>29</sup> 「吟」，韓建瓚作「音」。

<sup>30</sup> 「尺」，韓建瓚作「赤」。

<sup>31</sup> 「伍」，陳慶浩作「午」。

<sup>32</sup> 「食」，韓建瓚作「飡」。

<sup>33</sup> 「戴」，陳慶浩作「載」。

<sup>34</sup> 「槎」，陳慶浩作「查」。

<sup>35</sup> 「詎」，陳慶浩作「具」。

<sup>36</sup> 「武」，陳慶浩作「明」。

<sup>37</sup> 「愁」，陳慶浩作「慈」。

知。王寄三牲猶不孝，慈母懷酬<sup>38</sup>鎮抱飢。孟宗冬笋供不闕，郭巨夫妻生葬兒。董永賣身葬父母，感得天女助機絲。高柴泣血傷脾骨，蔡順哀號火散離。思之可念復思之<sup>39</sup>，孝順無過尹伯奇。文王<sup>40</sup>得勝忘朋友，放火燒山覓子推。子夏賢良能易色，顏淵孔子是明師。集合古賢作聚<sup>41</sup>韻，故令千代使人知。

全文透過精簡通俗的詩句，概括歷史人物的經歷，便於學童朗讀背誦，快速的掌握歷史故事，既可敦品勵學，又可積累相關歷史知識；同時還能在詩歌韻味的浸淫中，培養作詩的興趣與墊基作詩的基礎。在內容表現上，正如詩的最後二句所說：「集合古賢作聚韻，故令千代使人知」。

論及《古賢集》的時代，九件寫卷中，三件附有題記書寫年代。據 P.3113 的題記，可知為索祐住禪師於「後唐清泰貳年丙申三月一日」所抄寫，然因清泰二年（西元 935 年）為後唐廢帝乙未年，次年方為丙申年（西元 936 年），這當抄寫錯誤。另外，S.6208 只存月日及書寫者姓氏，年份的部分破失，以致無法可考。P.2748 卷背《百歲書》序和正文中間，為襯紙文字所隔開，且《百歲書》序有兩行寫在襯紙上，可知抄寫前已有襯紙，而襯紙上有「大中四年七月廿日」紀年，「大中」為唐宣宗年號，大中四年為西元 850 年，顯然 P.2748 這件寫卷應抄寫在大中四年以後。

此外，「孫敬懸頭猶恐睡」，《藝文類聚》引《後漢書》有：「孫敬，字文質，好學，閉戶讀書，不堪其睡，乃以繩懸之屋樑，人曰『閉戶先生』。」指的該是此典故。而《古賢集》抄本作「孫景」，當是避五代時後唐高祖石敬瑭的名諱而改。整體而言，《古賢集》雖然作者不詳，然從題記、抄寫情況與寫卷書風等，綜合考察，其流傳時代當在晚唐，至於創作時代，則很可能是在大型詠史組詩與蒙書盛行的中、晚唐時期<sup>42</sup>。

### 三、從《古賢集》看詠史詩體蒙書、類書體蒙書的文化因素

「蒙書」多採類書形式編纂；如似類書書抄的《新集文詞九經抄》、

<sup>38</sup> 「酬」，陳慶浩作「愁」。

<sup>39</sup> 「思之可念復思之」，陳慶浩作「思思可念護思思」。

<sup>40</sup> 「王」，韓建瓚作「公」。

<sup>41</sup> 「聚」，陳慶浩作「字」。

<sup>42</sup> 朱鳳玉，〈敦煌文學研究、教學與唐代文化之互證—以《古賢集》與民間歷史教育關係為例〉，頁 98。

類句體的《蒙求》、文賦體的《兔園策府》、問答體的《雜抄》和詩篇體的《古賢集》。這些體式均似歷代類書，就功能論、性質論，顯然是作為童蒙教材之用，歸屬「蒙書」一類並無不妥；從編纂的形式論，與類書如出一轍，同樣具有實用的功能，歸入類書也不為過。因此自來研究敦煌文獻的學者，有從類書視角來考究，有從蒙書面向來探研。這些看似分歧，實則有其一定的脈絡，也凸顯了蒙書體制與類書的密切關係。余嘉錫〈內閣大庫本《碎金》跋〉提到：

諸家目錄皆收此書入類書類，蓋以其上自乾象、坤儀，下至禽獸、草木、居處、器用，皆分別部居，不相雜廁，頗類書鈔、御覽之體。然既無所引證，又不盡涉詞藻，其意在使人即物以辨其言，審音以知其字，有益多識，取便童蒙，蓋小學書也。<sup>43</sup>

足見類書與蒙書在體例形式與功能作用上頗多交涉，諸家目錄著錄此類書籍時皆收入類書。實際在民間使用上則是取便童蒙，則又歸屬蒙書。如此分歧，蓋以文化階層不一，視角不同，歸類自然有異。不僅類書與蒙書存在這樣密切且糾葛的問題，就是類書與詩歌，蒙書與詩歌也存在同樣的問題。

### （一）《古賢集》的詠史詩體文化因素

王三慶在研究敦煌類書時，將《李嶠雜詠·張庭芳註本》與《古賢集》歸為「詩篇體之類書」。按李嶠《雜詠》，全編 120 首，乃採用與類書體制相同而寫作的大型五律詠物組詩。持與初唐類書《藝文類聚》、《初學記》、《北堂書鈔》等相較，其標目與分屬門類相合，詩題序列亦一致，顯見初唐代文人詠物風潮與文士編纂類書之密切關係。任二北以為：「中唐胡曾與唐末周曇，各有詠史詩百餘篇。其詩亦曾配合說白，講吟於市廛或宮廷間。」<sup>44</sup>對於詠史詩與講史關係有具體深入研究。1994 年，張晨〈傳統詩體的文化透析－《詠史》組詩與類書編纂及蒙學的關係〉<sup>45</sup>，提示了詠史組詩與童蒙教育的關係，並且留意到詠史組詩與類書、蒙學之間的關係。

中晚唐的趙嘏、胡曾、周曇所創作的詠史詩，呈現的意涵與東漢以

<sup>43</sup> 余嘉錫，《余嘉錫論學雜著》（台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6 年 3 月），頁 605-606。

<sup>44</sup> 任二北，《唐聲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頁 19。

<sup>45</sup> 李宜涯，《晚唐詠史詩與平話演義之關係》（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2 年 2 月）。

來詠史詩的傳統，及唐代大小李杜等名家詠史詩的情懷與格調迥異。雖非上乘之作，然與民間純粹為學童而編寫詩歌體式的歷史類蒙書，其文學性仍然高出許多，並不能代表下層民眾的文化意識。

敦煌本蒙書《古賢集》，不著撰者，蓋為中晚唐時期從事民間私塾教育的基層知識份子所撰作<sup>46</sup>，用以作為民間童蒙教育的歷史教材，所呈現的自然更貼近廣大民眾的心理，而其形式體制與功能，足以說明中晚唐時期，蒙書、類書與詠史詩相互交涉的現象。

《古賢集》是歷史教育的詩歌體蒙書，將典範的歷史人物彙括入詩，以七言長篇呈現。就詩歌的觀點論，《古賢集》的流行自然有詩歌發展上的文化因素存在，以詠史詩體類作為蒙書，對於中晚唐時蒙書樣式起到拓展之功。然中晚唐時期，詠史詩風行，許多詩人有意的創作詠史詩。像胡曾、周曇等人，動輒百首的大型詠史組詩，更是一時盛況，對當時的歷史教育與童蒙教育有著一定的影響。因此《古賢集》的出現時期就特別的關鍵，如該書出現時期為中晚唐時期，則該書當是在這種流行文化環境下所產生，是屬於「被影響」下的產物。相對的，如該書是出現於盛唐後期到中唐前期，那《古賢集》一書的文學地位，就是屬於詠史詩的先驅。在缺乏直接證據的情況之下，我們只能確定兩者間有著絕對的相關性，至於先後順序，還待後續研究<sup>47</sup>。

## （二）《古賢集》的類書體文化因素

《古賢集》的產生與流行，存在著傳統類書事類取向的文化因素。王三慶《敦煌類書》將《古賢集》的內容歸納分類為以下 15 類：

1. 勤學：匡衡、蘇秦、孫敬、姜肱、車胤、桓榮。
2. 文學：曹子建、羅含。
3. 窮達：甯戚、朱買臣。
4. 聰智：晏子。
5. 隱士：許由、巢父、夷齊。
6. 忠烈：荆軻、蘇武、燕太子丹、干將、眉間尺、伍子胥。

<sup>46</sup> 韓建瓚，〈敦煌寫本《古賢集》研究〉，從其仿古七言古風體的形制推論，認為該書應該創作於盛唐後期到中唐前期，並認為它是一首文人詩作。

<sup>47</sup> 見朱鳳玉，〈敦煌文學研究、教學與唐代文化之互證—以《古賢集》與民間歷史教育關係為例〉，頁 104-106。

7. 報恩：魏武子、靈輒、隋侯。
8. 知遇：太公、文王。
9. 貞烈：江妃、韓朋、貞夫。
10. 方術：鸞巴、東方朔、董仲舒、孫賓。
11. 神仙：張騫、王母、漢武（明）帝、牽牛、織女。
12. 兄弟：田真兄弟、恆山鳥。
13. 敦信：延陵季子、左伯桃、參辰。
14. 慈惠：漢武帝、楊朱。
15. 孝友：曾參、王寄、孟宗、郭巨、董永、高柴、蔡順、尹伯奇。

該文又說：

從以上諸人之排次，可以看出作者有意識的把數人彙聚一處，有如類書之分類，實具類書性質，亦開《佩文韻府》等以韻文分類檢索諸類書的開端。<sup>48</sup>

除了人物的次序排列外，《古賢集》的內容，在人物、事類的來源方面，明顯的是依憑當時流行的類書。這正說明了《古賢集》編排形式，具有類書分類隸事的特質。

鄭阿財將全文 80 句，依內容分爲：「以特殊表現晉升仕宦者」、「勤學不倦終至有成者」、「聖賢爲後人景仰者」、「思想行爲實爲高士者」、「效忠國君者」、「報恩復仇，矢志不忘者」、「神話傳說故事」、「特殊友誼堪足傳揚者」、「孝親堪爲表率者」、「其他」，共計 10 類。雷僑雲分爲：「孝順類」、「友愛類」、「勤學類」、「聖賢類」、「文章類」、「仕宦類」、「忠臣類」、「高士類」、「貞節類」、「朋友類」、「恩仇類」、「神怪類」、「求佛類」<sup>49</sup>，共計 13 類。儘管類別項目名稱不同，共同點是突顯出它具有分類隸事的類書體特質。

《古賢集》歌詠的歷史人物，除了見諸於敦煌寫本 P.2524《語對》外，其中有部份人物也見諸於《纂金》、《略出纂金》、《事森》、《蒙求》、《雜抄》。又有《事林》、《齟齬書》、《孝子傳》內容互見的現象，足以說明蒙書與類書關係，《古賢集》的情況更是具體例證。

### （三）《古賢集》的蒙書特質

<sup>48</sup> 王三慶，《敦煌類書》，頁 121-122。

<sup>49</sup> 雷僑雲，《敦煌兒童文學》（台北：台灣學生書局，2000 年 9 月），頁 96-100。

《古賢集》目前共有 9 個寫卷，且寫本多為與其他詩歌共抄，足見其當時流行之盛。加上它的七言歌行體形式，內容為歷史人物的事蹟歌詠，全文字數不多，用詞淺顯俚俗，尤其是末兩句「集合古賢作眾韻，故令千代使人知。」儼然就是說教的口吻，教育意味十足。

陳祚龍認為《古賢集》，是與《太公家教》等作品同類的蒙書。他說：「事實上它只係以詩歌的形式，且用古往『聖賢豪傑』的行跡，作為敘述的中心。另外，再以淺顯的字句，配合簡單的音韻，而將中華古往的『人文史』摘要地使其浮現於『集』中！試問它的用途，如不是養蒙訓俗，還是什麼呢？」又說：「而那種『嚴父教』說起來，可就與中古流行的《太公家教》、《武王家教》、《辯才家教》、《孔子項託相問書》、《崔氏夫人訓女文》…，以及這種《古賢集》，不但都得謂為當時敦煌『文士』用以訓俗的『蒙書』，而且悉應視為當時敦煌『俗文學』的一些代表『傑作』！」<sup>50</sup>

就其內容選材與形式，《古賢集》道地就是一種歷史類的童蒙教科書，並且兼具了內容豐富、易於背誦、事例明確、道德性強等，多項蒙書特性。

#### 四、《古賢集》的史觀意識分析

史傳記載以「事」為重，事過境遷後，歷史事件總會留著難以詳述的模糊地帶。至於歷史人物的樣貌、個性，雖見載於史傳中，然其「功過事蹟」才是史傳記載的重心。童蒙讀物的編纂者充分運用個人想像，將歷史人物形象具體化、個性鮮明化，復生在編纂者所處的時空下。基於史傳重「事」；蒙書重「人」的特色下，從《古賢集》的人物歸結中，可以洞悉出此書的歷史教育觀點，凸顯其在教育上的特色與價值。

##### （一）重史、崇史的文化風尚

唐初之時，令狐德棻曾上書高祖修史，曰：「竊見近代以來，多無正史。梁、陳及齊，猶有文籍。至周、隋，遭大業雜亂，多有遺闕。當今耳目猶接，尚有可憑。如更數十年後，恐事蹟湮沒。如臣愚見，並請修之。」<sup>51</sup>。於是高祖詔令中書令蕭瑀等，纂修魏、梁、陳、北齊、北周、

<sup>50</sup> 韓建瓴，〈敦煌本《古賢集》研究〉，頁 163。

<sup>51</sup> 《舊唐書》卷 73，令狐德棻傳。

隋等朝的歷史。貞觀三年（629），唐太宗再敕令纂修五朝史<sup>52</sup>。計唐初所修的官史，有令狐德棻、岑文本《周書》、李百藥《北齊書》、姚思廉《陳書》、魏徵《隋書》。自武德以後，還有私人纂修，鄧世隆、李延壽、李仁實等，前後修撰國史，頗為當時所稱<sup>53</sup>。李延壽又「嘗刪補宋、齊、梁、陳及魏、齊、周、隋等八代史，稱為「南北史」，凡 180 卷，頒行於當代<sup>54</sup>。」私人修史較為聞名的，尚有王通《玄經》，劉允濟《魯後春秋》，張昌齡《古文紀年新傳》，元行沖《魏典》，吳兢《梁史》、《齊史》、《周史》、《隋史》，敬播《隋略》，丘悅《三國典略》，蔡引恭《後梁春秋》等。一史撰成，名留千古。無怪乎一時文人都嚮往修史，尤以能修國史為榮。

然而這股纂修正史的使命與期盼，使一些中上層文士在無法真正參與修史的遺憾下，部分轉為其他文學體裁的創作，其中一部份就轉向了童蒙教材的編寫。

從唐代上行下效的重史觀念，到史傳文學本身的多元體裁內容，無一不為歷史類蒙書提供了蓬勃發展的溫床。再加上士人本身的使命感與不可抑制的才學，唐代歷史類蒙書的興盛與高度成就，乃是必然趨勢。

## （二）官方正統的史觀意識

唐代的史觀從官方到民間，從在朝到在野，深植於士人心中。儘管編寫史書的目的不同，但是其對於歷史觀感的價值判斷，自有共識。從上述唐人所編正史的列傳條目中，可見其傳承自《史記》、《漢書》、《後漢書》。先看《史記》的列傳，太史公除了將個人獨自或並列專傳之外，另闢有儒林傳、循吏傳、酷吏傳、貨殖傳、游俠傳、佞幸傳、滑稽傳、日者傳、龜策傳。《漢書》亦有儒林傳、循吏傳、酷吏傳、貨殖傳、游俠傳、佞幸傳；《後漢書》則有宦者傳、儒林傳、文苑傳、逸民傳、烈女傳。其列傳目的無非是將人格、品行足堪典範的平民小卒也能名流青史，供後人學習效仿。

再看唐代當朝所編修的正史列傳部分，《周書》：儒林傳、孝義傳。《北齊書》：文苑傳、儒林傳。《梁書》：孝行傳、儒林傳、文學傳、

<sup>52</sup> 羅宗強，《隋唐五代文學思想史》（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08月），頁30。

<sup>53</sup> 見《舊唐書》卷73，令狐德棻傳。

<sup>54</sup> 《舊唐書》卷73，李延壽傳。

處士傳。《陳書》：孝行傳、儒林傳、文學傳。《隋書》：誠節傳、孝義傳、儒林傳、文學傳、隱逸傳、烈女傳。《南史》：儒林傳、文學傳、孝義傳、隱逸傳。《北史》：儒林傳、文苑傳、孝行傳、節義傳、隱逸傳、烈女傳。<sup>55</sup>

從上述七部官修正史所列的列傳部分，可以清楚看到唐人的官方史觀，仍然以儒家道統的忠孝節義、學優則仕為主，比較特別的是其中多部史傳中列有隱逸傳，這顯示出了，道家思想在有唐一代，還是佔有一席之地。

《古賢集》80句韻語中所引的60位人士，如依史傳正規編法，可將其列傳如下：

1. 孝義傳：曾參、王寄（董黯）、孟宗、郭巨、董永、高柴、蔡順、尹伯奇。
2. 儒林傳：孔子、顏淵、子夏。
3. 文苑傳（文學傳）：匡衡、蘇秦、孫敬、姜肱、車胤、桓榮、曹子建、羅含。
4. 誠節傳（節義傳）：荆軻、蘇武、燕太子丹、干將、眉間尺、伍子胥、韓朋、延陵季子、左伯桃、參辰、魏武子、靈輒、隋侯、田真兄弟、恆山鳥。
5. 隱逸傳：許由、巢父、伯夷、叔齊。
6. 烈女傳：江妃、貞夫。
7. 宦者傳：晏子、太公、寧戚、朱買臣、張騫。
8. 處士傳：鸞巴、東方朔、董仲舒、孫賓、楊朱。

從上述歸類，《古賢集》的紀傳體式顯然若揭，編纂者的史傳素養及史官意識，更是融入在這本敦煌當地流行的歷史教科書中。

### （三）庶民大眾的史觀意識

《古賢集》既具有類書的性格，又採近體詩的文體而成編，鎔類書、詠史詩於一鑪，用以進行民間童蒙歷史知識的教育。在民間發揮了正史與高文典冊所不及的影響力，呈現出的是民間百姓的歷史觀。它不是要抒發個人之感懷，也無意刺上諷下，它只想藉文中所詠忠孝節義、智信仁勇的典範式人物，以其平易的詩句，造語的淺俗，讓孩童便於琅琅上

<sup>55</sup> 楊家駱編，《點校本二十四史》（台北：鼎文書局，1983-1987年）。

口，形象鮮明而易記。

《古賢集》中歷史人物事蹟的敘述，呈現的是庶民的歷史觀。與傳統的史傳或人事的詠史詩，乃至一般文士大型詠史組詩，均存在著明顯的落差。其中所歌詠的內容，出現了不少正史所不載的人物事蹟，有的見於稗官小說，有的則是出於民間傳說，正是這種雅俗文化彼此間高度落差的最好例證。例如「江妃淚染湘川竹，韓朋守死嘆貞夫」、「董仲書符去百惡，孫賓善卜辟妖邪」、「誰見牛郎別織女，唯聞海客鎮乘查」、「董永賣身葬父母，感得天女助機絲」…等，其中有些人物故事是敦煌通俗文學作品描寫的題材，據陳慶浩對《古賢集》註釋中初步引到的敦煌文學作品就有近 20 種，其中不僅人事同出，對歷史人物事蹟的評價相近相承，這些共同性說明了《古賢集》所歌詠的歷史人物、事蹟，在當時社會中，特別是敦煌這個特定環境中，廣泛流傳的通俗屬性，呈現的是底層社會的歷史文化價值觀。

七言詩體的《古賢集》，集合古代賢人的事蹟加以歌詠，內容通俗易懂，且契合廣大民眾共同的心理需求，它的作用是普及歷史知識，宛如一部通俗的歷史教科書簡編。《古賢集》是廣大民眾思想、文化的投射，是小傳統的民眾文化意識，同時也是一般民眾獲取歷史知識主要便捷的渠道。

《古賢集》出現的人物，共 60 人。人物時代及典故出處如下表列：

年代、帝王	人名	出處
傳說	牽牛、織女	
堯	許由、巢父	《史記·伯夷列傳》
堯	江妃（湘夫人）	《博物記·史補》
西周	姜太公、周文王	《史記·齊太公世家》
西周（周宣王）	尹伯奇	《琴操·履霜操》
西周	伯夷、叔齊	《史記·伯夷列傳》
春秋	孔子、顏淵	《孔子家語·子路初見》、《論語·衛靈公》、《史記·孔子世家》
春秋 （西元前 507～前 400）	子夏	論語學而篇第一
春秋 （西元前 505～前 436）	曾參	《論語·學而篇》
春秋（齊桓公）	甯戚	《淮南子·道應訓》

春秋（齊宣公）	靈輒	《春秋經傳集解》
春秋（齊宣公）	魏武子	《春秋經傳集解》
春秋（齊靈公、齊莊公、齊景公）	晏子	《史記·管晏列傳》、《晏子春秋·晏子諫》
春秋晉文公	晉文公、介之推	《琴操·龍蛇歌》
春秋晉侯	參辰	《春秋經傳集解》
春秋（楚莊王）	伍子胥	《史記·伍子胥列傳》
春秋	高柴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春秋（楚文王）	左伯桃	《烈士傳》
春秋（吳王闔閭）	干將、眉間尺	《吳越春秋·闔閭內傳》
春秋吳王壽夢	延陵（季札）	《史記·吳太伯世家》
戰國時期（秦昭王）	范雎	《史記·范雎蔡澤列傳》
戰國時期（秦昭王）	蘇秦	《史記·蘇秦列傳》、《戰國策·秦》
戰國時期	孫敬	《藝文類聚》
戰國時期（燕王喜）	燕太子丹	《燕丹子》
戰國時期（燕王喜）	荆軻	《史記·刺客列傳》
戰國時期（宋康王）	韓朋、貞夫	搜神記卷十一；韓朋賦
秦始皇嬴政三十五年	秦皇	《史記·秦始皇本紀》
西漢（武帝）	漢武帝	《史記·佞幸列傳》
西漢（武帝）	蘇武	《漢書·蘇武傳》
西漢（武帝）	張騫、西王母	《史記·大宛列傳》
西漢（武帝）	東方朔	《搜神記》
西漢（武帝）	董仲、孫賓	〈董永變文〉
西漢 （西元前？～前115）	朱買臣	《漢書·朱買臣傳》
西漢景帝。 （西元前179～前117）	司馬相如	《史記·司馬相如列傳》
西漢元帝	匡衡	《史記·張丞相列傳》、《西京雜記》
西漢	隋侯	《淮南子·覽冥訓》、《搜神記》
西漢	董永	《搜神記》、《敦煌變文集·孝子傳》
新莽	蔡順	《敦煌變文集·孝子傳》
東漢	桓榮	《後漢書·桓榮傳》
東漢	姜肱	《後漢書·姜肱傳》
東漢	鸞巴	《後漢書·鸞巴傳》

東漢	漢武（明）帝 <sup>56</sup>	《後漢書·西域傳》
東漢和帝	王寄（董黯）	《敦煌變文集·孝子傳》
東漢	郭巨	〈故圓鑿大師二十四孝押 座文〉、《目蓮緣起》、〈秋胡變文〉、《搜神記》《敦煌變文集·孝子傳》
三國	曹子建	《三國志·魏書》
三國	孟宗	《三國志·吳書》
晉	車胤	《晉書》
晉	羅含	《晉書》

根據上表，歸納出正史有載的歷史人物共 48 人，屬於神話（傳說）故事或人物的有 12 人。從人數統計上，可以清楚看見《古賢集》作為歷史教材的基本元素「徵信」是具備的，不因他是小兒書而有所折扣，畢竟歷史教育的宗旨是求真、求實的。

再觀看其時代劃分：神話傳說時代共 6 人，周朝共 5 人，春秋戰國共 24 人，秦漢時代共 19 人，魏晉共 4 人。春秋戰國與秦漢時代就占了 43 人，足見其在人物的取材上，仍以信史所能掌握的為主。其中典故出於《春秋》經傳、《戰國策》、《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晉書》這些正史，以及《論語》、《淮南子》經典的占了 32 則。而大部分典出《史記》，或者說是《史記》有載，這方面透露出了《古賢集》的編纂著並非低階的知識階層，該是中上階層的文士。

《古賢集》的編纂者，當是受了當代的文人創作風格與社會風氣的直接影響，當其在編纂這部歷史教材的同時，除了顧及一般民眾對於歷史人物的普世價值外，仍兼顧到學子們對於科舉考試的需求性。

再就典範人格特色來看，勤學及仕宦者有 11 人。效忠、盡孝者有 11 人。兩項共占了 22 人，可見傳統儒家教化已深蘊其中。《古賢集》所「集」的「古賢」是確有其人，希望學童能見賢思齊，為學童豎立一個清晰的學習典範。

《古賢集》在通過對歷史人物事蹟的敘述，形象地反映了「世之所重，為學為先，立身之道，莫過忠孝」的儒家道德倫理觀念。而這正是整個中華民族，尤其是地理環境、文化背景特殊的敦煌地區所展現出的

<sup>56</sup> 陳慶浩以為此句應為漢明帝，韓建瓴以為漢武帝，當是。

最基層，也最道統的民間史觀。

#### (四) 文本編輯轉化趨向

唐及兩漢的官修正史的編輯思想，代表了當時社會上層，仕宦階級的主流思想，是一種社會菁英文化的體現。一般市民大眾的觀念與思想是很難在他們的編著中得到反映的。有幸敦煌蒙書《古賢集》的出現，得以使我們將關注的視野擴展到了當時的流行讀物和蒙學讀物，從中體察到編著者的思想重心，如何由體現社會菁英文化，轉向體現庶民文化的過程。

《古賢集》的編著者為適應普遍大眾需求，綜合儒家經典，刪繁節要，擷取嘉言粹語，以助應對進退、待人處事。這種對主流思想文化的綜合融創，既維護了統治者的政治化統治秩序，又適應了普遍民眾的道德需求，展示了編著者編輯思想的轉型過程。如《古賢集》中孝親堪為表率者：曾參、董黯、孟宗、郭巨、董永、高柴、蔡順、尹伯奇的歷史事例，都能藉由簡單的詩句、故事，潛移默化地根植於讀者心中。從此可窺見在他們的思想軌跡中，平民化，抑或大眾化的思想意識，已逐漸成形。

那波利貞指出：「從貴族性的到庶民性的，從保守傳統到創關蛻脫，從莊重典雅到輕躁卑俗，這就是中國中世史時期向近世史時期的轉化。」<sup>57</sup>在這一轉化過程中，知識已不是社會菁英的專利，文化的消費群體，也由菁英階層擴展到了普遍大眾，文化消費群體的改變，必然會影響整個社會知識與思想，從而促使了這一時期敦煌蒙書的編著思想由菁英向大眾的轉化。由普遍文本成為經典文本，這既是傳播的過程，也是通俗與經典互化的過程，《古賢集》為我們昭示了從貴族走向平民，從菁英走向大眾，由俗而雅，直至成為經典的歷程。<sup>58</sup>

敦煌蒙書《古賢集》，是唐、五代時期流傳廣泛的歷史童蒙讀物，它反映了當時一種普遍、廣泛的歷史知識傾向，及實用性。而這種實用性包括了科學應制用的功利性，與生活行為規範、道德養成的實用功能性。項楚《敦煌詩歌導論》說：

和官方的史書不同，《古賢集》並沒有從三皇五帝、堯舜禹湯說起，

<sup>57</sup> 那波利貞，《唐代社會文化史研究》（東京：創文社，1977年）。

<sup>58</sup> 謝曉春，〈敦煌蒙書編撰的平民化傾向及其價值體現〉，《敦煌研究》，第6期，蘭州，2007年，頁99。

既不羅列改朝換代的過程，也不重視帝王將相的作用。他所歌詠的『古賢』十分龐雜，包括三教九流、各色人等，乃至神話傳說中的人物。然而在這些人物身上，卻寄託了下層民眾的是非觀念、道德標準。所以《古賢集》是一部體現普通民眾思想意識的通俗歷史教科書。<sup>59</sup>

這一時期，文化知識以不再為社會菁英所獨享，文化的消費群體在不斷的擴大，它必然地促進著編輯文本的越來越通俗化。再從文化社會學的角度看，地處西北邊陲的敦煌地區，在唐、五代時期，因其特殊的地理環境及多元文化交匯的特點，其主流文化表現為一種簡約化、通俗化、生活化的大眾文化。主流文化群體的變遷，使編輯文本的通俗化、大眾化成為必然。<sup>60</sup>

再從社會文化發展的整體來看，知識普及率的提高必然地促使文化消費群體的擴大，同時也意味著其載體的內容與形式的通俗實用，正是在這種雙向互動中實現著知識與思想的大眾化，構成了當時廣泛的文化背景。<sup>61</sup>

《古賢集》在這種文化背景下，在內容取材與體式編輯上，體現了世俗化的特點，而這個世俗化包含的是：1. 編纂者的世俗化。2. 閱讀者的世俗化。3. 內容道德標準的世俗化。體式編輯上的歌行體與內容人物、事蹟、年代的雜亂無序，也就成為理所當然的常態現象了。

## 五、結語

《古賢集》這一僅保存於敦煌藏經洞的唐五代民間歷史教育寫卷，說它是詠史詩也好，歸它為類書也行，不變的是它作為童蒙教材的編寫目的，80 句的韻語，60 位的歷史人物，藉由夫子之口，而滲入到民間的生活教育之中，口耳相傳的方式，潛移默化，成為敦煌當地民間歷史知識的來源之一。長期以來，在敦煌民間發揮了正史與高文典冊所不及的影響力，牽動著、塑造著民間百姓的歷史意識。

《古賢集》縱使內容豐富、教化蘊意深遠，但是其歌行體的體式，

---

<sup>59</sup> 項楚，《敦煌詩歌導論》，頁 194。

<sup>60</sup> 楊秀清，〈社會生活的常識、經驗與規則及其思想史意義〉，《敦煌研究》，第 4 期，蘭州：2006 年。

<sup>61</sup> 謝曉春，〈敦煌蒙書編撰的平民化傾向及其價值體現〉，頁 97。

並無長篇大論的說明、註解與申論，主要還是歸因於其為「教材」的定位與「啓蒙」的性質。一套完整的教育流程且能達到教育目的，就必須是「中心思想」+「教材」+「受教者」+「施教者」。書中內文所論述的歷史人物典範即中心思想，蒙書本身即教材，啓蒙即為受教者的本質特性。而《古賢集》所具的80句七言詩的特點，正是應「施教者」而成。正因上述特點，「施教者」方能就內容的多寡、講解的深度、涉及的層面，與受教者的程度而做調整與控制。也因此，我們可以說《古賢集》是故意地內容粗淺、俚俗，目的是給「施教者」更大的自主與應用空間，套句現代名詞，即教師更具「教學自主性」。

研究過去的史觀思想，從上層知識份子的官修正史著手是容易的，而知識份子以外，屬於下階層的庶民大眾的想法為何，卻是我們很難深入去瞭解的。《古賢集》用的是淺白通俗的語言，表現的是鄙俚的俗文化，讓我們體認到敦煌的蒙書不僅可單純作為蒙書看待，還能夠結合其中的內蘊意識，重建敦煌地區甚至唐代的人文史、社會史等諸多面向的歷史原貌。

### 參考書目

- 林聰明，《敦煌俗文學研究》（台北：東吳大學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84年7月）。
- 張志公，《張志公文集(4)·傳統語文教學研究》（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91年1月）。
- 項楚，《敦煌詩歌導論》（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3年5月）。
- 王三慶，《敦煌類書》（高雄：麗文文化事業公司，1993年6月）。
- 那波利貞，《唐代社會文化史研究》（東京：創文社，1977年）。
- 羅宗強，《隋唐五代文學思想史》（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8月）。
- 季羨林主編，《敦煌學大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9年10月）。
- 徐俊，《敦煌詩集殘卷輯考》（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6月）。
- 雷僑雲，《敦煌兒童文學》（台北：台灣學生書局，2000年9月）。
- 鄭阿財、朱鳳玉，《敦煌蒙書研究》（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02年）。
- 鄭阿財、朱鳳玉，《敦煌的學校教育》（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07年12月）。

## 書評

### 《中國古籍裝幀形制考據與實踐》讀後

陳惠美\*、謝鶯興\*\*

書名：中國古籍裝幀形制考據與實踐

作者：溫台祥

出版社：台北·經學文化公司

出版日期：2019 年 6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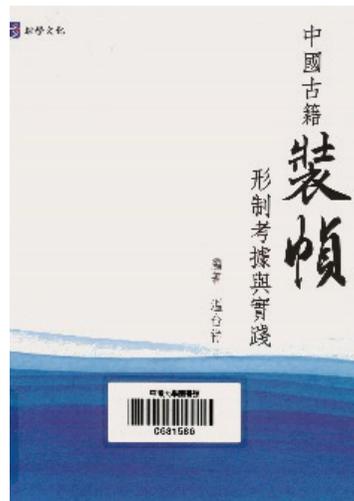
ISBN：978-986—97988-0-8

## 壹、內容概述

本書是討論刻寫書籍的材料、製作，裝幀形式、各形式的優缺點，形式的演化，兼談紙質防蟲的專書，共分為十五章，各章名稱如下：

- 第一章 緒論
- 第二章 黏著理論及黏著劑選用原則
- 第三章 紙質文物維護用黏著劑—小麥澱粉漿糊
- 第四章 簡牘
- 第五章 帛書
- 第六章 卷軸
- 第七章 害蟲綜合治理與黃蘗染潢
- 第八章 合帙管理與經帙
- 第九章 貝葉經及梵夾裝
- 第十章 經摺裝
- 第十一章 黏葉裝
- 第十二章 縫綴—是縫綴不是縫績
- 第十三章 蝴蝶裝
- 第十四章 包背裝
- 第十五章 線裝

第一章〈緒論〉首先略述「書籍裝幀形式的演化」，再說明所使用「資



\* 僑光科技大學生活創意設計系副教授

\*\* 東海大學圖書館退休館員

料來源」，特別以將近五頁的篇幅敘述「敦煌遺書與國際敦煌項目」，略顯敦煌出現的文物與書籍裝幀形式演化的關連性；其「研究方法」是使用「結合科學方法及 1925 年由王國維提倡之二重辯證法」，針對「科學方法」是「一種認知的方法」，對「所提出對事件的解釋稱為假說(hypothesis)，所有的假說都應可證明其為真(true)或假(false)。如果既不能證明假說為真，又不能證明假說為假，這時所研究的議題很有可能是一個假議題或是偽議題。」以文獻學中會提到的「旋風裝」為例，就認為「目前似乎是處於偽議題狀態，在研究者間並未獲得共識」而「不予以討論」，亦即談論「書籍裝幀形式」，並不受傳統說法的拘限。

第二章「黏著理論及黏著劑選用原則」，著重於黏著理論、定義、及黏著劑選用，並分析黏結處的結構，提供一些基本概念。

第三章「紙質文物維護用黏著劑—小麥澱粉漿糊」，從小麥澱粉漿糊的性質，到生產方法、糊化與凝膠化與調製、注意事項，並論及傳統漿糊的製備與古文獻的記載，供研讀者參考。

第四章到第六章，分別論「簡牘」、「帛書」、「卷軸」三種早期書籍的形式，各分若干節敘述各自的使用時代，材質、名稱、形製、繕寫及收藏等。因「卷軸」是首先使用紙質的形式，故論及生紙、熟紙的不同，如何以黃蘗染潢以避蟲害，卷軸的部件名稱與製作的方法。

第七章「害蟲綜合治理與黃蘗染潢」，著重於紙質文物受蟲害與如何防治，古人以黃蘗染潢以防患的作法，兼及對「裝潢」一詞既指「裝裱及以黃蘗染黃」與「書籍裝幀」兩種。

第八章「合帙管理與經帙」，則著重在藏經的種類與部帙繁重的合、分與管理。此類的分合與管理，和傳統目錄學的部類處理方式是具同工異曲的。故敘述它的歷史演進，並對相關的名詞釋義。

第九章「貝葉經及梵夾裝」，針對造紙術之前，源自印度，藉由貝葉製作的書籍—貝葉經，傳到中國，加上造紙技術的使用而演變為紙質的梵夾裝。

第十章至第十五章，分別討論紙質文物裝幀而成的「經摺裝」、「黏葉裝」、「蝴蝶裝」、「包背裝」，到現今仍為人所熟知的「線裝」等形式。敘述各形式出現的背景，皆為因應紙質的出現；為便於閱讀與防止散佚的考量而產生的裝幀；也因各自的缺點而改變裝幀的形式；為讓讀者瞭

解而詳細說明各形式的製作、裝幀的方法、步驟，各物件相關部位的名詞。其中在第十二章，藉由現存敦煌遺書實物，針對文獻記載的「縫續」或是「縫綴」的名詞，提出「縫綴—是縫綴不是縫續」的觀點，此即溫教授在〈緒論〉提到使用的「研究方法」之一，王國維提倡「二重證據法」：「幸於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的運用地下出土之新材料，來和現存古文獻的記載進行相互印證的實踐。

## 貳、本書的特點

溫台祥教授〈自序〉將紙質文物維護大致分為兩部分：「其一是實作部分，其二是紙質文物維護理論的部分。本書屬中國古籍裝幀部分，計畫在完成本書後，撰寫紙質文物維護理論相關文字。」亦即他「投入字畫及古籍維護之學習及研究」近二十年的文字成果。誠如莊芳榮〈序言〉所說：「書籍裝幀是工藝技術」，「書籍裝幀也是應用技術」，而「應用技術的特色為使用當時成熟的材料與方法，實踐出相對低成本的成果。」溫教授《中國古籍裝幀形制考據與實踐》一書，實際上可分兩個層面來看，一是從考據面，二是從實踐面。

### 一、考據面的特點，是「徵引資料宏博」

根據文獻記載，考證問題的正確性，是一般慣用的方法。溫教授徵引古今中外的資料，並且遍及當今藉由網際網路便利性而取得的電子資料庫與國內外網站的資料訊息，搭配其手中擁有的照片與實物相對照，凝結而成為他的研究成果。

#### (一)徵引古代文獻

紙質文獻來看，古代典籍遍跨經、史、子、集四部，近代則涵蓋中外文獻。

徵引古代文獻而言，例如在第四章〈簡牘〉，談「一、最早的書籍形式」單元(頁 89)，概述「簡冊書籍裝幀工序」之後，隨即引用經部的宋·魏了翁《春秋左傳要義·卷首》、東漢·許慎《說文解字·第十五卷》、《尚書·周書·第十六·多士》等諸經部之書，證明「簡冊是中國書籍的第一種正規形制」。

徵引史部之書，如第四章〈簡牘〉「三、簡牘在學術上之重要性」單元，徵引西漢·司馬遷《史記·卷六十三·老子韓非列傳第三》(頁 97)

說明「與馬王堆三號墓帛書分爲德與道兩篇相符」。

又如第六章〈卷軸〉「一、紙寫本之興起」單元，在「(二)紙本書籍的興起」(頁 190)，談紙張出現與使用的歷史，分別引用《後漢書·宦者列傳蔡倫傳》、《隋書·卷三十二·志第二十七·經籍一》記載。「三、書寫用紙」單元(頁 196)，談用紙，則徵引宋·孫逢吉《職官分紀》、《唐六典·卷二十·太府寺·右藏署》、《新唐書·卷五十七·志第四十七·藝文一》、《唐會要·卷三十五》說明「唐代集賢院使用麻紙的情形，使用數量相當大。」

徵引子部之書，如第六章〈卷軸〉，談「二、最早紀錄書籍裝幀及維護的文獻」(頁 195)時，認爲最早紀錄紙質書籍裝幀及維護的文獻，應是北朝北魏時期賈思勰所著《齊民要術》(隸屬子部)。

徵引子部之書較多者，是在第三章〈紙質文物維護用黏著劑—小麥澱粉漿糊〉的「八、中國傳統之漿糊製備相關文獻」單元(頁 65)，徵引子部藝術類諸書，如：1.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論裝背裱軸》，2.元·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卷二十九·黏紙縫法》，3.明·劉基《多能鄙事·卷五·背書畫法》，4.明·周嘉胄《裝潢志·治糊》，5.明·文震亨《長物志·書畫·糊法》，6.明·高濂《遵生八箋·燕閒清賞箋·法糊方》，7.明·馮夢禎《快雪堂漫錄·治糊兩法》，8.明·曹昭撰，明·王佐增補《新增格古要論·卷九法糊》，9.明·周履靖撰《群物奇制·文房》，10.清·周二學《賞延素心錄·糊法》，11.清·方以智《物理小識·卷八·器用類·裝潢法》等書。

徵引集部之書雖然較少，但如第十四章〈包背裝〉，在「三、包背裝之實例」單元談(二)軟面包背《四庫全書》(頁 497)時，論及：「《四庫全書》皆以館閣體手工繕寫，館閣體強調楷書的共性，即規範、美觀、整潔、大方，並不強調如今所謂的個性。」即徵引清·洪亮吉《北江詩話》記載：「今楷書之勻圓豐滿者，謂之館閣體，類皆千手雷同。」又，清高宗乾隆《御製詩·五集·卷十七·文津閣作歌》，闡釋四色分類內涵意義。

## (二)徵引中外學者論述暨網路資料

徵引近代中外文獻並及網路資料，以圖片證明論點者，全書處處可見。如第四章論「三、簡牘在學術上之重要性」(頁 95)，概述「從二十世紀初以來，於中國發掘出土大批古代文獻，如甲骨文、金文、簡牘帛

書、敦煌寫卷等。出土文獻長期掩埋於地下，保留文獻當時原貌，具有文獻真實性(authenticity)」之後，即引用近人著述(頁 95)，如：李鵬旭〈百年來簡牘出土數量新統計〉(見《絲綢之路》)，高明《帛書老子校注》，張顯成《簡帛文獻學通論》等書，並及日本學者太田辰夫《中國語歷史文法》：「將古代文獻區分為『同時資料』和『後時資料』」分類的觀點。

第三章〈紙質文物維護用黏著劑—小麥澱粉漿糊〉(頁 53)，即徵引英文文獻，如提到「根據文獻記載，中國至遲於唐代」，註 37 標示參考：「Belitz, H.-D. Grosch, W. and Schieberle, P. (2004) Food Chemistry. translation from fifth german edition by Burghagen M.M., Springer, New Yor, 317pp.」提到「小麥澱粉以不溶於水的半結晶顆粒形式存在」，在註 39 標出參考：「French, D. (1 973) Chemical and physical properties of starch. Journal of Animal Science, 37, 1048-1061.」

「三、生產小麥澱粉的方法」單元(頁 70)，談「(三)日本古糊(Furu-nori)」，在「1. 古糊之使用」說：「日本裱褙師會使用特別調製的『古糊』(Furu-nori)維修和修復字畫。」及「2.特性」說：「良好的古糊是雪白色或淺茶色、淺黃色，古糊是不透明的固體，質地易碎且幾乎是乾燥的。」即是引用日本學者的論述。

就敦煌出土文物來說，大部份都在俄羅斯、英國、法國、美國、日本及中國大陸等地，誠如在第一章〈緒論〉的「三、敦煌遺書與國際敦煌項目」(頁 19)，徵引出土文物之實物或照片，說：「國際敦煌項目是一個開創性國際合作計劃，目標是使敦煌及絲綢之路東段其他考古遺址出土的圖書、繪畫、絲織品以及藝術品資訊與圖像能在網路上免費取得，並通過教育與研究項目鼓勵使用者利用這些資源。」(頁 22)因此，本書大量運用這些圖片印證其論點。

## 二、從實踐面的特點，是詳細記載工法

作者在第一章〈緒論〉的「二、資料來源」說：

本書的內容係把梳長期以來中外相關期刊論文、書籍、研討會論文、圖書館及博物館展覽時發行之圖錄、各大拍賣場古籍拍賣專場圖錄、「國際敦煌項目」網頁提供之各國收藏之敦煌遺書實物照片及圖書館及博物館展覽之實物觀察、撰者近 40 年來收藏之各種形制古籍實物之詳細觀察與實體複製之結果，撰者就前述各項進行探

討，並作為撰寫本書之基礎資料。(頁 19)

因此本書從第四章〈簡牘〉到第十五章〈線裝〉止，都可以看到他經由「古籍實物之詳細觀察與實體複製」之後而記載下來的各種工法。

如第四章〈簡牘〉，談「一、最早的書籍形式」(頁 89)，先概述：「簡冊書籍裝幀工序包括：截鋸竹木材、殺青或風乾、刮平打磨、切契口、塗膠、先編聯後寫或先寫後編聯、等齊及裝飾等」，於「七、簡的編聯」說明編聯工法(頁 129 的「(二)編繩編聯方法」)：

編繩的方法有交錯編聯及打結編聯兩種。簡冊的編聯方法，先將書繩兩道打一實結連接，將第一枚簡置於繩結之旁二繩之間。在簡的左側將二繩上下交錯或打結，再將第二枚簡置於上下交錯或打結的編繩左側，在簡的左側將繩交錯或打結。然後不斷重複放置簡及交錯或打結編聯，至最後一枚簡為止。最後打一實結收尾，使編聯牢固。收捲的方法是以最末的一枚簡為軸，內文向裏，從左向右收捲成一卷。

又，第六章〈卷軸〉談「九、製作卷軸裝的方法」(頁 237)時：

1.首先裁書寫好或印刷好的紙葉，第一張紙葉右邊留些空白，以備黏接標之用，左邊切至與最後一行字平齊。第二張紙葉右邊切至與前一張紙黏接後留有一行與其他空白寬度相同，黏接處寬度均 5 毫米左右。

2.用隔糊紙，在第二張紙葉隔出右邊 5 毫米左右，塗上濃糊。將第一張紙葉左邊黏至第二紙葉右邊塗有漿糊處上方，前紙壓後紙。如此反覆操作至黏完所有紙葉。

從前列的兩道工法即可瞭解這種實作的說明，非僅口頭轉述他人的工法。

在第九章〈貝葉經及梵夾裝〉談「二、貝葉經」中，在「(四)貝葉經的製作」(頁 339)談貝葉經製作工序，「主要過程是經過採葉、裁切、洗貝葉、水煮、水洗、曬乾、壓平、彈線、刻寫及穿孔制匣等工序。」

在第十章〈經摺裝〉(頁 359)談「六、經摺裝的製作方法」(頁 381)，分為：1.印張，2.摺葉，3.連接，4.打磨、裁切，5.裝封面，6.貼書籤，7.用紙板製作面封，等步驟，逐一說明。

在第十一章〈黏葉裝〉(頁 385)，從「敦煌遺書中黏葉裝」(頁 390)

照片觀察中歸納出「五、黏葉裝的裝幀方法」(頁 429)，有：1.逐紙黏連，  
2.整疊紙黏連。並附上圖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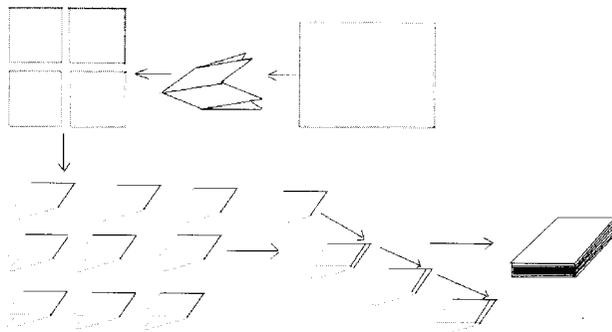


圖 11.2 逐紙黏連

讓有意藉此學習者有參考的圖片，可以依法炮製，不需自行摸索而浪費  
太多的時間與心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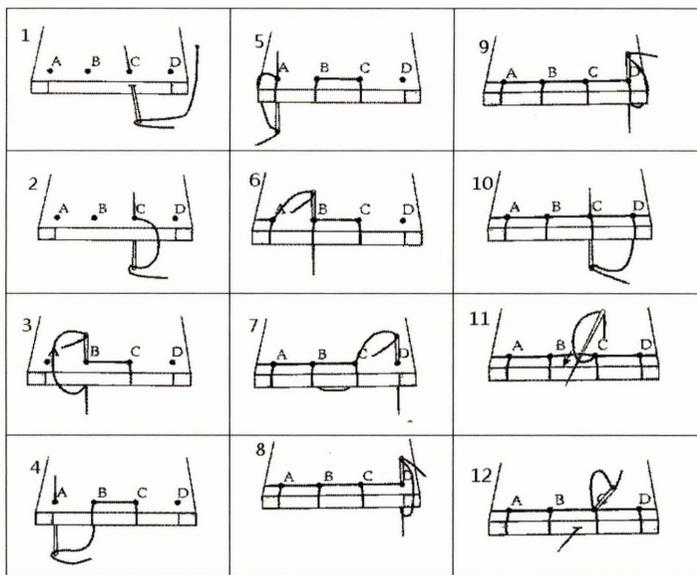


圖 15-6 線裝書四眼綴釘法縫綴方式

又如第十五章〈線裝〉的「二、線裝書」單元，引磨墨主人所編《古  
今秘苑》，在該書〈釘書十約〉最後一條，提到：「約每書一本線經七本  
書長方可，長條雙扣，此極厚本頭而言，若薄本頭只須經六本足矣，極  
厚者再加。」(頁 513)並附上圖示，惟恐讀者據以參考施作時仍存迷惑，  
再於「六、線裝書裝釘方法」單元(頁 521)，藉由文字敘述穿線的步驟，

即：從書冊正面右方第二個錐眼開始縫線。將針從書背中間插入，將線頭撥到書腦中間夾好，使其不外露，最後回到右邊第二錐眼，打結後，將針穿過書眼然後將縫線往下拉，使縫線的線結嵌入書眼內嵌緊，線結切忌外露可見，若兩股線有相纏之處，用針或用尖頭鑷子撥順。

### 參、讀後心得

本書是溫教授「由於家藏古籍與字畫蓋有一定數量，因此投入字畫及古籍維護之學習及研究。」（〈自序〉語）是他在「近 40 年來收藏之各種形制古籍實物之詳細觀察與實際複製之結果。」（第一章〈緒論〉語）。因此研讀他在古籍形制敘述的相關章節中，經由他詳細記載各種形制的製作工法，並使用圖示配合文字的敘述，強化參考學習的途徑。

筆者素昔即對文獻學頗感興趣，曾陸續翻閱傳統文獻學的書籍，對於傳統書籍形制的演變，一直認為是值得推廣的項目。近年來，有機會參與線裝古籍的整理，後來又加入線裝古籍的縫製、簡冊製作的研習，在可以參考的文獻資料不甚充足的現況之下，僅能依賴自行摸索、閉門造車的試作而已。

#### 一、習作縫製線裝書

以線裝書縫製來說，雖然有實物可以參考，擔心分解後會損害到書籍本體而作罷。台北國家圖書館曾印製線裝書穿線的圖示，但又看不出如何藏線的竅門，也無法確知線的長度應需多少。回顧剛開始修復脫線、斷線的線裝書時，因為寡聞淺識，不知有磨墨主人編《古今秘苑》，更不知該書〈釘書十約〉，提到「約每書一本線經七本書長方可，長條雙扣，此極厚本頭而言，若薄本頭只須經六本足矣，極厚者再加」的記載，只能採取「土法煉鋼」的方法：先丈量書籍的長度，以原書的線是雙股，加上繞行書背的長度（依書的厚度考量），認為至少需要書長的六倍，為保險起見，先以七倍計算。

接下來是藏線固定的問題，雖然「製線裝書穿線的圖示」有從第二孔下手，但是如何固定線頭？由於現有的線裝書並無線頭外露的現象，不能有如縫衣服般的將兩股線打結在書外；穿好線之後，要如何收線並固定而不會讓線鬆動，同時線結也不會流露在外，可真吃足不少苦頭。最後總算在起針的第二孔處打結，再穿過該孔拉緊後剪線，可以使線的

結頭、固定且不會外露了。

## 二、習作簡冊

一般談論圖書形制諸書，大都著重在書寫和攜帶考量，以龜殼、骨頭上的甲骨文，書寫在絹帛、竹簡或木牘上的文字為早期的書籍形式；不將刻畫在陶器上的符號或文字(陶文)、鑄在鐘鼎彝器上有文字(金文)的視為早期書籍的一種。

近百年來，甲骨文與簡冊的出土文物頗多，也有許多的出土的圖片、報告，可供參考其形式。筆者在縫製線裝古籍的摸索中，找到一些心得之後，注意力轉向更早期的形制，如龜甲、簡冊的仿作；在考量龜甲取得不易，且恐有殺害動物之嫌，仿作時需使用尖銳的金屬或雕刻刀等工具，以其具有相當大的危險性而作罷。

其後，筆者轉向簡冊的仿作，是以相關文物出土報告和圖片顯示，這類的簡冊形式，頗類一般診所醫生看病所用的壓舌木片，也類似坊間竹藝社、工藝館出現的竹片。但壓舌片長度略顯短小，且木質的表面在書寫時，文字會被暈染開來，可能需要再進行加工處理。而台灣是竹子的產地之一，就近的南投竹山，即有許多竹藝館，竹片的取得也較容易。經由尋訪與實地瞭解後，竹藝館可以進行削平、磨光、上漆等工法的處理，因此在書寫時，文字不致於產生暈染的現象。解決材料問題後，於是進行簡冊的仿作。

簡冊的仿作，除了竹簡的厚度、寬度、長度之外，還要注意編聯成冊的繩子，以及繩子的固定不使其滑動。竹簡本身的條件受限於材料的尺寸，無法依照出土報告所列出的大小，編聯成冊的繩子，也無法採用孔子讀《易》「韋編三絕」(《史記·孔子世家》)的細牛皮，因而僅能利用現有的麻繩。初次的編聯，發現竹簡會滑動且不易固定，因此再仔細尋找圖片，才注意到原來還有類似破損的缺口(即鏤口)，依樣畫葫蘆的利用銼刀琢出缺口，再編聯竹片，已經可以固定且不易滑動了。在書寫文字時，原本有意使用毛筆，但因竹片已上了底漆，水性的墨不易附著，改用奇異筆之類的油性筆書寫，終於完成類似早期書籍形制之一的製作。

加上偶然地從台北孔廟的商店，看到迷你型的《論語》竹簡，它的形式讓我們認為這是一種值得推廣的文化傳承工程，只是所需的經費遠多於紙質的線裝古籍縫製。

由於自個的「閉門造車」，不曾留意坊間有無這類的研習機會，因而採取「土法煉鋼」的模式仿作，確實花費頗多時間。溫教授這本書的問世，內容涵蓋了傳統書籍的數種形式，對各形式的介紹，如「『簡』是用竹或木加工而成，片解成長條形的薄竹片或木片」(頁 91)，「簡冊格式是指作為書寫材料的簡冊的格式，簡冊格式內容包括簡冊的選材、修治、長度、編聯、繕寫、題記、符號及容字。」(頁 105)對「簡的編聯」，詳敘「編繩的方法」(頁 129)，「編繩道數」：有一道編到五道編(頁 129~137)。

第十五章〈線裝〉(頁 511)，不能免俗的羅列「線裝書外觀及書冊各部分名稱」，分：1.書口，2.書脊，3.書首，4.書根，5.書眼，6.書腦，7.書角，8.書籤，9.書衣。(頁 513~517)；對「線裝書的版式」，分：1.版框，2.葉次，3.欄線，4.版心，5.魚尾，6.象鼻。(頁 517~521)讓我們認為最受用的還是在「線裝書裝釘方法」(頁 521)的「縫線」(頁 537)。所謂「頓開茅塞」，可以用在拜讀溫教授一書的感受。

### 三、關於縫綴的形式

第十二章〈縫綴——是縫綴不是縫績〉(頁 431~472)是溫教授專章考證歷年來文字在傳抄過程所發生的錯誤。在「一、縫綴裝」單元(頁 431)概述「使用線縫綴的冊葉」的形式是：

先將數張紙葉對齊對摺成一個書帖(signature)，再將數個書帖整齊疊成一疊，然後用針將麻線、絲線等於書脊折疊處縫綴。於每一書帖最內部，縫綴以經線以固定單一書帖的各張紙葉。於相連書帖間，縫綴以緯線以固定連綴書帖。集紙葉成書帖，集書帖成疊，縫綴書帖成冊。」

讀完本章溫教授依據敦煌遺書中實物縫綴形式記載，筆者聯想到此種裝訂形式，類似現今裝訂之一——騎馬釘的運用。一些期刊雜誌的抽印本，由於篇幅不多，採用膠裝比較不容易黏著，而使用釘書針，在摺頁的地方釘上，形成所謂的「騎馬釘」。而這類的騎馬釘，在一定數量的紙張範圍內即可裝訂。

至於頁數超過 500 頁的，因書籍厚度太高，若使用膠裝，裝訂處文字處不易打開，而導致閱讀上的困難；若因膠裝用的膠質不佳，更容易在裝訂處裂開，而使書籍斷裂內頁散逸，因此往往也採用每八張紙(或 16

張)爲一單元，先行打偶數孔目縫線，再進行裝訂的方式。還有一般的精裝書，都是採用這樣的方式。

以往僅覺得這是裝訂實務優先考量的結果，拜讀溫教授的實作記載，恍然大悟，原來這種裝訂方式有其歷史淵源。

## 肆、建議

「雞蛋裏挑骨頭」，是從求其完美的角度思考。溫教授花費「近 40 年來收藏之各種形制古籍實物之詳細觀察與實際複製之結果」(頁 19)，藉由文字書寫後出版，無非是本著「施予金針渡予人」的胸懷，誠如莊芳榮〈序言〉所說：「只要有文字，就必須有乘載文字記錄的載體，集結文字成書以傳播知識與技術、發表經驗、闡述思想、散播論點。」(頁 11)雖然不是用來讚揚溫教授此書，但研讀之後，即深深感受到他以弘揚傳統文化爲己任的念頭。

因此，本著「忠實讀者」的想法，略盡讀者的義務，兩點建議，或可提供溫教授於本書再版之時，當作參考。

### 一、嚴謹的治學態度，值得肯定；談裝幀的實作，建議將詳談理論的部分移作附錄

正如黃光男〈序言〉所說：「溫教授三十餘年對中國古籍的收藏研究未曾稍減熱情，豐富的古籍收藏，讓他得以從實物中領悟『與其盡信書，不如無書』的真理，科學是依據『實物』、『證據』進行研討，而非只憑片面文字或口耳相傳。」溫教授「在大膽假設、小心求證下，提出是『縫綴』不是『縫績』」(引莊芳榮〈序言〉)的論點，是透過出土文物的觀察，配合文獻上的記載，進行考據、論述，本書的第十二章〈縫綴—是縫綴不是縫績〉正是他「本於由證據說話的原則治學」(引莊芳榮〈序言〉)。

但第二章〈黏著理論及黏著劑選用原則〉，雖本著「簡單介紹黏著技術的一些基本術語，使讀者熟悉黏著科學中使用的基本術語俾撰者與讀者較容易對話與溝通」(頁 29)，其後列出「黏著處結構」、「基礎黏著理論」兩個單元詳談結構與理論。

第三章〈紙質文物維護用黏著劑—小麥澱粉漿糊〉(頁 53)，詳談「製備小麥澱粉漿糊」(頁 76)、「塗布小麥澱粉漿糊時注意事項」(頁 77)、「中國傳統之漿糊製備」(頁 81)，認爲「小麥澱粉漿糊特性」，是「具有良好

的可逆性(reversibility)。使用小麥澱粉漿糊黏著紙質文物時，不論經過時間的長短，用水適當潤濕紙質文物一段時間，乾燥硬化的小麥澱粉漿糊會充分膨潤，即可輕易將黏著在紙質文物上的物件移除。」(頁 64)是務實地著眼於未來文物的修護。其後，詳論「小麥澱粉化學及物理性質」(頁 54)及「小麥澱粉糊化與凝膠化」(頁 72)兩個單元的化學及物理性質。

誠然，兩處都是溫教授撰寫時，為求便於對話的考量而特別詳述；只是，有關化學及物理性質的文字，實屬專業，讀者未必能確實掌握。建議在這兩處，簡要繫入，專業的論述，則自成一章做為附錄，依讀者能力自行閱讀。

## 二、有關遺漏、訛誤、重見或書名符號調整的建議

前人有云「校書如掃落葉，旋掃旋生」，撰者書寫是配合思緒的流動而落筆，難免會有漏字、誤字或衍字的現象。由於自己寫的文字不易發現失誤，就有勞他人代行，特別是排版成書之前，編排者是需要協助處理這種現象的。

(一)書中若干遺漏待補充者，如第三章的「二、小麥澱粉化學及物理性質」單元的「(一)小麥澱粉之結構」(頁 54)之後，序號即跳到「(三)工業化量產小麥澱粉之特性」(頁 58)；同樣地，在「(七)小麥澱粉之 pH」(頁 63)之後，序號即為「(九)小麥澱粉漿糊特性」(頁 64)，是序號有誤或是遺漏了序號「(二)」、「(八)」？

(二)誤字待修改者，如第三章「(一)古代文獻之記載」(頁 77)引「明·周嘉胄撰有《裝潢志》，但同頁的註 114 作「明·周嘉胄《裝『演』志》，頁 81 作「明·周嘉胄《裝『演』志》」。「(八)明·高濂《遵生八箋·燕『閉』清賞箋·法糊方》」(頁 84)，頁 87 表格亦作「燕閉清賞箋」，應是「燕閒清賞箋」(或作「燕閑清賞箋」)之誤。

(三)衍字待修正者，如第六章「(二)紙本書籍的興起」(頁 90)，引述說：「王國維(1923)指出，自漢以來，中國學問上之最大發現有三」(頁 92)，在註 510 標示：「王國維(1923)指出：『自漢以來，中國學問上之最大發現有三：一為孔子壁中書；二為汲冢書；三則今之殷虛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處之漢晉木簡，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寫本書卷，內閣大庫之元明以來書籍檔冊。上之學問賴於地下之學問者，固不自今日始矣。」

【自漢以來，中國學問上之最大發現有三：一為孔子壁中書；二為汲冢

書；三則今之殷虛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處之漢晉木簡，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寫本書卷，內閣大庫之元明以來書籍檔冊。】」(頁 92) 這段說明中的【】符號，明顯重出。

又如第七章「(二)圖書館藏書之蟲害防治」(頁 242)，敘述「蟲害治理使用藥物進行殺滅，化學合成殺蟲劑種類甚多，對害蟲的作用各不相同，按其作用方式可分為以下幾類：胃毒劑、觸殺劑、內吸劑、薰蒸劑、誘致劑、『拒食劑、拒食劑』、驅避劑、昆蟲激素、抗幾丁質合成劑、抗保幼激素劑等等。」其中的「拒食劑」重見。

第九章「(一)貝葉經」(頁 328)，在談及「藏傳佛教」分佈地區時(頁 330)時，在註 908 標示出處：「班班多傑，〈佛教在藏地與漢地本土化歷史之再考察『佛教在藏地與漢地本土化歷史之再考察』〉，《中國社會科學》，2012 年」，篇名中的「佛教在藏地與漢地本土他歷史之再考察」等字，明顯重出。

#### (四)書名號的使用與一致性

書名號的使用，如第七章「(一)染書及染紙」(頁 244)，談文獻最早記錄「潢」字為染書或染紙義的，可以上溯到東漢劉熙所撰之《釋名》，同頁的註 664 標示：「《釋名》，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221 冊》，一般而言，標示「《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221 冊」為宜。

又如第八章「(七)分間分隔貯存法」在談及「自《隋書·經籍志》確立了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頁 278)之後說：「連同《四庫全書總目提要》128 冊、《四庫全書考證 72 冊》》，書名號一在「提要」二字之後，一在「72 冊」之後，亦宜一致。

第十五章「六、線裝書裝釘方法」，在談到線裝書裝釘的工序和方法時，引用《圖書館組織與管理·第十五章裝訂修補法》(頁 522)，同頁的註 1197 標示：洪有豐，《圖書館組織與管理·第十五章裝訂修補法·(甲)裝訂法·(一)中式裝》，上海市：商務印書館，1926 年，》，於「1926 年，」逗號之後衍一書名號。

(五)用字的統一，如第七章「(三)以黃『藥』汁染紙的方法」(頁 248)，同頁的「(1)古代係以川黃『藥』染紙」，「藥材川黃『藥』及關黃『藥』屬芸香科」等，是用「藥」或用「藥」？宜一致性。

以上僅就拜讀所見，略提幾點，目的在於臻於完善。

## 手稿整理

徐復觀教授《中國藝術精神》手稿整理系列(六)：

中國藝術精神主體之呈現—莊子的再發現

謝鶯興\*、謝備殷\*\*

※ ※ ※

【第五節】<sup>1</sup> 遊的基本條件--無用與和

不過莊子雖有取於「遊」。**【所】**<sup>2</sup>指的並非是具體地遊戲，而是有取於具體遊戲中所呈現出的自由活動，因而把它昇華上去，以作為精神狀態得到自由解放的象徵。**【而】**<sup>3</sup>其起步的地方，也正和具體地遊戲一樣，是從現實的實用觀念中得到解脫。康德在其大著《判斷力批判》中認為美的判斷，不是認識判斷，而是趣味判斷。趣味判斷的特性，乃是「純粹無關心地滿足」（註二十二）。所謂無關心，主要是既不指向於實用，同時也無益於認識**【的意思】**<sup>4</sup>。這正是莊子思想中消極一面的主要內容，也即是形成其「遊」的精神狀態的**【消極】**<sup>5</sup>條件，及其效用。

莊子充極遊之量，而將其稱為逍遙遊。形成逍遙遊的主體的，當然是「至人無己」的「無己」，這留在後面再去談。此處只先指出，在〈逍遙遊〉一篇的後面一部分，連**【著】**<sup>6</sup>記有三個故事。**【其中之一】**<sup>7</sup>是「肩吾問於連叔」的故事。此一故事是以下面幾句話作收束：

「……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三一頁）

\* 東海大學圖書館退休館員

\*\* 東海大學歷史系學生

<sup>1</sup> 按，手稿二、專書此3字，手稿一、論文作「五、」字。<sup>2</sup> 按，手稿二、專書、論文此1字，手稿一作「但」字。<sup>3</sup> 按，手稿一此1字，手稿二、專書、論文無。<sup>4</sup> 按，手稿二、專書此3字，手稿一、論文作「之意」2字。<sup>5</sup> 按，手稿二、專書、論文此2字，手稿一作「起步的」3字。<sup>6</sup> 按，論文此1字，手稿一、手稿二、專書無。<sup>7</sup> 按，手稿二、專書、論文此4字，手稿一作「一個」2字。

第二、第三【的故事】<sup>8</sup>，都是莊子自述他曾與惠施【互相】<sup>9</sup>辯論的故事。一個是惠施以大瓠比莊子，而認為「非不呶然【大】<sup>10</sup>也，吾爲其無用而掎之。」莊子則答以「夫子固拙於用大矣。」意思是物各有用；因其用而用之，則莫不各得其用。【惠施】<sup>11</sup>所以覺得大瓠之無用，乃是以自己爲中心以言用，而不是就大瓠之自身以言用。這是他破除以有用爲用的第一步。另一故事是惠施以無用的大樗樹比莊子，且斥莊子是「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三九頁)莊子先說明以自己爲中心之用，雖智如狸狌，大如【鼈】<sup>12</sup>牛，皆有所窮；而終結以無用乃是【大】<sup>13</sup>用。他說：

「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漠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四〇頁)

以「無用」【去】<sup>14</sup>競爭於人世利害角逐之場，則無用真成爲無用。但精神上的「無何有之鄉，廣漠之野」，是安放不下人世之所謂「用」的。將人世所認爲無用的，「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漠之野」，亦即是說，若過着體道的生活，則人世之無用，正合於道之本性，豈非恰可由此而得到逍遙遊嗎？【亦即是豈非由此而得救、神的自由嗎？】<sup>15</sup>自由的反面是被迫害(夭斤斧)，是「困苦」。「不夭斤斧」、「安所困苦」，即是精神上得到了自由【解放】<sup>16</sup>。而這種自由【解放】<sup>17</sup>，實際是由無用所得到的精神的滿足，正是康德所說的「無關心地滿足」【，亦正是藝術性地滿足】<sup>18</sup>。

上面三個故事，在內容上是一貫的，但應以第一個故事所呈出的境

<sup>8</sup> 按，手稿二、專書、論文此 3 字，手稿一無。

<sup>9</sup> 按，手稿二、專書、論文此 2 字，手稿一作「的兩個」3 字。

<sup>10</sup> 按，手稿二、專書、論文此 1 字，手稿一作「尤」字。

<sup>11</sup> 按，手稿二、專書、論文此 2 字，手稿一作「惠子」2 字。

<sup>12</sup> 按，手稿二、專書、論文此 1 字，手稿一作「鼈」字。

<sup>13</sup> 按，手稿二、專書、論文此 1 字，手稿一作「尤」字。

<sup>14</sup> 按，手稿一此 1 字，手稿二、專書、論文無。

<sup>15</sup> 按，手稿一此 15 字，手稿二、專書、論文無。

<sup>16</sup> 按，手稿二、專書、論文此 2 字，手稿一無。

<sup>17</sup> 按，手稿二、專書、論文此 2 字，手稿一無。

<sup>18</sup> 按，手稿一、專書此 9 字，手稿二、論文無。

界爲其極誼。在最高地藝術精神境界中，含融一切，肯定一切；但與人世間之所謂事功，並不相干。所以即以堯之至治，在最高地藝術精神之前，依然是「窅然喪其天下」。「喪」在《莊子》一書中，常與「忘」同義。因爲在莊子的道的立場，實際即是在藝術精神的立場，是不以用爲用，而係以無用爲用的。所以當一個人沉入於藝術地精神境界時，只是一個【渾全之】<sup>19</sup>「一」，而一切皆忘，自然會忘其天下，自然也會忘記了自己平治天下的事功。這是「無用」的極至。「無用」在藝術欣賞中是必須的觀念，在莊子思想中也是【重要】<sup>20</sup>的觀念。〈齊物論〉：「聖人不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緣道。」（九七頁）〈人間世〉：「且余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爲予大用。」（【一七二頁】<sup>21</sup>）【及】<sup>22</sup>「嗟呼！神人以此不材。」（一七七頁）【與】<sup>23</sup>「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一八六頁）【〔與〕<sup>24</sup>〈外物〉「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九三六頁）】<sup>25</sup>皆是以「無用」爲得到精神自由解放的條件。同時，由對於「用」的擺脫，而對物的觀照，如後所述，恰成爲美地觀照。

【世人之所謂「用」，皆係由社會所決定的社會價值。人要得到此種價值，勢須受到社會的束縛。無用於社會，即不爲社會所拘束，這便可以得到精神的自由。】<sup>26</sup>但由無用以得到精神的自由【解放】<sup>27</sup>，極其究，仍是「不蘄乎樊中」（〈養生主〉）的消極條件。僅有此一消極條件，則常易流於【逃避社會的】<sup>28</sup>孤芳自賞，而不能涉世，不能及物；於是「遊」便依然有一種限制。【較無用更爲積極的，是】<sup>29</sup>莊子【所】<sup>30</sup>特提出【的】

<sup>19</sup> 按，手稿二、專書此 3 字，手稿一、論文無。

<sup>20</sup> 按，手稿二、專書此 2 字，手稿一作「起步」，論文作「重大」2 字。

<sup>21</sup> 按，手稿一、專書此 3 字，手稿二、論文作「一七頁」3 字。

<sup>22</sup> 按，手稿一此 1 字，手稿二、專書、論文無。

<sup>23</sup> 按，手稿一此 1 字，手稿二、專書、論文無。

<sup>24</sup> 按，論文此 1 字，手稿二、專書無。

<sup>25</sup> 按，手稿二、專書此 16 字，論文此 17 字，手稿一無。

<sup>26</sup> 按，手稿二、專書此 60 字，手稿一、論文無。

<sup>27</sup> 按，手稿一、論文此 2 字，手稿二、專書無。

<sup>28</sup> 按，手稿二、專書此 5 字，手稿一、論文無。

<sup>29</sup> 按，手稿二、專書、論文此 9 字，手稿一作「在」字。

<sup>30</sup> 按，手稿二、專書、論文此 1 字，手稿一無。

<sup>31</sup>「和」的觀念。【「和」是「遊」的積極地】<sup>32</sup>根據。老、莊的所謂「一」，若把它從形上的意義落實下來，則只是「和」的極至。和即是諧和、統一，這是藝術最基本的性格。《國語·周語》「樂從和」。《論語》「和為貴」，《皇疏》「和即樂也」。《禮記·樂記》「大樂與天地同和」；音樂一直到戰國的中期，還是居於藝術【中】<sup>33</sup>的代表性的地位；而當時正是以和作為【音】<sup>34</sup>樂的性格。繆拉（A. H. Muller. 1779-1829）認為一切矛盾得到調和的世界，是最高的美。一切藝術作品，是世界地調和的反復（註二十三）。【多特罕塔】<sup>35</sup>（Todhunter, 1820-1884）也認為美是矛盾的調和（註二十四）。所以莊子以和【注釋】<sup>36</sup>德，【德與性同義，指的是人的本質，這即是】<sup>37</sup>認為人的本質是和，亦即是認為人之本質是藝術性的。試將有關的材料簡錄如下：

【「心莫若和。」（《人間世》一七五頁）】<sup>38</sup>

「德者成和之脩也。」（《德充符》二一四頁）

「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德充符》二一二頁）

「我守其一，以處其和。」（《在宥》一二八一頁）

「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天道》四五八頁）

「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夫德、和也。道、理也。」（《繕性》五八四頁）

「一上一下，以和為量，浮遊乎萬物之祖。」（《山木》六六八頁）

「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田子方》七一二頁）

<sup>31</sup> 按，手稿二、專書、論文此 1 字，手稿一無。

<sup>32</sup> 按，手稿二、專書、論文此 7 字，手稿一作「事實上，這是『遊』的積極」9 字。

<sup>33</sup> 按，手稿二、專書此 1 字，論文作「性」字，手稿一無。

<sup>34</sup> 按，手稿二、專書、論文此 1 字，手稿一無。

<sup>35</sup> 按，手稿二、專書此 4 字，手稿一、論文作「特多罕塔」4 字。

<sup>36</sup> 按，手稿二、專書此 2 字，手稿一作「言」字，論文作「注」字。

<sup>37</sup> 按，手稿二、專書此 15 字，手稿一、論文無。

<sup>38</sup> 按，手稿一此 11 字，手稿二、專書、論文無。

「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知】<sup>39</sup>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為汝美，道將為汝居。」（〈知北遊〉七三七頁）

「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知北遊〉七三九頁）

「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者為然。」（〈庚桑楚〉八一五頁）

「夫神者好和而惡奸。」（〈徐无鬼〉八二六頁）

【「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則陽〉八七八頁）】<sup>40</sup>

【「以樂為和。」（〈天下篇〉二零六六頁）】<sup>41</sup>

從上述天和的觀念來看，莊子是以和為天（道）的本質。和既是天的本質，所以由道分化而來之德也是和；德具體化於人的生命之中的心，當然也是和。這便規定了莊子所把握的天、人的本質，都是藝術的性格。【和是化異為同，化矛盾為統一的力量。沒有和，便沒有藝術的統一，也便沒有藝術，所以和是藝術的基本性格。】<sup>42</sup>正因為和是藝術的【基本】<sup>43</sup>性格，所以和也同時成為「游」的積極條件。而在莊子，【則】<sup>44</sup>無用與和，本為一個精神的兩面。前面所引的〈逍遙遊〉中、肩吾聞於接輿的故事，實際是以道為體，以無用【及】<sup>45</sup>和為用的一個得到逍遙遊的精神地象徵。但因為構成此逍遙遊的條件，都是構成美的條件，所以他所提出的象徵，便不期然而然地却是美地、藝術地精神的象徵。茲錄如下：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二八頁）

上面所描寫的，乃柔靜高深之美的【精神】<sup>46</sup>的自由活動。正如賈斯柏斯（Karl Jaspers, 1883-）所說：「哲學不允許給人以任何滿足；藝術則【以】

<sup>39</sup> 按，論文此1字，手稿一、手稿二、專書無。

<sup>40</sup> 按，手稿二、專書、論文此15字，手稿一無。

<sup>41</sup> 按，手稿一此12字，手稿二、專書、論文無。

<sup>42</sup> 按，手稿二、專書此43字，手稿一、論文無。

<sup>43</sup> 按，手稿二、專書此2字，手稿一、論文無。

<sup>44</sup> 按，手稿二、專書、論文此1字，手稿一無。

<sup>45</sup> 按，手稿二、專書、論文此1字，手稿一作「為」字。

<sup>46</sup> 按，手稿二、專書、論文此2字，手稿一作「靈魂」2字。

<sup>47</sup>滿足為其本質；不僅可允許其提供以滿足，並且也是其目標。」（註二十五）因為在藝術精神的境界中，是一種圓滿【具】<sup>48</sup>足，而又與宇宙相通感、相調和的狀態，所以【莊子】<sup>49</sup>便用「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來加以形容。在此狀態中，精神是大超脫，大自由；所以便用「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來加以形容。李普斯以為「美的感情」是「生的感情」。而關於感情移入的目標，他認為是「生的完成」（Sichausleben）（註二十六）。道家與儒家，同樣是體現羣性於個性之中；故一己之「生的完成」，同時即是萬物之「生的完成」，所以便用「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來【加以】<sup>50</sup>形容。這也是「和」的極致。對於〈逍遙遊〉上面的這段重要的話，只有貼切在藝術精神上去加以了解，才有其真實的內容。或者有人可以指出，藐姑射【之】<sup>51</sup>山的神人的形相是美的；但《莊子》一書，絕對多數，是假設一些殘缺醜陋的人物形相，這又如何解釋呢？不過，只要平心靜氣地去了解，便可以承認在《莊子》一書中，凡他所假設出來的殘缺醜陋的人物形相，無非藉此以反映出其所蘊藏的意味之美，靈魂之美。而意味之美，靈魂之美，才是真正藝術地美。

#### 【第六節 心齋與知覺活動】<sup>52</sup>

僅從無用、和、及對自由的要求等觀念，來斷定莊子的所謂道，即是現在的所謂藝術精神，或者可被懷疑【為這】<sup>53</sup>不過是一種偶合。現在我要進一步說明莊子所把握到的【人生】<sup>54</sup>的主體，換言之，他所把握到的作為人之本質的德、性、心，乃是藝術地德、性、心。我已經在《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第十一、十二兩章中論證過，《老子》及《莊子·內篇》中之所謂德，即是《莊子·外篇》、〈雜篇〉中之所謂性。而莊子也

---

<sup>47</sup> 按，手稿二、專書、論文此 1 字，手稿一無。

<sup>48</sup> 按，手稿二、專書、論文此 1 字，手稿一作「俱」字。

<sup>49</sup> 按，手稿二、專書、論文此 2 字，手稿一無。

<sup>50</sup> 按，手稿一、手稿二、專書此 2 字，論文無。

<sup>51</sup> 按，手稿二、專書、論文此 1 字，手稿一無。

<sup>52</sup> 按，手稿二、專書此 10 字，手稿一作「六、藝術精神主體的呈現之一--知覺問題」16 字，論文作「六、藝術精神主體的呈現之一--心齋中的知覺活動」20 字。

<sup>53</sup> 按，手稿二、專書、論文此 2 字，手稿一作「這只」2 字。

<sup>54</sup> 按，手稿一、論文此 2 字，手稿二、專書作「人」字。

和孟子一樣，把作為人之本質的性，落實於更容易【具體】<sup>55</sup>把握的心。【而莊子所把握的心】<sup>56</sup>，正是藝術精神的主體。莊子【本無意】<sup>57</sup>於今日之所謂藝術；但順莊子之心所流露而出者，自然是藝術精神，自然成就其藝術地人生；也由此而可以成就最高地藝術。

〈逍遙遊〉中有「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一七頁）的三句話，以作為「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變）以遊無窮者」的根據。而三句話中，尤以「無己」為關鍵；無己，則自然無功、無名。〈齊物論〉「今者吾喪我」（四五頁）的「喪我」，也即是「無己」。其真實內容，實即所謂「心齋」與「坐忘」；這是莊子整個精神的中核；全書隨處都【在】<sup>58</sup>指點此一意味，隨處都可以用此種意味加以【貫】<sup>59</sup>通。茲先將心齋和坐忘兩段【材料】<sup>60</sup>錄在下面：

「顏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依俞樾校當作「耳止於聽」），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也者，心齋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郭注》：未始使心齋，故有其身）；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絕跡易，無行地難。……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瞻彼闕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戲【几】<sup>61</sup>蓬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人間世〉一四七--一五〇頁）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

<sup>55</sup> 按，手稿一此2字，手稿二、專書、論文無。

<sup>56</sup> 按，手稿二、專書、論文此8字，手稿一作「由莊子所把握到的心」9字。

<sup>57</sup> 按，手稿二、專書、論文此3字，手稿一作「無心」2字。

<sup>58</sup> 按，手稿一此1字，手稿二、專書、論文無。

<sup>59</sup> 按，手稿二、專書、論文此1字，手稿一作「穿」字。

<sup>60</sup> 按，手稿二、專書、論文此2字，手稿一無。

<sup>61</sup> 按，手稿二、專書此1字，手稿一、論文作「九」字。

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蹴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大宗師〉二八二--二八五）

心齋的「未始有回」，坐忘的「墮肢體，黜聰明」，都是「無己」、「喪我」。而無己、喪我的真實內容便是「心齋」；心齋的意境，便是坐忘的意境。達到心齋與坐忘的歷程，【如下所述，】<sup>62</sup>正是美地觀照的歷程。【而】<sup>63</sup>心齋，坐忘，正是美地觀照得以成立的精神主體。【也】<sup>64</sup>是藝術得以成立的最後根據。

達到心齋、坐忘的歷程，主要是通過兩條路。一是消解由生理而來的欲望，使欲望不給心以奴役，於是心便從欲望的要挾中解放出來；這是達到無用之用的釜底抽薪的辦法。因為實用的觀念，實際是來自欲望。欲望解除了，「用」的觀念便無處安放，精神便當下得到自由。海德格【(Hei, degger, 1889-)】<sup>65</sup>認為「在作美地觀照的心理地考察時，以主體能自由觀照為其前提。站在美地態度眺望風景，觀照彫刻時，心境愈自由，便愈能得到美的享受。」（註二十七）另一【條路】<sup>66</sup>是與物相接時，不讓心對物作知識的活動；不讓由知識活動而來的是非判斷給心以煩擾，於是心便從知識無窮地追逐中，得到解放，而增加精神的自由。並且在中國缺乏純知識活動的自覺中，由知識而來的是非，常與由欲望而來的利害，糾結在一起。莊子在說心齋的地方，只說擺脫知識；在說坐忘的地方，則兩者同時擺脫，精神乃能得到澈底【地】<sup>67</sup>自由。一般人之所謂「我」，所謂「己」，實指欲望與知識的集積。莊子的「墮肢體」、「離形」，實指的是擺脫由生理而來的欲望。「黜聰明」、「去知」，實指的是擺

<sup>62</sup> 按，手稿二、專書此 4 字，手稿一、論文無。

<sup>63</sup> 按，手稿二、專書、論文此 1 字，手稿一無。

<sup>64</sup> 按，手稿二、專書、論文此 1 字，手稿一作「這」字。

<sup>65</sup> 按，手稿一多海德格的外文名字及出生年，手稿二、專書、論文無。

<sup>66</sup> 按，手稿二、專書此 2 字，手稿一、論文無。

<sup>67</sup> 按，手稿一、手稿二、專書此 1 字，論文作「的」字。

脫普通【所謂的】<sup>68</sup>知識活動。二者同時擺脫，此即所謂「虛」，所謂「靜」，所謂「坐忘」，所謂「無己」，「喪我」。〈齊物論〉的「忘年【(年是人的最後〔地〕<sup>69</sup>欲望)】<sup>70</sup>忘義【(義是由知而來的是非判斷)】<sup>71</sup>」(一〇八頁)，也正是欲望與知識雙忘的意思。欲望藉知識而伸長，知識也常以欲望為動機；兩者是在互相推長的關係，同時也是在互相解消的關係。離形即含有去知的意味在裏面；去知即含有離形的意味在裏面。而莊子的「離形」，也和老子之所謂無欲一樣，並不是根本否定欲望，而是不讓欲望得到知識的推波助瀾，以至於溢出【於】<sup>72</sup>各自性分之外。在性分之內的欲望，莊子即視為性分之自身，同樣加以承認的。所以在坐忘的意境中，以「忘知」最為樞要。【忘知，是忘掉分解性的，概念性的知識活動；剩下的便是虛而待物的，亦即是徇耳目內通的純知覺活動。這種純知覺活動，即是美地觀照。】<sup>73</sup>

現在先考察一下美地觀照得以成立的情形。所謂觀照，是對物不作分析地了解，而只出之以直觀的活動。此時的態度，與實用地態度及學問（求知）地態度分開，而只是憑知覺發生作用。這是看、聽的感官活動，是屬於感性的。但知覺【因其孤立化、集中化，而】<sup>74</sup>並非停留在物之表面上，而是洞察【到】<sup>75</sup>物之內部，直觀其本質，以通向自然之心，因而使自己得到擴大，以解放向無限之境（註二十八）。哈曼（Richard Hamann, 1879-）在其「Aesthetik」中，對在美地觀照中的知覺特性，曾與以說明。即是不把知覺用作認識事物客觀性質的手段，也不利用它作行動的指導，而只是止於知覺之自身，以知覺之自身為滿足，此時的知覺，乃【自然成為美地觀照】<sup>76</sup>。哈曼把知覺的固有意義，關連到美學的

<sup>68</sup> 按，手稿二、專書此 3 字，手稿一作「之所謂」，論文作「所謂」2 字。

<sup>69</sup> 按，專書此 1 字，手稿二作「的」，論文無。

<sup>70</sup> 按，手稿二、專書此 8 字，論文此 7 字，手稿一無。

<sup>71</sup> 按，手稿二、專書、論文此 11 字，手稿一無。

<sup>72</sup> 按，手稿一此 1 字，手稿二、專書、論文無。

<sup>73</sup> 按，手稿二、專書此 54 字，手稿一作「因為『忘知』，而成為美地觀照」11 字，論文作「因為『忘知』，而始成為美地觀照」12 字。

<sup>74</sup> 按，手稿二、專書此 9 字，手稿一、論文無。

<sup>75</sup> 按，手稿二、專書、論文此 1 字，手稿一無。

<sup>76</sup> 按，手稿二、專書此 8 字，手稿一作「有美地意義」5 字，論文作「自美地意義」5

基礎問題，其理由之一，因為普通當知覺活動時，一般人總是想以概念把握知覺後面的東西，或轉向實踐方面。但亦有超越上述的界限，而僅專念於知覺自身之時，此乃知覺的純粹性。福多拉(Konnad Fiedler, 1841-1895)認為畫家與彫刻家是專念於「視」的人；亦即是專念於知覺之人。【其】<sup>77</sup>理由之二是，在我們精神生活中，能因此而解除理論地關連與實踐地關連。此時的知覺，由對理論與實踐的疏遠而得到孤立化。孤立化的知覺，可以說是不尋常的特殊狀態；而成其根柢的，乃是美地態度（註二十九）。並且哈曼認為美地形相，是由【知覺的】<sup>78</sup>孤立化、集中化、及強度化而得到。此時好像是專一於一個東西。而其前提條件，乃在於撤去心理地主體（註三十）。按知覺孤立化，則自然集中化，強度化；此即莊子【上面】<sup>79</sup>之所謂【「若一志」及】<sup>80</sup>「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大宗師〉二三四頁）。所謂撤去心理地主體，即莊子之所謂「虛」，【所謂心齋。心齋，是忘知的心的狀態。而如前所說，他】<sup>81</sup>的忘知，乃是解消掉分解【性】<sup>82</sup>之知，【以】<sup>83</sup>使心只有知覺的作用。他說：「耳止於聽」，是說耳僅作聽的知覺；「心止於符」，是說心僅作與聽的知覺相應的知覺。又說：「徇耳目內通」，是說只順著耳目的【感性】<sup>84</sup>知覺以內通於心，而不作分析地、論理地活動的意思。他說：「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此處之心，是指分解之知的主體；此處之氣，【是對心齋的一種比擬的說法。心齋只有「待物」的知覺活動，而沒有主動地去作分解性、概念性的活動，所以他便以氣作比擬】<sup>85</sup>。心從實用與分解之知

---

字。

<sup>77</sup> 按，手稿二、專書、論文此 1 字，手稿一無。

<sup>78</sup> 按，手稿二、專書此 3 字，手稿一、論文無。

<sup>79</sup> 按，手稿二、專書此 2 字，手稿一、論文無。

<sup>80</sup> 按，手稿二、專書此 4 字，手稿一、論文無。

<sup>81</sup> 按，手稿二、專書此 20 字，手稿一、論文作「莊子」2 字。

<sup>82</sup> 按，手稿一、手稿二、專書此 1 字，論文無。

<sup>83</sup> 按，手稿二、專書、論文此 1 字，手稿一作「是爲了」3 字。

<sup>84</sup> 按，手稿二、專書此 2 字，手稿一、論文無。

<sup>85</sup> 按，手稿二、專書此 49 字，手稿一、論文作「是指知覺之直觀的主體，其實，正是心的本來面目」20 字。

【中】<sup>86</sup>解放出來，而僅有知覺的直觀活動，這即是虛與靜的心齋，即是離形去知的坐忘。此孤立化【專一化】<sup>87</sup>的知覺，正是美地觀照得以成立的重要條件。

【不過，這裏特須提明一點的是：正因為有「己」，而「無己」乃有其意義。同樣的，必須是有「知」，而「忘知」乃有其意義。莊子乃是面對著當時的知識分子而言忘知。所以作為忘知的根柢的還是某程度的知識。他雖然常以渾沌作忘知後的形容，但他的忘知實不同於一般之所謂渾沌。否則孤立化後的知覺特性，便發揮不出來。〔進到小孩子眼裡的東西，都是美的，可以用作遊戲的東西，因為小孩子多只有知覺活動。但沒有知識作基底的知覺活動，可以將事物變成美地對象，因而感到一種滿足。不過這種滿足，不能上昇到有美地自覺的程度。〕<sup>88</sup> <sup>89</sup>

### 【第七節 藝術精神的主體一心齋之心與現象學的純粹意識】<sup>90</sup>

僅由孤立化的知覺以說明莊子的心齋，還是不夠的。同時，僅以直觀地知覺活動【以】<sup>91</sup>說明美地觀照，也是不夠的。因為它得以成立的根據並不明顯。【心齋之心的本身，才是藝術精神的主體，亦即美地觀照得以成立的根據。為說明這一點，試取現象學的純粹意識，略加對照、考查。】<sup>92</sup>

進一步闡明美地觀照的根源的，【近代】<sup>93</sup>則有胡塞爾(Edmund Husserl, 1859~1938)的現象學。下面試把有關的部分，略述一個大概(註三十一)。

【當然這裡只能涉及他的思想的架構，而不能深入到他的內容。】<sup>94</sup>

現象學希望把由自然地觀點(Natürliche Einstellung)而來的有關自然世界的一切學問，加以排去。其排去的方法，或者將其歸入括弧

<sup>86</sup> 按，手稿二、專書、論文此1字，手稿一無。

<sup>87</sup> 按，手稿二、專書此3字，手稿一、論文無。

<sup>88</sup> 按，手稿二、專書此86字，論文無。

<sup>89</sup> 按，手稿二、專書此210字，論文此124字，手稿一無。

<sup>90</sup> 按，手稿二、專書此23字，手稿一作「七、藝術精神主體呈現之二■■■」13字，論文作「七、藝術精神主體呈現之二--以虛靜為體之心」18字。

<sup>91</sup> 按，手稿二、專書、論文此1字，手稿一無。

<sup>92</sup> 按，手稿二、專書此51字，手稿一、論文無。

<sup>93</sup> 按，手稿二、專書、論文此2字，手稿一無。

<sup>94</sup> 按，手稿二、專書此25字，手稿一、論文無。

(Einklammerung)，或【者】<sup>95</sup>實行中止判斷 (Cpoche)。由排去而尚有排去不掉的東西，稱為現象學的剩餘 (Phänomenologisches Residuum)。這是意識自身的固有存在 (Eigen Sein des Bewusstsen)，是純粹意識 (Reines Bewusstsein)。見 Husserl: Ideen Zn Einer Reinen Phänomenologischen Philosophie, §33)。現象學承認自然地觀點，及由此而來的各種學問。這是在意識之上，在眼前的現實世界中的學問。但【他覺得】<sup>96</sup>難說這便是學問的一切嗎？現象學是要探出更深的意識，是要獲得一個新地存在領域 (Ibid. §33)；這即是由歸入括弧與中止判斷的現象學「還原」的方法，所探出的純粹意識的固有存在。這不是經驗的東西，而是超越的東西。現象學是要在這種根源之學 (Wissenschaft der Ursprunge) 的地方為由自然地觀點而來的諸學找根據。美地觀照，也應當在此有其根據 (Ibid. §65)。

求根據，是由於對表面事物之不滿。想給事物以根據的要求，【乃是來自】<sup>97</sup>想看出事物本質的希望。現象學的希望，在於探求事物之本質。現象學為了求根據，所以排去自然地觀點。為了求本質，則【又】<sup>98</sup>與自然事象有關係。現象學地還原，是以排去為手段。為了求本質，則以由現象學所加於自然「事象」的洞見為手段。對現象學而言，「事象」非常重要；但這是為了通過事象以達到其究竟乃至其本質。現象學所要求的是要窮究到事象的本身 (Die Sache Selbst)，作「即事象地考察」；但不立即以此為本質，而須發揮現象學的洞見的效驗，以把握其本質。這是「即事象」，「即本質」的考察。

在追求美地觀照的根據時，還是用現象學地洞見。他指出了【有】<sup>99</sup>幾條路可走。其一是：把現實「所與」的觀照對象，當即使它中止其「所與」，超越其事象，【而】<sup>100</sup>作為原地「能與」去加以直觀 (Ibid. §19)。胡塞爾覺得為了作為直觀事象的方法，作確證的根據，以導出妥當性，

---

<sup>95</sup> 按，手稿二、專書、論文此 1 字，手稿一無。

<sup>96</sup> 按，手稿二、專書、論文此 3 字，手稿一無。

<sup>97</sup> 按，手稿二、專書、論文此 4 字，手稿一無。

<sup>98</sup> 按，手稿二、專書、論文此 1 字，手稿一無。

<sup>99</sup> 按，手稿二、專書此 1 字，手稿一、論文無。

<sup>100</sup> 按，手稿二、專書、論文此 1 字，手稿一無。

需要「直接地觀」。並且這是訴之於原地「能與」的直觀。此種原地「能與」的意識（Das Original Gebende Bewusstsein），才是一切理性主張的究極權利的源泉。把被指向於某對象的「所與」之觀照，超越時空關係，移向原地「能與」的意識去看。這種觀點，是瞥見事象之本質。其二，是把現象學的還原，加到美地觀照事象之上。把美地觀照時一切的心【地】<sup>101</sup>作用，心理【地】<sup>102</sup>力之活動，皆將其歸入於括弧之中，實行對斷中止。由此而依然作為剩下來的超越地剩餘，可以看出意識的固有存在。這是在美地觀照之意識中的固有存在，是存在領域。其三、在美地觀照中各種心的作用，必須有活動的「場」；作用關連而為一領域，應當有「領域地機能」。知覺的意識或感性的意識等，能成為共同地活【動】<sup>103</sup>意識，不能沒有「意識領域。前者是「作用地經驗地意識」，而後者是「領域地超越地意識」。把各種心地作用關連在一起，賦與以力量而使其活動的，是意識領域，是【意識領域的】<sup>104</sup>機能。

上面所說的「原地能與的意識」、「意識的固有存在」及「意識領域」，都是超越地意識，把這加到美地觀照的事象上，於是在美地觀照中，有經驗地意識層，與超越地意識層的兩層意識。美地觀照的意識，正由此兩層意識而成立。前者是指向美地意識的契機，後者則是其根據。現象學所探求出的超越地意識的基本構造是 Noesis（意識自身的作用）與 Noema（被意識到的對象）的相關關係。所謂美地觀照，是向某對象的心地作用；在究極上，乃是顯示意識的基本構造之自身。觀照因其是基於意識的基本構造，才是美地。並且作用與對象的關係，與成立在「經驗地意識」上的關係不同，這是成為在「純粹意識中」的關係。即是在純粹意識乃至根源意識中，對象與作用，是同時的；對象與作用成為相關項。這不是有對象然後有作用的前後關係，乃至因果關係，而是成為根源地關係。此一事實，使人可以察知在美地觀照中的對象與知覺的本來地關係。即是，對象與知覺成為相關關係；而且基於根源地關係，美地

<sup>101</sup>按，手稿二、專書此1字，手稿一、論文作「地」字。

<sup>102</sup>按，手稿二、專書此1字，手稿一、論文作「地」字。

<sup>103</sup>按，手稿二、專書、論文此1字，手稿一無。

<sup>104</sup>按，手稿二、專書此5字，手稿一、論文作「其」字。

觀照乃得以成立。美地意識，是包含對象與作用的緊密而相關地、根源地關係的意識。對象性與意識性，在 Noesis 與 Noema 的相關關係中，兩者是根源地「一」，這是成爲美地意識的特質，同時也是美地意識的本質。這是美地觀照得以成立的根據。

【現象學出現的科學背景，及在人自身爲科學乃至一切之學求根據的目的，與莊子沒有相同之處。而其現象學還原的方法，在本質上恐怕還是處於思辨性的，這與莊子以體驗、工夫爲方法的，也有不相同的性格。但若僅就其大地傾向與思想的結構而言，則二者實有其相同之點。而這種相同之點，在現象學是有意地爲美地觀照求根據，在莊子則是無意地發掘到美地觀照的根據。】<sup>105</sup>

現象學的歸入括弧，中止判斷，實近於莊子的忘知。不過，在現象學是暫時的；在莊子則成爲一往而不返的要求。因爲現象學只是爲知識求根據而暫時忘知；莊子則是爲人生求安頓而一往忘知。現象學的剩餘，是比經驗地意識更深入一層的超越地意識，亦即是純粹意識，實有近於莊子對知解之心而言的心齋之心。心齋之心，是由忘知而呈現，所以是虛，是靜；現象學的純粹意識，是由歸入括弧，中止判斷而呈現，所以也應當是虛，是靜。現象學在純粹意識中所出現的是 Noesis 與 Noema 的非前後，【非】<sup>106</sup>因果的相關關係；【因此】<sup>107</sup>，兩者是根源地「一」；若廣泛點地說，這即是主客地合一；並且認爲由此所把握到的是物的本質。而莊子在心齋的虛靜中所呈現的也正是「心與物冥」的主客合一；並且莊子也認爲此時所把握的是物的本質。莊子忘知後是【純】<sup>108</sup>知覺的活動，【在】<sup>109</sup>現象學的還原中，也是【純】<sup>110</sup>知覺的活動。但此知覺的活動，乃是以純粹意識爲其活動之場，而此場之本身，即是物我兩忘，【主客合一的】<sup>111</sup>，這才可以解答知覺何以能洞察物之內部，而直觀其本質，並使

<sup>105</sup>按，手稿一此 152 字，手稿二、專書、論文無。

<sup>106</sup>按，手稿二、專書此 1 字，手稿一、論文無。

<sup>107</sup>按，手稿二、專書此 2 字，手稿一、論文作「並且」2 字。

<sup>108</sup>按，手稿二、專書、論文此 1 字，手稿一無。

<sup>109</sup>按，手稿二、專書、論文此 1 字，手稿一無。

<sup>110</sup>按，手稿二、專書、論文此 1 字，手稿一無。

<sup>111</sup>按，手稿二、專書、論文此 5 字，手稿一無。

其向無限中飛越【的問題】<sup>112</sup>。莊子更在心齋之心的地方【指】<sup>113</sup>出虛（靜）的性格，【指】<sup>114</sup>出由虛而「明」的性格，更【指】<sup>115</sup>出虛靜是萬物共同的根源的性格，恐怕這更能給現象學所要求的以更具體的解答。【因為是虛，所以意識自身的作用（Noesis）和被意識到的對象（Noema），才能直往直來的同時呈現。因為是虛，所以才是明，所以才可以言洞見，】<sup>116</sup>假定在現象學的純粹意識中，可以找出美地觀照的根源，則莊子【心齋的心】<sup>117</sup>，為什麼不是美地觀照的根據呢？我可以這樣說，現象學之於美地意識，只是儻然遇之；而莊子則是徹底地全般地呈露。他說：「虛室生白，吉祥止止」，虛室即是心齋，「白」即是明；「吉祥」乃是美地意識的另一表達形式。心齋即生洞見之明；洞見之明，即呈現美地意識。

【這裡我應補充陳述一點，美地意識，是由將所觀照之對象，成為美地對象而見。觀照所以能使對象成為美地對象，是來自觀照時的主客合一，在此主客合一中，對象實際是擬人化了，人也擬物化了；儘管觀聽者的自身在觀照的當下，常常並未意識到這一點。觀照時的所以會主客合一，是因為當觀照時，被觀照之物，一方面能與觀照之人，直接照面，中間沒有半絲半毫間隔。同時，在觀照的當下，只有被觀照的赤裸裸地一物，更無其他事物、理論等等的牽連。然則何以能如此？是因為凡是進入到美地觀照時的精神狀態，都是中止判斷以後的虛，靜地精神狀態，也實際是以虛靜之心為觀照的主體。不過，這在一般人，只能是暫時性的，莊子為了解除世法的纏縛，而以忘知忘欲，得以呈現出虛靜的心齋。以心齋接物，不期然而然的便是對物作美地觀照，而使物成為美地對象。因此，所以心齋之心，即是藝術精神的主體。】<sup>118</sup>

### 【第八節 心齋的虛、靜、明】<sup>119</sup>

<sup>112</sup>按，手稿二、專書、論文此3字，手稿一無。

<sup>113</sup>按，手稿二、專書、論文此1字，手稿一作「點」字。

<sup>114</sup>按，手稿二、專書、論文此1字，手稿一作「點」字。

<sup>115</sup>按，手稿二、專書、論文此1字，手稿一作「點」字。

<sup>116</sup>按，手稿二、專書、論文此51字，手稿一無。

<sup>117</sup>按，專書此4字，手稿一、手稿二、論文作「的心齋」3字。

<sup>118</sup>按，手稿二、專書此324字，手稿一、論文無。

<sup>119</sup>按，手稿二、專書此節11字的標題，手稿一作「藝術精神主體呈現之三--」10字。

現在再順著莊子的心齋，作若干引伸性的陳述。

莊子把心齋以後的心的作用比作鏡，有時又以水作喻。他說：

「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惟止，能止眾止。……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而況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德充符〉一九三頁）

「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同上一九七頁）

「【盡其所受於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sup>120</sup>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成疏》：送也）】<sup>121</sup>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應帝王〉三〇七頁）

「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撓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準，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鑑也，萬物之鏡也。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sup>122</sup>萬物之本也。……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天道〉四五七--四五八頁）

「徹志之勃，解心之謬。……貴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此四六者不盪胸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無則無為而無不為也】<sup>123</sup>。」（〈庚桑楚〉八一〇頁）

從上面的材料看，首先可以發現由欲望與心知得到解放的虛靜之心，其效果是「明」。明即是「一知之所知」的「知」。〈刻意篇〉有「靜一而不變」（五四四頁）的話。一與靜連用，一故靜，靜故一。由此可知「一知」即是「靜知」。所謂靜知，【是〔在沒有被任何欲望擾動的精神狀態下所發生的孤立性的知覺。此時的知覺是沒有其他牽連的，所以是孤立的，所以是「一知」。因為是在靜的精神狀態下知物，所以〕<sup>124</sup>知物而不為物

---

論文作「八、藝術精神主體呈現之三--虛、靜、明」14字。

<sup>120</sup>按，手稿此14字，手稿二、專書、論文無。

<sup>121</sup>按，手稿此4字，手稿二、專書、論文無。

<sup>122</sup>按，手稿此26字，手稿二、專書、論文無。

<sup>123</sup>按，手稿二、專書、論文此9字，手稿一作「為而無不為也」6字。

<sup>124</sup>按，手稿二、專書此87字，論文此22字，手稿一作「是知而不受擾動，知而不受

所擾動。知物而不爲物所擾動的情形，】<sup>125</sup>正如鏡之照物。「不將不迎」，這恰是說明知覺直觀的情景。【其】<sup>126</sup>所以能「不將不迎」，一是不把物安放在時空的關係中去加以處理。因爲若果如此，便是知識【(的)】<sup>127</sup>追求因果】<sup>128</sup>的活動。二是沒有自己的利害好惡的成見，加在物的身上；因爲若果如此，便使心爲物所【擾動，物亦爲】<sup>129</sup>成見所歪曲。心既不向知識方面歧出，又無成見的遮蔽，心的虛靜的本性便可以呈顯出來。虛靜的自身，是超時空而一無限隔的存在；故當其與物相接，也是超時空而一無限隔的相接。有迎有將，即有限隔。不將不迎，應而不藏，這是自由地心，與此種自由地天地萬物，兩無限隔地主客【兩忘】<sup>130</sup>的【照面】<sup>131</sup>。「勝物而不傷」的勝，不是戰勝的勝；應當作平聲讀，乃是對任何物皆能【(勝)】<sup>132</sup>作不迎不將的自由而平等的觀照之意。馳心於知識的人，精心於此一物，即不能精心於【彼一物】<sup>133</sup>，這即是不勝物。奪情於好惡的人，慝情於此一物，即會抗拒其他之物。這即是不勝物。應而不藏，即能無所不藏，即能「官天地，府萬物」，此之謂「勝物」。所謂「不傷」，應從兩方面說：若萬物撓心，這是己傷。屈物【擾物】<sup>134</sup>以從己的好惡，這是物傷。不迎不將，主客自由而無限隔地相接，此之謂不傷。【在這種心的本來面目中呈現出的對象，不期然而然地會成爲美地對象；因爲由虛靜而來的明，正是徹底地美地觀照的明。】<sup>135</sup>

「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撓心，故靜也，……」這是說明，並不是把靜作一個理念去加以追求，乃是說在由萬物而來的

擾動的情形」16字。

<sup>125</sup>按，專書、論文此1字，手稿一無。

<sup>126</sup>按，手稿二、專書此1字，手稿一、論文無。

<sup>127</sup>按，論文此1字，手稿二、專書無。

<sup>128</sup>按，手稿二、專書此5字，論文此4字，手稿一無。

<sup>129</sup>按，手稿二、專書、論文此5字，手稿一作「奪。一般人所以有將迎，有的是出自知。物受」17字。

<sup>130</sup>按，手稿二、專書此2字，手稿一、論文作「間」字。

<sup>131</sup>按，手稿二、專書、論文此2字，手稿一作「會照」2字。

<sup>132</sup>按，專書此1字，手稿一、論文無。

<sup>133</sup>按，手稿二、專書、論文此3字，手稿一作「他物」2字。

<sup>134</sup>按，手稿此2字，手稿二、專書、論文無。

<sup>135</sup>按，手稿二、專書此49字，手稿一、論文作「這正是徹底地美地觀照」10字。

是非、好惡，得到解脫時，便自然而然地，是靜地狀態。【若】<sup>136</sup>從涵容方面說，同時【亦】<sup>137</sup>即是虛地狀態。由此可知，從老子「致虛極，守靜篤」起，發展到莊子的無己、喪我、心齋、坐忘，是以虛靜作把握人生本質的工夫，同時【即以此為】<sup>138</sup>人生的本質。並且宇宙萬物，皆共此一本質，所以可稱之為「大本大宗」。故【當一個人】<sup>139</sup>把握到自己的本質時，同時即把握到了宇宙萬物的本質。他此時即與宇宙萬物為一體，所以便說：「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齊物論〉七九頁）

「水靜猶明，而況精神？」「精」指的即是虛靜之心；「神」指的即是虛靜之心的活動。這兩句話是說，虛靜之心，自然而然地是明；而這種明，是發自與宇宙萬物相通的本質，所以此明即【能洞透】<sup>140</sup>到宇宙萬物之本質；【這樣】<sup>141</sup>，他才說：「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鑑也，萬物之鏡也。」這種明，又謂之「光」。〈齊物論〉：「此之謂明」，「此之謂葆光」，乃同一意義。他說：

「宇泰（即心）定（靜）者發乎天光。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物見其物。」（〈庚桑楚〉七九一頁）

又說：

「水之性，不雜則清，……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惔（淡）而無為，動而以天行，此養神（心）之道也。……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為象，其名為同帝。」（〈刻意〉五四四頁）

由本質所發之明、光，不僅照遍大千；而明、光即是人與天地萬物的共同本質之自身，所以也通乎一切，成就一切。【此種明是直透到天地萬物的本質】<sup>142</sup>，所以說：

---

<sup>136</sup>按，手稿二、專書、論文此 1 字，手稿一無。

<sup>137</sup>按，手稿二、專書、論文此 1 字，手稿一無。

<sup>138</sup>按，手稿二、專書、論文此 4 字，手稿一作「即是」2 字。

<sup>139</sup>按，手稿二、專書、論文此 4 字，手稿一作「一個人，當他」5 字。

<sup>140</sup>按，手稿二、專書此 3 字，手稿一作「能貫透」3 字，論文作「洞透」2 字。

<sup>141</sup>按，手稿二、專書此 2 字，手稿一、論文作「所以」2 字。

<sup>142</sup>按，手稿二、專書此 14 字，手稿一、論文作「但一般人以分解之知為明，而莊子的

「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天地》四一一頁）

【「冥冥之中，獨見曉焉」，亦即所謂「象罔得之」（同上四一四頁）。象罔所得的「玄珠」，就莊子的名言來說，是「道」，是「德」；而實際只是藝術的精神主體。】<sup>143</sup>

把莊子所說的「明」、「光」，落實來說，乃是以【虛靜為體為根源】<sup>144</sup>的知覺。此知覺因為是以【虛】<sup>145</sup>為體，【所以這是不同於一般所謂感性，而是根源地知覺，是有洞徹力的知覺。在老子，便謂之「玄覽」。】<sup>146</sup>「知覺是洞察內部，通向自然之心，擴大自我以解放向無限的。」（註三十二）這正是從實用與知識解放出來【以後的以虛靜為體】<sup>147</sup>的知覺活動，正是美地觀照。從實用與知識解放出來之心，正是虛靜之心。【但】<sup>148</sup>西方的美學家，尚未能將虛靜之體，作整全地把握。但「靜觀、深看、直觀」，是美地觀照的性質，這是一般所能承認的（註三十三）

【虛靜】<sup>149</sup>中的知覺活動，是感性的，同時也是超感性的。哈特曼(N. Hartmann 1882-1950)在 Aesthetik 中認為藝術作品，是「前景層」及「後景層」的兩個緊密關連著的成層構造。前景層是物質地、感性地形態；而後景層則是精神地內容。知覺不僅活動於前景層，而且也活動於後景層。知覺是通過可觀的形態，而迫近根本不同的內容的、精神的東西。它有把可視地形態，「同著被知覺的不可視地東西」（Das Mitwahrgenommene Unsichtbare），【融和在一起，以明瞭地具體性，使其】

---

明，則是由忘知而來」23字。

<sup>143</sup>按，手稿一、論文此53字，手稿二、專書無。

<sup>144</sup>按，手稿二、專書、論文此7字，手稿一作「虛無為體」4字。

<sup>145</sup>按，手稿二、專書、論文此1字，手稿一作「虛無」2字。

<sup>146</sup>按，手稿二、專書此36字，手稿一、論文作「所以便成為一無限隔的美地觀照」14字。

<sup>147</sup>按，手稿二、專書此8字，手稿一、論文作「後」字。

<sup>148</sup>按，手稿此1字，手稿二、專書、論文無。

<sup>149</sup>按，手稿二、專書此2字，手稿一、論文作「靜觀」2字。

<sup>150</sup>漂蕩於我們眼前的力量。他特提出「透視」的觀念。所謂透視，是知覺把握著對象可以被知覺的東西，更進而指向不能被知覺的東西。前者是可視的，是感性的；後者是不可觀的，非感性的。把握著這種東西的能力，稱為透視（Hindurchsehen, Hindurchblicken, Hindurchschauen）（註三十四）。所謂透視，應當和【前面之所謂】<sup>151</sup>「洞見」，有相同的意義。這對於美地發現，是非常重要的。【哈特曼此處所說的知覺的透視，或可作莊子之所謂「明」的低層次的解釋。】<sup>152</sup>

又瑞士詩人阿米爾（H. F. Amicelli 1821-1881）在其日記 Journal Intime 的一八五三年四月十八日，記有如下的一段：

「現在又一度享受到過去曾經享受過的最不可思議地幻想的時候。例如：早上坐在芬西尼城的廢墟之中的時候；在拉菲之上的山中，當正午的太陽下，橫在一株樹下，忽然一個蝴蝶飛來的時候，又某夜在北海岸邊，看到橫空的天河之星的時候；似乎再回到了這些壯大而不死的宇宙地夢。在此夢中，人把世界含融在自己的胸中；而覺得滿飾星辰的無窮，是【屬於】<sup>153</sup>我的東西。這是聖地瞬間，是恍惚的時間。思想從此世界飛翔向另一世界……心完全沉浸在靜地陶醉之中。」（註三十五）

圓賴三對此更加以解釋地說，這是「自我感情中出現【的】<sup>154</sup>一種變化，而成爲忘我的狀態，成爲忘我的恍惚陶醉的境地。心由超越、淨化而移向聖地瞬間。」（註三十六）

【莊子的所謂明，正由忘我而來；並且在究竟義上，明與忘我，是同時存在的。】<sup>155</sup>由忘我而來的聖地瞬間，《莊子》全書以許多話來加以

---

<sup>150</sup>按，專書此 14 字，手稿一、論文作「以明瞭地具體性」7 字，手稿二作「以明瞭地具體性使其」9 字。

<sup>151</sup>按，手稿二、專書、論文此 5 字，手稿一作「一般所謂之」2 字。

<sup>152</sup>按，手稿二、專書此 29 字，手稿一、論文無。

<sup>153</sup>按，專書此 2 字，手稿一、論文無。

<sup>154</sup>按，專書、論文此 1 字，手稿一無。

<sup>155</sup>按，手稿二、專書此 29 字，手稿一作「到此爲止，我們對老子所說的『玄覽』，莊子所說的虛靜之心的『明』、『光』，在比較平實而冷靜地精神狀態之下，可以解釋爲哈特曼所說的透視。在比較高翔而超越地精神狀態之下，可以解釋爲阿米爾的聖地

形容，如〈齊物論〉中所說的「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九六頁）〈天下篇〉所說的「獨與天地精神往來」，「上與造物者遊」（一〇九七頁）；及〈在宥〉所說的「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三六九頁），都是的。落實了說，【這些只是由美地觀照】<sup>156</sup>所昇華上去的藝術精神的聖地瞬間。透視與聖地瞬間，兩者本常是上下漂動、難作一義地界域的。至於由可視的看出不可視的東西，到底是什麼？【空】<sup>157</sup>後面再說。

由美地觀照的知覺透視，如前所說，是通向自然之心，是直觀事物之本質。現象學的課題，也如前所述，「在於探求事物之本質」，「是向事象自身【之】<sup>158</sup>歸原的基本要求」【(Grund for deggungleines puchiganges auk die Sacke selbst)】<sup>159</sup>。莊子由虛靜之心所把握【到】<sup>160</sup>的，在他【也】<sup>161</sup>正認為是物之本質。所以他說：「通乎物之所造」（〈達生篇〉六三四頁），「浮遊乎萬物之祖」（〈山木〉六六八頁），「吾遊心於物之初」（〈田子方〉七一二頁）。「物之所造」「物之祖」「物之初」，在莊子，是以自己虛靜之心所照射出的物的虛靜地本性。【更落實地說】<sup>162</sup>，只是未受人的主觀好惡、及知識分解、所干擾過的萬物原有而具體之姿，即莊子所謂物之「自然」。【即「自然」，即是物的靜虛的價值】<sup>163</sup>

---

瞬間。這種」84字。論文作「到此為止，我們對老子所說的『玄覽』，莊子所說的虛靜之心的『明』、『光』，【可以作如下的了解：】在比較平實而冷靜地精神狀態之下，可以解釋為哈特曼所說的透視。在比較高翔而超越地精神狀態之下，可以解釋為阿米爾的聖地瞬間。這種」92字。

<sup>156</sup>按，手稿二、專書此9字，手稿一、論文作「只是由美地觀照的透視」10字。

<sup>157</sup>按，手稿此1字，手稿二、專書、論文無。

<sup>158</sup>按，手稿此1字，手稿二、專書、論文無。

<sup>159</sup>按，手稿此句的外文名稱，手稿二、專書、論文無。

<sup>160</sup>按，手稿此1字，手稿二、專書、論文無。

<sup>161</sup>按，手稿二、專書、論文此1字，手稿一無。

<sup>162</sup>按，手稿二、專書此5字，手稿一、論文作「實際，即在美地觀照下所把握到的物的本質，而所謂物的本質，更落實地說」30字。

<sup>163</sup>按，手稿此12字，手稿二、專書、論文無。

## 東海特藏整理

### 台灣雜誌創刊號《深耕雜誌》

館務發展組 王雅萍

館藏《深耕雜誌》創刊號目前收藏於東海大學圖書館閉架管理之善本書室，由館務發展組典藏、維護與管理。《深耕雜誌》創刊號刊物規格約為 16 開本，內文為直式右翻，1981 年 6 月 1 日創刊號出刊。創辦人為黃石城，出刊至第 5 期，由於黃石城當選彰化縣長，第 6 期後改交由許榮淑接辦，稱為「復刊號」。總共發行 28 期(1981 年 6 月至 1983 年 2 月)，原是月刊形式，到了第 8 期(1982 年 4 月)以後改為半月刊。

《深耕雜誌》編輯成員是原《進步雜誌》社長林正杰及總編輯林世煜，但該雜誌僅於 1981 年 5 月發行創刊號即遭到查禁停刊一年，黃石城透過尤清等人邀來兩位擔任《深耕》社長、總編輯一職。至許榮淑接手後，又加入了邱義仁、林濁水、吳乃仁等人。<sup>1</sup>

《深耕》最初創刊的目的在於傳播民主政治的種子，認為「民主政治的價值乃是人性的尊嚴之所寄，相信大家都不願看到它的種子落在路旁，落在淺土，落入荊棘。大家更不希望它一發芽就在烈日下枯焦，我們熱切的期待它能落實在廣袤的心田裡。」<sup>2</sup>此刊物的宗旨是要打破權力的壟斷，對社會不合理現象提出批判，追求社會民主、自由與平等而奮鬥。《深耕》被視為 80 年代黨外雜誌的標竿之一，該刊物原本就是提供黨外人士的發言平台，基本上並不是立場中性的純政論雜誌，加上許榮淑擔任公職之故，雜誌不免淪為政治運動的工具。因部分文稿被黨外內部認為是破壞團結，新生代亦陸續離開另創雜誌。《深耕》雜誌停刊後，仍以《生根》、《台灣年代》、《台灣廣場》、《台灣潮流》、《台灣展望》、《伸根》、《深根》等為其系列雜誌發行發聲。<sup>3</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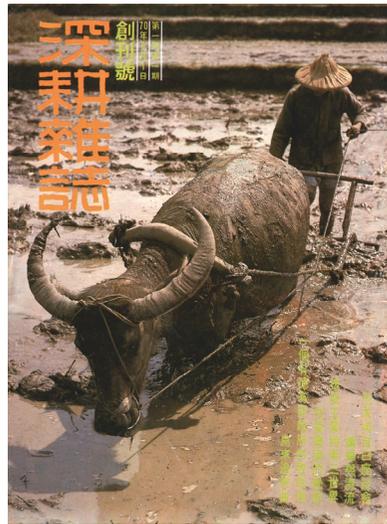
<sup>1</sup> 蔡盛琦，〈《深耕雜誌》之研究(1981.6-1983.2)〉，《國史館學術集刊》，15 期，2008 年 03 月 01 日，頁 159-208。

<sup>2</sup> 黃石城，發刊辭〈深深的耕耘，熱切的期待〉，《深耕雜誌》創刊號，1981 年 6 月 1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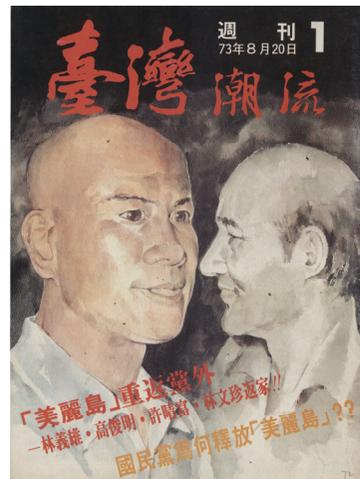
<sup>3</sup> 國家圖書館期刊文獻中心編輯，〈開風氣之先：雜誌創刊展(1945-1987)展覽圖錄〉(台北市：國家圖書館，2007 年)，頁 89。

## 封面

《深耕雜誌》創刊號封面為彩色印刷，是以照片為主的封面，第六期後改以版畫、油畫為主。刊名「深耕雜誌」<sup>4</sup>置於左上直式，刊名右側為「創刊號」字樣與刊期「第一卷第一期」，發行日期「70年6月1日」。右下角載有本期主要專篇文章篇名—「刑求與自白座談會、蝙蝠與清流、核能工業與第三世界、北愛爾蘭的輓歌、一個有德有能政府的致命傷、烏來追想曲」等。



《深耕雜誌》創刊號封面



《深耕》系列：《臺灣廣場》與《臺灣潮流》創刊號封面<sup>5</sup>

<sup>4</sup> 蔡盛琦，〈《深耕雜誌》之研究(1981.6-1983.2)〉，《國史館學術集刊》，15期，2008年03月01日，頁171。一文提及：「接辦雜誌後的許榮淑，第一件事即為《深耕》封面的字改了形貌，她怕雜誌再虧損，將刊名改了一下，『深』字改『淡』，『耕』字中右邊的井加了一點，井中有一點，擋住了那個賠錢的『洞』，結果改版後的《深耕》一出來就暢銷了。」

<sup>5</sup> 《深耕雜誌》停刊後，陸續以其他名稱發行刊物，其中《臺灣廣場》(1984.6.15~1984.8.3)發行人為許榮淑、總編輯于良騏，與《臺灣潮流》(1984.8.20~1984.12.17)創辦人是許榮淑、總編輯于良騏即同為系列刊物。

## 目次

《深耕雜誌》創刊號目錄刊登文章約 28 篇及數幅漫畫。以直式排版條列。文章分有多個主題，包含「發刊辭」、「李敖評論」、「政經把脈」、「交流道」、「大陸探索」、「世界之窗」、「鄉土社會」、「歷史巡禮」、「藝文草原」、「浮世繪」等類型的文章收錄。

其中，李敖的文章是早期《深耕雜誌》的重點文章，雖然常遭到警總關切，但編輯部以其特立獨行、極端意見為特色，樂意為他刊載專欄。以及每期內容皆有該雜誌美術編輯羅聖和以「PC」署名，繪有政治嘲諷的「浮世繪」漫畫穿插等。

### 深耕雜誌創刊號

第一卷・第一期 七十年六月一日

## 目錄

### 發刊辭

深深的耕耘，熱切的期待 -----黃石城

### 李敖評論

蝙蝠與清流 -----李 敖 二

### 座談會

刑事案件偵查中被告選任辯護人問題 ----- 四

### 政經把脈

一個有德有能政府的致命傷

從「政策性濫用」到「政策性犯錯」 -----耿達山 二一

增額立委的憲政千秋

期待建立優良的國會傳統 -----宋國誠 二七

新官場現形記 -----林 毅 三〇

何謂「立場超然」？ -----胡 敬 三一

財政部應尊重人民的財產權

從產物保險發展基金之歸屬談起 -----張晉城 三二

茲事體大的核能問題 -----黃立禾 三三

台灣政治變遷的軌跡 -----林世煜 三五

交流道 ----- 三九

大陸探索

青春的蝴蝶 王蒙的文藝觀初探 ----- 洪金立 四三

世界之窗

北愛爾蘭的輓歌 ----- 藍玉倩 四六

馬克斯完了!

法國「新哲學家的思想探索」 ----- 李寧/譯 四九

核能工業與第三世界 ----- 李士民 五五

矻矻窮年為世人

—「核能之父」果夫曼博士訪問記 ----- 鄭明/譯 六二

鄉土社會

烏來追想曲 山地鄉的一群混血兒 ----- 王 儀 六六

鄉井的呼喚 客家山歌的過去與未來 ----- 楊憲村 七三

知識份子落實鄉土的困境

從「美濃週刊」談起 ----- 林進坤 七七

憂愁的變色龍 ----- 楊牧人 七六

歷史巡禮

真理被威權侮辱 李森柯事件的啓示 ----- 楊思葭 七九

愛羅申科作品欣賞： ----- 徐曙/譯 八一

①在海岸

②時間老人

名教 ----- 胡 適 八五

思想自由與自由思想 ---- 殷海光 八九

藝文草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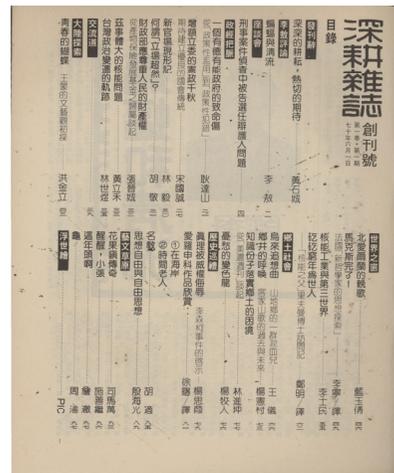
花果鎮傳奇 ----- 司馬萬 九三

醒醒，小張 ----- 施善繼 九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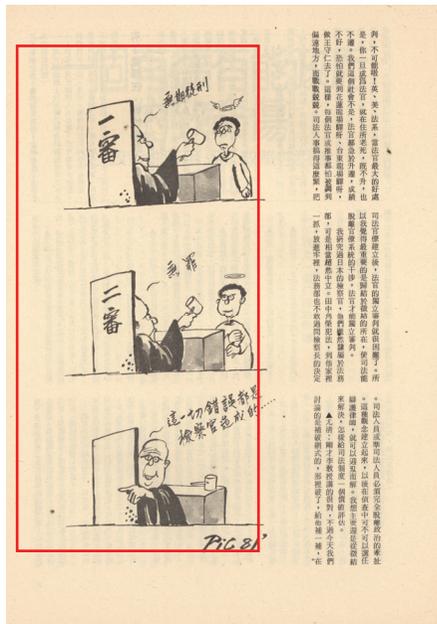
這年頭啊 ----- 詹 澈 九七

龜 ----- 周 渝 九七

浮世繪 ----- PIC



《深耕雜誌》創刊號目錄



署名 PIC 所繪的漫畫

### 發刊詞

《深耕雜誌》創刊號，由創辦人黃石城撰有發刊辭一文〈深深的耕耘，熱切的期待〉，談及《深耕雜誌》籌辦的殷始，以及傳播民主政治的種子等期待—「民主落實在人事上，是人人自由平等的社會。每一個公民有同等的機會去謀自己的幸福，每一個公民有同等的機會去要求政府的服務。」、「深耕要挖掘問題，也要開開心田，一顆關愛民主的心就是一塊好土壤。最後，讓我們下決心把民主的種子播下去，不管四季風雨，定要它結實纍纍，收成三十倍、六十倍，甚至是一百倍！」。

#### 發刊辭 深深的耕耘，熱切的期待 黃石城

「深耕雜誌」辦理登記，約在民國六十八年底「大雪」時分……直等過了今年「春分」，在「清明」前後，乍暖還寒時節，我們捺不住內心的悸動，要探探春的消息。於是把耽擱一年的「深耕」登記證領了出來。

待荷鋤上場，時序已過「立夏」，「端午」近了。

追想「深耕」籌辦殷始，不曾有四時節氣的計算，只因我們種的，並非五穀雜糧。人說「十年樹木，百年樹人」，要緊的是耐得久熬得住。「深耕」，不拘於春夏秋冬，它試著深入探索社會跳動的脈膊，它耕耘的

是廣大的、健康的心田。

新約馬太福音有一個比喻：「一個撒種的出去撒種。他撒的時候，有些種子落在路旁，鳥兒飛來，把它們吃掉了。有些落在淺土的石地上，因為土壤不深，很快就長苗；但是太陽一出來，幼苗給曬焦了；又因為根不夠深，就枯乾了。有些落在荊棘中，荊棘長起來，把幼苗擠住了。另外有些種子落在好土壤裏，長大結實，收成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也有三十倍的。」天國的道理奧妙，惟有慕道的人，能敞開心門歡喜接納。人間的道理親切，無論中外，人人當可在生活中體驗認識。

事實上，民主政治的價值乃是人性的尊嚴之所寄，相信大家都不願看到它的種子落在路旁，落在淺土，落入荊棘。大家更不希望它一發芽就在烈日下枯焦，我們熱切的期待它能落實在廣袤的心田裏。

民主是生活的，因此「深耕」也是生活的；民主是實踐的，因此「深耕」也是實踐的。

民主落實在制度裏，就是健全的議會政治。議會的決定是國民意志的表現，是政府施政的最高依據。議會政治確立，人民才能真正成為自己和國家的主人。

但是目前國內的議會政治，無疑的還存在若干缺陷。從制度上着眼，它只是行政機關聊備一格的諮詢機構，尤其以省縣自治通則未能通過之下的地方議會為最。再就運作上觀察，由於國內政黨系統的不健全，使得議會變成缺乏實質意義，如何使我們的議會政治早日上軌道，這是大家努力的課題。

民主落實在公共政策上，就要以民眾的利益為依歸。政府因人民的需要而設立，這是民主政治的根本道理。公共政策的成功或失敗，民眾的評價是惟一的衡量。

目前的公共政策則往往有本末倒置的現象。為了保障自私的利益，而取締人人稱便的遊覽車。為了維護政府的威信，掩飾國營事業的缺失。為了畏懼特權，不敢公佈呆帳名單，無法澈底根絕貪贓枉法的惡習。公共政策不再為公共，而公眾也失去評價的機會。

民主落實在人事上，是人人自由平等的社會。每一個公民有同等的機會去謀自己的幸福，每一個公民有同等的機會去要求政府的服務。

目前國內社會則不是如此。不同身家的人申請貸款之時看不同的臉

色；不同背景的人面對法律卻遭遇不同的處分。雖然人各一票，但票之不同各如其面。

不論就制度，政策，人事來看，我們的民主政治都是有待改進的。我們認為：不健全的議會可以藉選舉新血來糾正，不良的政策可以藉輿論的壓力來改進，特權的人事可以藉公眾的參與來打開。民主應該是生活的，是實踐的，是大家的事業。

因此，在「深耕」裏的民主，不是奧妙的天理，而是親切的人倫；是公眾的關心而不是蛋頭的爭辯。深耕要挖掘問題，也要開關心田，一顆關愛民主的心就是一塊好土壤。最後，讓我們下決心把民主的種子播下去，不管四季風雨，定要它結實纍纍，收成三十倍、六十倍，甚至是一百倍。

### 稿約

此雜誌創刊號除了一般性文章的徵文，亦有「迷你徵文」之稿約，刊載於刊物第 38 頁和第 95 頁，如下：

- 深耕的朋友，您一定有話要說
- 我們不迷信專家，不高估學位，也不依賴名作家。  
我們相信，只要是一個國民，無論是什麼行業，什麼學歷，都有話可講、有話要講；但通常的情況是大家找不到地方講。那麼，就請加入深耕的行列吧!
- 我們對文章的要求很簡單：  
是什麼，就說什麼。  
一個字可以講完，就不用兩個字；九千九百九十九個字講不完，就用一萬個字。  
文句不求華麗，清楚明白就是最好的文章。



《深耕雜誌》創刊號發刊辭

現在，請坐下來，拿起筆，開始寫吧！

• 深耕雜誌「迷你徵文」

如果你沒有時間寫長篇大論，  
如果你不喜歡用字數騙稿費，  
如果你是個鬼點子很多的人，  
如果你也不耐煩看長文章，  
那麼，用一張稿紙，或者作業紙，或者盜用一張情書的信紙，來參加「迷你徵文」。稿費不少，每個字一塊錢，稿費也不多，因為文章要短，短到五百字以下。

- 一、什麼叫「新生代」？
- 二、「政治家」的標準
- 三、台灣民不民主？
- 四、戒嚴令該不該叫停？
- 五、第六倫
- 六、爸爸回家吃晚飯
- 七、國民黨與我
- 八、計程車司機
- 九、揹國旗的人
- 十、電動玩具有罪嗎？
- 十一、自強號為什麼跌交？
- 十二、鄉村都市化、都市鄉村化
- 十三、永遠與民眾在一起
- 十四、三台聯播
- 十五、連續劇該不該連續下去？

版權資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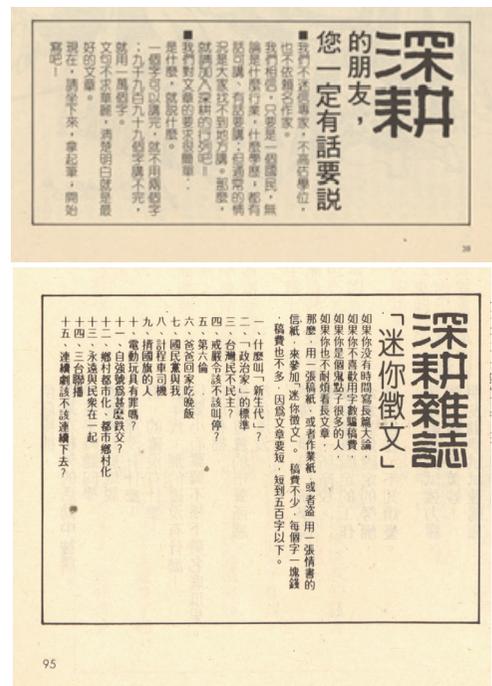
《深耕雜誌》創刊號版權資訊刊載於刊物封底，內容如下：

深耕雜誌

CULTIVATE

第一卷第一期創刊號

中華民國七十年六月一日



《深耕雜誌》稿約(上)  
與「迷你徵文」(下)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第 56 期

發行人：黃石城

編輯：本刊編輯委員會

發行所：台北市仁愛路 4 段 25 號 12 樓 A

編輯部/經理部：台北市和平東路三段 391 巷 8 弄 33 號一樓

電話：(02)7088333

郵撥帳號：500019

印刷所：海王印刷所

台北縣中和市中山路二段 637 巷 37 號

創刊：中華民國七十年六月一日

登記證：局版台誌字第 2437 號

郵政登記：中華郵政台字第 號執照登記為新聞紙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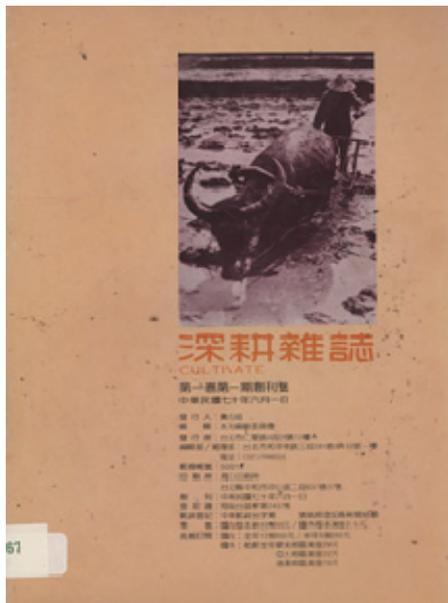
零售：國內每本新台幣 50 元 / 國外每本美金 2.5 元

長期訂閱：國內：全年 12 期 500 元 / 半年 6 期 280 元

國外：航郵全年歐美地區美金 28 元

亞太地區美金 22 元

港澳地區美金 19 元



《深耕雜誌》創刊號封底

## 館藏普通本線裝書總目·史部編年類(一)

陳惠美\*、謝鶯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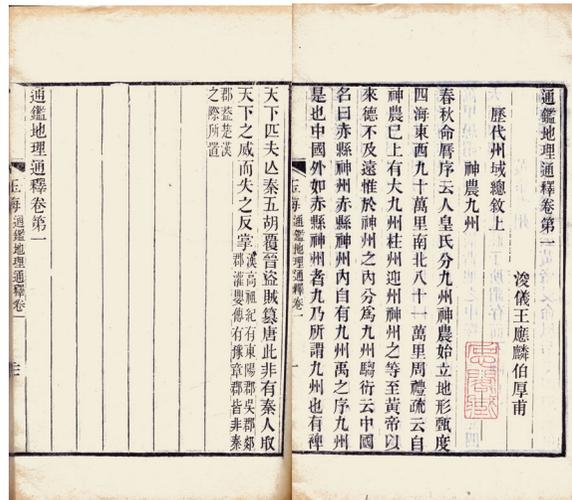
## 編年類 B02

1. 《通鑑地理通釋》十四卷三冊，宋·王應麟撰，清·徐惟鋌、張大昌、董紹舒、陳謨總校，高念曾、許祐身、吳鳳塔、蔣學溥、金肇麒、汪蟾采、汪熙莢分校，清浙江書局刊本，B02/(n)1000

附：〈欽定四庫全書總目·通鑑地理通釋十四卷〉、〈通鑑地理通釋目錄〉、上章執徐橘壯(庚辰，元世祖至元十七年，1280)王應麟〈通鑑地理通釋序〉。

藏印：「閣藏」長型硃印。」

板式：白口，單魚尾，左右雙欄。半葉十行，行二十字；小字雙行，行二十字。板框 13.0×17.9 公分。魚尾下題「玉海」、「通鑑地理通釋卷○」及葉碼。



各卷之首行上題「通鑑地理通釋卷第○」，次行下題「浚儀王應麟伯厚甫」，三行爲各卷之名，卷末題「通鑑地理通釋卷第○」、「浙江書局總校徐惟鋌分校高念曾許祐身校」(卷一至卷三，卷四至卷五題「浙江書局總校張大昌分校高念曾吳鳳塔校」，卷

\* 僑光科技大學生活創意設計系副教授

\*\* 東海大學圖書館退休館員

六至卷八、卷十題「浙江書局總校董紹舒分校蔣學溥高念曾校」，卷九題「浙江書局總校陳謨分校蔣學溥高念曾校」，卷十一題「浙江書局總校陳謨分校金肇麒汪蟾采校」，卷十二至卷十四題「浙江書局總校張大昌分校汪蟾采汪熙葵校」)。

扉葉題「通鑑地理通釋」，後半葉牌記題「」。

按：〈欽定四庫全書總目·通鑑地理通釋十四卷〉云：「首歷代州域，次歷代都邑，次十道山川，次歷代形勢，而終以唐河湟十一州，石晉十六州，燕雲十六州。書本十四卷，《宋史》本傳作十六卷，疑傳刻之譌也。……原書無序，後人以書後應麟自跋移冠於前。所云上章執徐橘壯之月，乃元世祖至元十六年庚辰八月，是時宋亡已三年，蓋月用陶潛但書甲子之義。」但王學頴《年代對照表》標示「庚辰」為「至元十七年，1280」。

**2. 《資治通鑑注》二百九十四卷附《釋文辨誤》十二卷六十冊，宋·司馬光撰，元·胡三省音注，民國六年上海商務印書館鉛印本，B02/(n)17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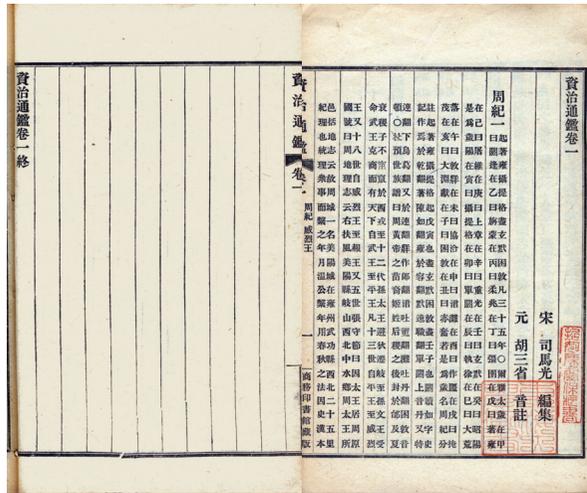
附：宋治平四年(1067)〈資治通鑑御製序〉、明王磐〈新刊資治通鑑序〉、旃蒙作噩(乙酉，元至元二十二年，1285)胡三省〈新註資治通鑑序〉、宋元豐七年(1084)司馬光〈上表〉、清嘉慶二十一年(1816)胡克家〈重刊元本資治通鑑後序〉、丁亥(元至元二十四年，1287)胡三省〈通鑑釋文辯誤序〉。

藏印：「哲如陳慶保藏印」長型硃印。

板式：細黑口，單魚尾，四邊雙欄。半葉十一行，行二十七字；小字雙行，行二十七字。板框 11.5×15.8 公分。板心上方題「資治通鑑」(或「通鑑釋文辯誤」)，魚尾下題「卷○」、「○紀○○王」及葉碼，板心下方題「商務印書館藏版」。

各卷之首行上題「資治通鑑卷○」(或「通鑑釋文辯誤卷第○」)，次行下題「宋司馬光編集」(「釋文辯誤」則題「天台胡三省身之」)，三行下題「元胡三省音註」，卷末題「資治通鑑卷○終」(或「通鑑釋文辯誤卷第○」)。

扉葉題「資治通鑑注二百九十四卷附釋文辨誤十二卷」，後半葉題「丁巳(民國六年，1917)仲夏涵芬樓印」。



- 按：一、〈資治通鑑御製序〉云：「凡十六代，勒成二百九十六卷，……故賜其書名曰《資治通鑑》，以著朕之志焉耳。」
- 二、宋王磐〈新刊資治通鑑序〉云：「前脩司馬文正公遍閱歷代舊史，旁採諸家傳記，刪繁去冗，舉西提綱，纂成《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上起戰國，下終五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間，賢君令主、忠臣義士、志士仁人，興邦之遠略，善俗之良規，匡君之格言，立朝之大節，叩函發帙，靡不具焉。」
- 三、胡三省〈新註資治通鑑序〉云：「宋朝英宗皇帝命司馬光論次歷代君臣事迹為編年一書，神宗皇帝以鑑于往事，有資於治道，賜名曰《資治通鑑》，且為序其造端，立意之由，溫公之意，專取關國家盛衰，繫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以為是書。……《通鑑》之作實接《春秋左氏》後也。溫公偏閱舊史，旁採小說，抉擿幽隱，薈粹為書勞矣，而修書分屬，漢則劉歆，三國迄于南北朝則劉恕，唐則范祖禹，各因其所長屬之，皆天下選也。歷十九年而成，則合十六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行事為一書，豈一人心思耳目之力哉。公自言修《通鑑》成，王勝之借一讀，他人讀未盡一紙已欠伸思睡，是正文二百九十四卷有未能徧觀者矣。若《考異》三十卷，所以參訂群書之異同俾歸于一；《目錄》三十卷，年經國緯，不特使諸國事雜然並錄者粲然有別而已，前代刺法之更造，天文之失行，實

著於目錄上方，是可以凡書目錄觀邪。……先君篤史學，淳祐癸卯(三年，1243)始患鼻衄，讀史不暫置，灑血漬書遺跡故在，每謂三省曰：《史》《漢》自服虔、應劭至三劉注解多矣，……《通鑑》先有劉安世《音義》十卷而世不傳，《釋文》本出於蜀史炤，馮時行為之序，今海陵板本又有溫公之子康《釋文》，與炤本大同而小異，……意海陵《釋文》非公休為之，若能刊正乎。三省拱手對曰：願學焉。……寶祐丙辰(四年，1256)出身進士科，始得大肆其力於是書，游宦遠外，率攜以自隨，有異書異人必就而正焉。依陸德明《經典釋文》釐為廣註九十七卷，著論十篇，自周迄五代，略述興亡大致。咸淳庚午(六年，1270)從淮壩歸杭都，延平廖公見而韙之，禮致諸家，俾讎校《通鑑》以授其子弟，為著〈讎校通鑑凡例〉，廖轉薦之賈相國。德祐乙亥(元年，1275)從軍江上，言輒不用，既而軍潰，閒道歸鄉里。丙子(景炎元年，1276)浙東始騷，辟地越之新昌師，從之以孥免，失其書，亂定反室，復購得他本為之註，始以考異及所註者散入《通鑑》各文之下，曆法、天文則隨目錄所而附註焉。乙酉(元至元二十二年，1285)冬乃克徹編。凡紀事之本末，地名之同異，州縣之建置離合，制度之沿革損益，悉疏其所以然。若釋文之舛謬，悉改而正之，著《辯誤》十二卷。」

四、卷二百九十四之葉二十，首行題「資治通鑑凡二百九十四卷」，著錄從「周紀五」至「後周紀五」共十六個單元。

五、司馬光〈上表〉云：「會差知永興軍，以衰疾不任治劇，乞就冗官。陛下府從所欲，曲賜容養，差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及提舉西京嵩山嵩福宮前後任，仍聽以書局自隨。……徧閱舊史，旁采小說，簡牘盈積浩如煙海，抉擿幽隱，校計豪釐，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修成二百九十四卷；又略舉事目，年經國緯，以備檢尋，為《目錄》三十卷；又參考群書，評其同異，俾歸一塗，為《考異》三十卷，合三百五十四卷。自治平開局，迄今始成。」〈表〉末有〈職官銜名〉，〈獎諭詔書〉，署「元豐八年九月十七日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重行校

定」、「元祐元年十月十四日奉聖旨下杭州鏤板」附〈職官銜名〉,「紹興二年七月初一日兩浙東路提舉茶鹽司公使庫下紹興府餘姚縣刊板紹興三年十二二十日畢工印造進入」附〈職官銜名〉,「校勘監視」附〈職官銜名〉。

六、胡克家〈重刊元本資治通鑑後序〉云：「元本傳世日稀，前明以來傳刻不下十餘種，而展轉刊雕，舊觀滋失，識者病諸。壬申(十七年，1812)之春，予承乏江寧藩使，適獲元初舊刻，卷首有王磐一序，謹案《欽定天祿琳琅書目》所謂元時官刻本也。於是齏使阿公厚菴暨諸相知佐資鳩匠，設局於孫伯淵觀察之家祠，延文學顧君廣圻，彭君兆蓀及族弟樞為校勘，翻雕之視元本無異加精美焉。間有致疑不敢臆改，擬別為考證以質來茲承學之士。」

七、胡三省〈通鑑釋文辯誤序〉云：「《通鑑釋文》行於世：有史炤本，有公休本。史炤本馮時行為之〈序〉；公休本刻於海陵郡齋，前無序後無跋，直實公休官位姓名後卷首而已。又有成都府廣都縣費氏進修堂板行。《通鑑》於正文下附註，多本之史炤，間以己意附見，世人以其有註，遂謂之善本。號曰『龍爪通鑑』，要之海陵釋文，龍爪註，大同而小異，皆蹈襲史炤者也，譌謬相傳，而海陵本乃託之公休以欺世，適所以誣玷公休，此不容不辯也。」

### 3. 《胡刻通鑑正文校宋記》三十卷附錄三卷六冊，民國·章鈺撰，民國二十年長沙章氏自刊硃印本，B02/(n)1779-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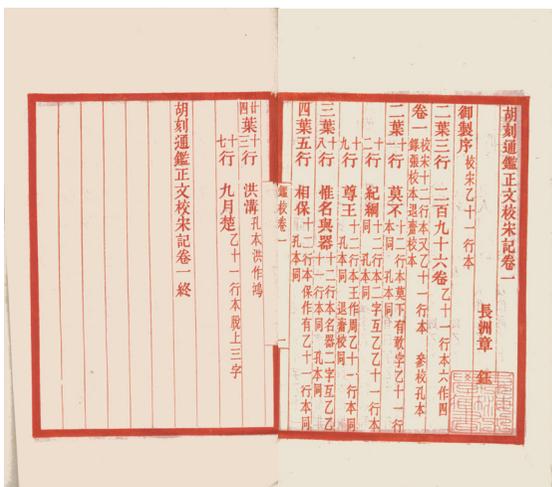
附：戊辰(民國十七年，1928)章鈺〈胡刻通鑑正文校宋記述略〉。

藏印：無。

板式：粗紅口，無魚尾，四邊單欄。半葉十行，行二十字；小字雙行，行二十字。板框 11.7×16.4 公分。板心中間題「鑑校卷○」及葉碼。

各卷之首行上題「胡刻通鑑正文校宋記卷○」(附錄題「胡刻通鑑正文校宋記附錄○」或「鑑校附錄○之」○)，次行下題「長洲章鈺」(附錄一題「宋天台胡身之先生注文 長洲章鈺輯」，附錄二之一題「陽城張敦仁古餘校記 長洲章鈺錄」，附錄二之二

題「常熟張瑛退齋校記 長洲章鈺錄」，附錄三題「明嘉定嚴永思先生通鑑讀本」，三行題「陽城張敦仁彙鈔」，四行題「長洲章鈺節鈔」)，卷末題「胡刻通鑑正文校宋記卷〇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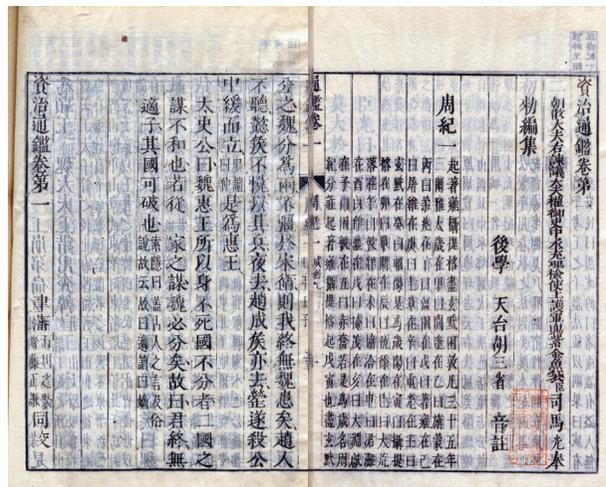


扉葉題「胡刻通鑑正文校宋記三十卷附錄三卷」，後半葉題「歲在辛未(二十年)長洲章氏刊」。封面書籤硃色題「胡刻通鑑正文校宋記」。

按：章鈺〈胡刻通鑑正文校宋記述略〉云：「有宋天台胡身之先生身丁末造，避兵谷，前為《資治通鑑》撰著之作既燬，乃復購他本以成今日流傳之注本。惟胡氏所謂他本之外，就注文考之，有云蜀本者，有云杭本者，有云傳寫本者。……吾鄉顧礪菴先生序張敦仁《通鑑識誤》有云興文署本，非出梅磻親刊，欲糾其誤，必資於興文本之上。今兩宋大字、中字、小字附釋、未附釋文諸刊，即零卷殘帙，猶艱數觀目難之又難。蓋舊槧之難得而異文之待校，前人固有欲為之而無從措手者。鈺自宣統辛亥以後，僑寄津郊，以校書遣日。丙辰冬日，江安傅君沅叔用鉅金得宋槧《通鑑》百衲本，約鈺同用鄱陽胡氏翻刻興文署本校讀，並約各校各書，校畢互勘以免脫漏。閱今已一星終矣，以上海涵芬樓《四部叢刊》中有宋刻一種，出百衲本之外，逐字比勘，可供佐證。又以明孔天胤刊無注本，源出宋槧，先後從沅叔借校亦多佳處，始知張敦仁《識誤》及常熟張瑛〈校勘記〉功未及半，辜較二百九十四卷中，脫誤衍倒四者，蓋在萬字以

上；內脫文五千二百餘字，關係史事為尤大。初擬彙集眾說，統加考定，頭白汗青，逡巡縮手。……爰手寫校記七千數百條，編為三十卷，備列所見，不厭其詳，以便覆案，讀涑水書者或有取焉。」〈記〉後記載所用：「校各宋本」、「參校本」、「采用各校本」等，並列「校例」、「附錄」、「校餘雜記」等條內容。

4. 《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五十冊，宋·司馬光撰，日本石川之襲、平松正愨等校，日本嘉永二年(1849年，清道光二十九年)據天保丙申(七年，1836)日本津藩有造館藏板校印本，B02/(n)1779-01



附：日本嘉永二年(1849，清道光二十九年)藤堂高猷〈刻資治通鑑序〉(末題「臣井野好問敬書」、日本嘉永二年(1849，清道光二十九年)佐藤坦〈刻資治通鑑跋〉、日本嘉永二年(1849，清道光二十九年)齋藤正謙〈翻刻資治通鑑跋〉、旃蒙作噩(乙酉，元至元二十二年，1285)胡三省〈音註資治通鑑序〉、宋元豐七年(1084)司馬光〈進資治通鑑表〉(官銜題「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一千戶」，表末附各職官名)、宋元豐七年(1084)〈獎諭詔書〉、宋元豐八年(1085)尚書省〈劄子〉、宋元祐元年(1086)〈奉聖旨下杭州鏤板〉(附各職官名)、〈治平資治通鑑事略〉、宋治平四年(1067)〈御製資治通鑑序〉、〈資治通鑑總目〉、〈資治通鑑目錄〉。

藏印：無。

板式：單魚尾，四邊單欄。半葉十行，行二十字；小字雙行，行二十字。板框 15.0×21.1 公分。板心上方題「通鑑卷○」，魚尾下題「○紀○○王」(如「周紀一 威烈王」)及葉碼。

各卷首行上題「資治通鑑卷第○」，次、三行題「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充理檢使上護軍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見卷一至卷八，卷九至卷三十九題「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講同提舉萬壽觀公事兼判集賢院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卷四十至卷七十一題「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卷七十二至卷七十八題「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卷七十九至卷一百八、卷一百一十五至卷一百一十八題「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權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四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卷一百九、卷一百一十一題「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八百戶食實封六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卷一百一十題「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權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四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卷一百一十二題「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八百戶食實封六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卷一百一十三題「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八百戶食實封六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卷一百一十四至卷一百一十八題「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

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四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卷一百一十九至卷一百二十一、卷一百二十三至卷一百五十八、卷一百六十一至卷一百八十四題「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六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卷一百五十九至卷一百六十、卷一百八十五至卷二百五十二、卷二百六十一至卷二百六十五題「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九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卷二百五十三至卷二百六十題「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九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卷二百六十六至卷二百六十八、卷二百七十至卷二百九十四題「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一千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卷二百六十九題「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一千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四行下題「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卷末題「資治通鑑卷第〇」、「津藩石川之駘 齋藤正謙同校」(見卷一、卷十；卷二、卷九、卷九十一、卷一百五、卷一百一十六題「津藩石川之駘 川村尚迪同校」，卷三、卷十二、卷十六、卷二十、卷二十五、卷二十九、卷三十二、卷三十八、卷四十三、卷四十八、卷五十四、卷五十八、卷六十、卷六十八、卷七十四、卷八十、卷八十七、卷八十九、卷一百三、卷一百一十八、卷一百一十九、卷一百二十二、卷一百二十五、卷一百二十八、卷一百三十一、卷一百三十四、卷一百三十七、卷一百四十、卷一百四十三、卷一百四十六題「津藩石川之駘 早崎勝任同校」，卷四、卷十一、卷十八、卷二十三、卷二十八、卷三十一、卷三十六、卷四十一、卷四十五、卷五十二、卷五十六、卷五十九、卷六十六、卷七十二、卷

七十八、卷八十四、卷八十八、卷九十、卷九十六、卷一百二、卷一百八、卷一百一十三、卷一百一十七、卷一百二十、卷一百二十三、卷一百二十六、卷一百二十九、卷一百三十二、卷一百三十五、卷一百三十八、卷一百四十一、卷一百四十四、卷一百四十七、卷一百四十九、卷一百五十一、卷一百五十三、卷一百五十五、卷一百五十七、卷一百五十九、卷一百六十一、卷一百六十三、卷一百六十五、卷一百六十七、卷一百六十九、卷一百七十一、卷一百七十三、卷一百七十五、卷一百七十七、卷二百七十四、卷二百九十、卷二百九十四題「津藩石川之駢 土井有恪同校」，卷五、卷十七、卷二十六、卷三十三、卷四十、卷五十、卷六十一、卷六十七、卷七十七、卷八十三、卷九十二、卷九十七、卷一百七、卷一百一十四題「津藩石川之駢 奥用土彦同校」，卷六、卷二十一題「津藩石川之駢 市川龜長同校」，卷七、卷十九、卷三十、卷三十九、卷四十七、卷五十五、卷六十二、卷七十五、卷八十六、卷九十八、卷一百九題「津藩石川之駢 宮崎定憲同校」，卷十三、卷九十四題「津藩石川之駢 荒木重敬同校」，卷十四、卷二十七、卷三十五、卷四十四、卷五十一、卷五十七、卷六十四、卷六十九、卷七十三、卷八十一、卷九十三、卷一百、卷一百五、卷一百一十一題「津藩石川之駢 福山知業同校」，卷十五、卷二十四、卷三十七、卷四十六、卷五十三、卷六十五、卷七十一、卷七十六、卷八十二、卷九十五、卷一百一、卷一百六、卷一百一十二題「津藩石川之駢 吉村翰同校」，卷二十二、卷三十四、卷四十二、卷四十九、卷六十三、卷七十、卷七十九、卷九十九、卷一百一十、卷一百一十五題「津藩石川之駢 荒木騫同校」，卷一百二十一、卷一百二十四、卷一百二十七、卷一百三十、卷一百三十三、卷一百三十六、卷一百三十九、卷一百四十二、卷一百四十五、卷一百四十八、卷一百五十、卷一百五十二、卷一百五十四、卷一百五十六、卷一百五十八、卷一百六十、卷一百六十二、卷一百六十四、卷一百六十六、卷一百六十八、卷一百七十、卷一百七十二、卷一百七十四、

卷一百七十六、卷一百七十八至卷一百九十一、卷一百九十三、卷一百九十五、卷一百九十七、卷一百九十九、卷二百、卷二百一、卷二百三、卷二百五、卷二百七、卷二百三十一、卷二百三十八題「津藩石川之駿 川喜多顛同校」，卷一百九十二、卷一百九十四、卷一百九十六、卷一百九十八、卷二百二、卷二百四、卷二百六、卷二百八、卷二百一十、卷二百一十三、卷二百一十六、卷二百二十三、卷二百二十八、卷二百三十四、卷二百七十二、卷二百七十六、卷二百八十、卷二百八十四、卷二百八十八題「津藩土井有恪 川喜多顛同校」，卷二百九、卷二百二十一、卷二百三十三題「津藩齋藤正謙 川喜多顛同校」，卷二百一十一、卷二百一十七、卷二百二十六、卷二百三十六題「津藩宮崎定憲 川喜多顛同校」，卷二百一十二、卷二百二十二、卷二百二十七題「津藩川喜多顛 齋藤正格同校」，卷二百一十四、卷二百二十、卷二百二十三、卷二百二十九、卷二百三十二、卷二百三十五題「津藩川喜多顛 中村忠順同校」，卷二百一十五、卷二百一十九、卷二百二十五、卷二百三十七、卷二百四十三、卷二百四十六、卷二百五十三、卷二百五十六、卷二百六十三、卷二百六十六題「津藩石川之圭 川喜多顛同校」，卷二百一十八、卷二百三十題「津藩川喜多顛 矢守勝遼同校」，卷二百三十九、卷二百四十九、卷二百五十九題「津藩齋藤正謙 石川之圭同校」，卷二百四十、卷二百四十五、卷二百五十、卷二百五十五、卷二百六十、卷二百六十五、卷二百六十七、卷二百七十、卷二百七十八、卷二百八十二、卷二百八十六題「津藩石川之圭 土井有恪同校」，卷二百四十一、卷二百五十一、卷二百六十一題「津藩石川之圭 宮崎定憲同校」，卷二百四十二、卷二百四十四、卷二百四十七、卷二百五十二、卷二百五十四、卷二百五十七、卷二百六十二題「津藩石川之圭 矢守勝遼同校」，卷二百四十八、卷二百五十八、卷二百六十四題「津藩石川之圭 中村忠順同校」，卷二百六十八題「津藩石川之駿 石川之圭同校」，卷二百六十九、卷二百九十三題「津藩齋藤正謙 土井有恪同校」，卷二百七

十一、卷二百七十九、卷二百八十七題「津藩土井有恪 宮崎定憲同校」，卷二百七十三、卷二百八十一、卷二百八十九題「津藩土井有恪 中村忠順同校」，卷二百七十五、卷二百八十三、卷二百九十一題「津藩土井有恪 矢守勝遼同校」，卷二百七十七、卷二百八十五題「津藩土井有恪 齋藤正格同校」，卷二百九十二題「津藩平松正愨 土井有恪同校」，八十五題「津藩石川之騫 □□□同校」。

〈目錄〉、卷八卷末題「津藩石川之騫 平松正愨同校」)

扉葉題右題「天保丙申(七年，1836，清道光十六年)校刊第一帙(全書共十帙)十五冊自序表目錄至漢紀二十」，左題「津藩有造館藏版」，中間書名題「資治通鑒」。

按：一、藤堂高猷〈刻資治通鑒序〉云：「余素好是書，每政暇輒熟讀而翫味焉。因命儒臣校勘，漸次上梓。會壬寅(日本天保十三年，1842，清道光二十二年)歲官諭侯伯刊行大部書籍，於是督勵所司分曹執役，不期年告成。原本往往有魯魚帝虎之誤，儒臣等參正史以標同異，按長曆以推月日，乃詡漢土所未有喋喋騰口，是亦不過。」

二、左藤坦〈刻資治通鑒跋〉云：「公聽政之暇，恒潛思於經術，旁及古今史籍，最喜涑水之撰。往者命翻雕之儲覺館，原書係陳仁錫評本，分屬儒員數名徧覓異本校訂之，表同異於欄外，庶乎無復紕繆。」

三、齊藤正謙〈翻刻資治通鑒跋〉云：「公襲封以來，勤民事修武備，皆已就緒。而文教亦優，為四方所瞻視。嘗命館儒校讎《資治通鑒》，欲翻雕布世，臣謙實總督之，已成，公親製序冠於其首，使臣謙書一言於其後。」

四、藤堂高猷〈刻資治通鑒序〉云「漸次上梓」，雖不知歷經多久，但因「天保十三年(1842)」受諭「刊行大部書籍」，才開始進行刊刻《資治通鑒》之事。至於所說的「不期年告成」，參左藤坦〈刻資治通鑒跋〉說「往者命翻雕之儲覺館」，應是指津藩所說的「漸次上梓」，雕成的書板是依序置放在「覺館」(可能

是「有造館」)，以俟全部完成再進行刷印事宜。再參酌齊藤正謙〈翻刻資治通鑑跋〉之記載，則〈序〉所謂「不期年告成」，以〈刻資治通鑑跋〉尾署「嘉永二年夏五月」日期看，從「分屬儒員數名徧覓異本校訂」，到〈翻刻資治通鑑跋〉尾署「嘉永二年冬十月」的「欲翻雕布世，臣謙實總督之，已成，公親製序冠於其首」而言，確實是「不期年告成」。但「公親製序冠於其首」之說，則是指「徧覓異本校訂」一事而概說。據內容之板面來看，「分屬儒員數名徧覓異本校訂」所校訂之文字，皆置於書眉，其修改之文字不會影響到原書板的內容或板面。《東海館藏和刻本書目》原著錄為「日本天保七年(1836，清道光十六年)校刊，嘉永二年(1849，清道光二十九年)津藩有造館藏版本」，改為「日本嘉永二年(1849年，清道光二十九年)據天保丙申(七年，1836)日本津藩有造館藏板校印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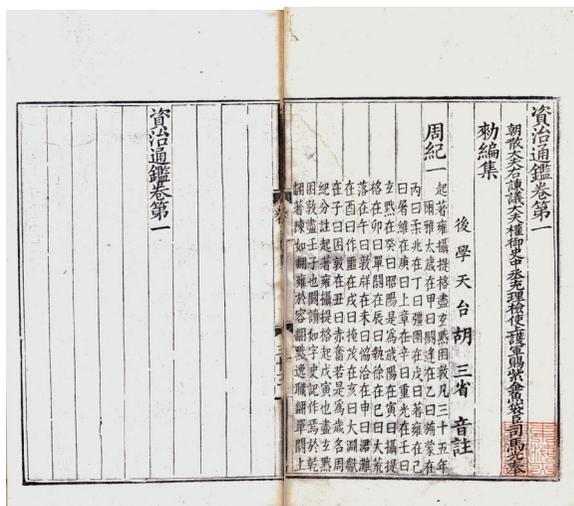
五、胡三省〈音註資治通鑑序〉云：「溫公徧閱舊史，旁採小說，抉擿幽隱，蒼粹爲書勞矣，而修書分屬，漢則劉歆，三國迄于南北朝則劉恕，唐則范祖禹，各因其所長屬之，皆天下選也，歷十九年而成，則合十六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行事爲一書。」又云：「三省捧手對曰：願學焉。……寶祐丙辰(四年，1256)出身進士科，始得大肆其力於是書，游宦遠外，率携以自隨，汜乙酉(元至元二十二年，1285)冬乃克徹編。」

5. 《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一百冊，宋·司馬光撰，元·胡三省音註，清番禺任氏翻刻胡克家仿元本，B02/(n)1779-02

附：王磐〈興文署新刊資治通鑑序〉、〈御製資治通鑑序〉(剩葉一)、旃蒙作噩(乙酉，元至元二十二年，1285)胡三省〈新註資治通鑑序〉、宋元豐七年(1084)司馬光〈資治通鑑表附二百九十四卷〉。

藏印：「南海馮貽嘉堂珍藏」長型硃印、「硯穀經眼」方型陰文硃印。

板式：細黑口，雙魚尾，四邊雙欄。半葉十行，行二十字；小字雙行，行二十字。板框 15.0×20.9 公分。雙魚尾間題「通鑑○」，下魚尾下爲葉碼。



各卷之首行上題「資治通鑑卷第〇」，次、三行依序題「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充理檢使上護軍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見卷一至卷八。卷九至卷三十八題「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講同提舉萬壽觀公事兼判集賢院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編」；卷三十九至卷七十題「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編」；卷七十一、卷七十三至卷七十八題「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貳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編」；卷七十二題「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貳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編」；卷七十九、卷八十一至卷一百八、卷一百一十、卷一百一十五至卷一百一十八題「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脩撰權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肆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編」；卷八十題「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脩撰權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肆伯

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編」；卷一百九、卷一百一十一、卷一百一十三、卷一百七十二至卷一百七十三、卷一百七十六題「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脩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八百戶食實封陸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編」；卷一百一十二、卷一百一十四、卷一百五十九至卷一百六十、卷一百八十五至卷一百八十九、(粹文堂本卷一百九十)卷一百九十一至卷二百一十九、卷二百二十一至卷二百二十五、卷二百二十七至卷二百二十八、卷二百三十至卷二百四十九、卷二百五十一至卷二百五十二、卷二百五十六、二百六十三至卷二百六十五題「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編」；卷一百一十九至卷一百三十一、卷一百三十三至卷一百三十四、卷一百三十六至卷一百五十八、卷一百六十一至卷一百七十一、卷一百七十四至卷一百七十五、卷一百七十七、卷一百七十九至卷一百八十四題「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脩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陸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編」；卷一百三十二、卷一百三十五題「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脩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六百戶食實封陸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編」；卷一百七十八題「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編」；卷一百九十、卷二百二十題「端明殿學士兼翰林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編」；卷二百二十六、卷二百二十九題「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編」；卷二百五十、二百五十三至卷二百五十五、卷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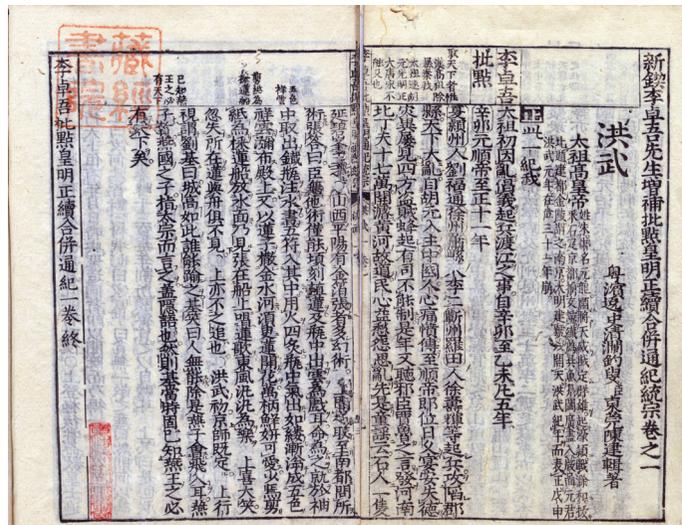
百五十七至二百六十二題「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編」；卷二百六十六題「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三千六百戶食實封壹仟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編」；卷二百六十七至卷二百六十八、卷二百七十題「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壹仟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編」；卷二百六十九題「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壹仟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編」；卷二百七十一至卷二百九十四題「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壹仟戶臣司馬光奉勅編編」)，四行下題「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卷末題「資治通鑑卷第〇」。

按：一、司馬光〈資治通鑑表附二百九十四卷〉云：「臣光言先奉勅編集歷代君臣事迹，又奉聖旨賜名《資治通鑑》，今已了畢者。……獨於前史粗嘗盡心，自幼至老嗜之不厭，每患遷、固以來，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讀之不徧，況人主日有萬機，何暇周覽。臣常不自揆，欲刪削長，舉撮機要，專取關國家盛衰，繫生民休戚，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爲編年一書，使先後有倫，精粗不雜，私家力薄，無由可成。伏遇英宗皇帝資睿智之性，敷文明之治，思歷覽古事，用恢張大猷，爰詔下臣俾之編集。臣夙昔所願，一朝獲伸，踴躍奉承，惟懼不稱，先帝仍命自選辟官，屬崇文院置局，許借龍圖、天章閣、三館祕閣書籍，賜以御府筆墨繒帛，及御前錢以供果餌，以內臣爲承受眷遇之榮。……差知永興軍，以衰疾不任治劇，乞就冗官。陛下俯從所欲，曲賜容養差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及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官，前後六任仍聽以書局自，隨給之祿秩。……徧閱舊史，旁采小說，簡牘盈積，浩如煙海。抉躡幽隱，校計豪釐，上起戰國，

下終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修成二百九十四卷，又略舉事目，年經國緯以備檢尋，為《目錄》三十卷；又參考群書，評其同異，俾歸一塗，為《考異》三十卷，合三百五十四卷。自治平開局，迨今始成。」職銜題「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壹阡戶臣司馬光上表」，表後列：檢閱文字承事郎臣司馬康，同修奉議郎范祖禹，同修秘書丞臣劉恕，同修尚書屯田員外郎充集校理臣劉敞，編集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臣司馬光。

二、又，「元豐八年九月十七日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重行校定，元祐元年十月十四日奉聖旨下杭州鏤板」，下列張耒等十三位校對大臣名。「紹興二年七月初一日，兩浙東路提舉茶鹽司公使庫下紹興府餘姚縣刊板，紹興三年十二月二十日畢工印造」，下列邊智等六位大臣名。「校勘監視」下列婁諤等二十九位大臣名。

6. 《皇明正續通紀統宗》十二卷卷首一卷附錄我朝會元三及第人氏總考一卷十二冊，明陳建撰，明袁黃補著，明卜大有纂補，日本文政十二年(清道光九年，1829)刊本，B02/(p)7515



附：明嘉靖乙卯(三十四年，1555)陳建〈新刻皇明通紀統宗序〉、日本

元祿丙子(九年，1696，清康熙三十五年)北邨可昌〈正續皇明通紀後序〉、〈我明聖君嗣統源流〉、〈大明世統徽號〉、〈錄我朝會元三及第人氏總考〉。

藏印：「藏經書院」方型硃印。

板式：單魚尾，四邊單欄。無行格界欄，上下兩欄。下欄，半葉十二行，行二十八字；小字雙行，行二十七字。上欄為明李卓吾批點，行五字。外框 14.6×23.3 公分，內框 14.6×20.3 公分。板心上方題「李卓吾批點皇明通紀統宗」，魚尾下題各帝年號及卷次(如「洪武一卷一」)、葉碼(卷一之葉三十一題「卅乙本終」，卷二之葉二十九題「廿九本終」，卷三之葉三十三題「三三本終」，卷四之葉三十一題「三一本終」，卷五之葉三十九題「三九本終」)。

各卷首行題「新鐫李卓吾先生增補批點皇明正續合併通紀統宗卷之○」，次行上題各帝王年號，下題「粵濱逸史清瀾釣叟臣東莞陳建輯著」(第十一卷題「浙歸田逸叟臣袁黃補著」，第十二卷題「浙秀水卜大有纂補」)，卷末題「李卓吾批點皇明正續合併通紀○卷終」(自第六、七、八等三卷「卷之○終」改題各帝年號及「○卷」)。

扉葉右上題「東莞陳建撰」，左題「皇都書肆 耕價堂發行」，中間書名大字題「皇明通紀」。

書末版權頁依序題「文政十二年(1829，清道光九年)己巳初春補刻」、「浪華書肆 河內屋茂兵衛」、「京城書肆 俵屋治兵衛」、「俵屋清兵衛」。

按：一、字句間有日文訓點。本文分「正」、「續」兩個部份，北邨可昌〈序〉云：「續集不知何人作」。

二、是書扉葉題「皇明通紀」，陳建〈序〉題「皇明通紀統宗」，北邨可昌〈序〉題「正續皇明通紀」，板心題「李卓吾批點皇明通紀統宗」，各卷首行題「新鐫李卓吾先生增補批點皇明正續合併通紀統宗」。上欄附李卓吾批點，卷首所題，或為刊刻者將陳建之作與不知名作者之「續」、李卓吾批點、袁黃補著、卜大有纂補等書合而為一，故題「新鐫李卓吾先生增補批點皇

明正續合併通紀統宗」。

- 三、陳建〈新刻皇明通紀統宗序〉云：「往爲《皇明啓運錄》，述我太祖高皇帝俊德成功，始終次第之詳矣。……我朝開國四十餘年之事，無非所謂創業垂統也。《啓運》一錄備矣。繼自永樂下迨正德，凡八朝，一佰二十四年之事，無非所謂持盈守成也。則今《通紀》具焉。紀成就梓，非敢自謂昭代成史，迺爲後之秉史筆，君子屬稿云爾。《啓運錄》舊已梓完，難於再編改刻，然二之又不是，故今併冠以《通紀》之名，而版刻姑仍舊，合前後共爲一書云。抑嘗因此閱歷世變，尤有感焉。」
- 四、北邨可昌〈正續皇明通紀後序〉云：「讀史於古不若讀史於近，而近代之史莫《明史》若然。未見成書，若《吾學編》、《泳化類編》、《名山藏》、《世法錄》等書，分部浩繁，弗便觀覽焉。編年紀事，綱紀無漏，文獻摘具興廢易見者，雖有清瀾陳氏《通紀》，在本國未有梓行，故予今校讐數本訓點行世焉。但續集不知何人作而開國所編數條，疑出於院本，爾後所續，皆典故事實，只補《通紀》之所漏。」
- 五、卷首收：我明聖君嗣統源流、大明世統徽號、洪武朝封功臣十二人、太祖封列侯五十二人、守禦郡邑及陣亡出使死節忠義文武功臣追封列爵共七十五人、塑像於豫章立忠節廟者十三人、追封於康郎山忠節廟者三十六人、守禦郡邑及在廷佐輔文武功臣自列侯而下者共二十八人、永樂朝封功臣九人、建文朝忠臣一十九人。
- 六、〈錄我朝會元三及第人氏總考〉，錄至萬曆四十四年(1616)，〈大明世統徽號〉記：「當今萬歲皇帝萬曆癸酉元年(1573)至萬萬年」，卜大有「纂補」至隆慶，袁黃爲萬曆十四年(1586)進士，卜大有爲嘉靖二十六年(1547)進士，則「續」之作者或亦爲明萬曆間人。

## 大事記

### 圖書館大事記

西元 2021 年 01 月 01 日至 02 月 28 日

- 01.04 台中市立圖書館規劃在水湳經貿園區設立台中市立美術館，配合美術圖書館的成立需購美術類書籍，請教本館推薦美術類別書單。
- 01.05 管院分館原創思坊 M245、M246 擬註銷圖書，暫放於管理學院冷氣空調間，中文圖書採編組已協助查價完畢，中文圖書 8080 冊，總金額為 1,533,341。已分批上簽申請註銷除帳，並已送出第一批，共 1720 筆，金額 316,523 元。
- 01.06 善本書室冷氣汰舊換新案，請總務處營繕組專業人員協助處理。
- 01.06 疫情期間配合外賓入館登記政策，以及更有效率的處理流通櫃台作業，讀者服務組與數位服務組合作，整合櫃台常會遇到的問題，另建置圖書館櫃台作業系統。
- 01.06 本館計畫安裝資檢區暨公共區域電腦雲端虛擬系統，經費 90%由儀委會及電算中心資訊設備費支援，其餘不足數由本館發展基金支應。本系統已開始測試，請採購完成後，寒假即可開始施作，下學期可開始使用。
- 01.15 出版王建生作，《文藝論稿》，叢書名為「東海大學圖書館師長研究著作」，編輯李光臨，ISBN 978-957-548-079-0(平裝)。

- 01.21 本日於集思區舉辦大學校院總務長會議，邀請圖書館館長楊朝棟專題演講：「雲端智慧的綠能管理系統及校園電力監測系統」。



- 02.22 即日起至 2/26 開學第一週，圖書館於 1F T-learning 區辦理「元宵節猜燈謎，百謎百獎」活動。



(基於篇幅考量，本期的館內各組工作報告及各項統計資料，僅採用電子版發佈)



#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

第 56 期

2021 年 3 月 15 日

## 編輯委員 (依姓氏筆劃排列)

吳品湘 (建國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  
吳福助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退休)  
林翠鳳 (台中科技大學應用中文系)  
范豪英 (中興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暨圖書館館長退休)  
秦雅嫻 (僑光科技大學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翁敏修 (雲林科技大學漢學應用研究所)  
陳星平 (虎尾科技大學多媒體設計系)  
陳惠美 (僑光科技大學生活創意設計系)  
趙惠芬 (僑光科技大學企管系)  
蘇慧霜 (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

## 執行編輯 (依姓氏筆劃排列)

王雅萍 (館務發展組)  
陳 曦 (讀者服務組)

## 刊名書法

陳星平

館刊資料庫：<https://digarc.lib.thu.edu.tw/thulibm/>

##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稿約

**第一條：**本刊提供圖書資訊學（圖書館學、圖書館史、圖書館管理學）、圖書文獻學、書評學、閱讀學、出版學、漢學、人文學科等領域學者的中文專業論述之交流與刊登。歡迎青年學子從事上述各類學術研究的中文論文、書評、讀書心得。來稿（學術論文）請附「註釋」、「參考書目」、中英文「提要」及「關鍵詞」。

**第二條：**歡迎國內外各圖書館從業人員惠賜館藏資源介紹，含工具書與各類資料庫的使用心得或成果。

**第三條：**惠賜「論文」之格式，請參考中央研究院各所集刊格式。

**第四條：**本刊採匿名委外審查，凡經審查合格者，將個別通知刊載，並請填寫「授權書」，本刊擁有重製、傳播與其它型式之發行權，投稿者不得有任何報償的要求。遵照「個資法」維護賜稿者隱私，填寫的「授權書」，從授權日起，五年後即進行銷毀。

**第五條：**來稿一經同意刊載，若欲改投他處者，請先告知，以便撤稿作業。

**第六條：**本刊限於經費，一律無稿酬，稿件一經採用，即贈當期館刊一本及作者該篇的PDF檔。

**第七條：**本刊採雙月刊發行，同時發行紙本與電子版兩種，電子版連結方式：由「東海大學圖書館網頁」連結「本館館刊」。

## Manuscript Submission Guidelines

*Tunghai University Library Journal (TULJ)* serves as a forum for scholars, teachers, and librarians to discuss and share their ideas, experience, and knowledge. *TULJ* provides opportunities to evaluate, improve, and apply such strategies in the fields of Library & Information Studies, Library Studies, Library Management, Library History Studies, Book & Documentation Studies, Book Reviews, Studies of Reading, Studies of Publication, and Sinology as well as subjects related to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Item 1** *TULJ* welcomes submission of academic papers, book reviews and reading reflections. For academic papers, use of footnotes, abstracts, and keywords in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are required.

**Item 2** *TULJ* welcomes professionals and librarian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to describe highlights of their library collections.

**Item 3** In order to be suitable for possible publication, authors must submit manuscripts following the *TULJ* template.

**Item 4** All manuscripts submitted must be "blind." Do not identify yourself or your university affiliation in your manuscript. Once accepted, *TULJ* will notify the author individually. All authors are requested to sign the Copyright Form, valid for 5 years, which allows *TULJ* to publish their manuscripts in the journal. *TULJ* protects the privacy for all authors based on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Act.

**Item 5** Manuscripts submitted to *TULJ* must not be submitted to, or under consideration by, any other journal. If you wish to submit your manuscript to another journal, you must first notify *TULJ* to retract publication.

**Item 6** *TULJ* does not provide pay the author for publication, or require a publication fee from the author. Once accepted for publication, *TULJ* provides the author with a PDF file and a copy of the journal.

**Item 7** *TULJ* is published bimonthly in periodical and online form. For online journal information please visit: <http://www.lib.thu.edu.tw/newsletter/>

##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第五十六期】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五日發行

發行人：楊朝棟

主編：楊朝棟

執行編輯：王雅萍（校內分機：28762）

出版者：東海大學圖書館

地址：40704 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四段 1727 號

E-mail: [libjournal@thu.edu.tw](mailto:libjournal@thu.edu.tw)

二〇一六年元月十五日創刊

ISSN 2414-7443

本刊於東海大學圖書館網頁同步刊載

